

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  
生态社会主义

时青昊 著



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  
生态社会主义

时青昊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的生态社会主义/时青昊著.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ISBN 978 - 7 - 208 - 08535 - 0

I. 2... II. 时... III. 社会主义—关系—生态学—研究  
IV. D033.4 Q14 - 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57423 号

责任编辑 毕 胜

封面设计 傅惟本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的生态社会主义

时青昊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 × 965 1/16 印张 12.25 插页 2 字数 168,000

2009 年 5 月第 1 版 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208 - 08535 - 0/D · 1546

定价 24.00 元



# 目 录

## 绪 论 / 1

-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 5
- 二、选题意义 / 8
- 三、研究方法和逻辑结构 / 9

## 第一章 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的生态社会主义概述 / 13

### 第一节 生态社会主义的产生背景 / 13

- 一、环境危机的出现 / 13
- 二、国际工人运动的衰落 / 15
- 三、“新社会运动”的崛起 / 16
- 四、后现代主义的勃兴 / 18

### 第二节 生态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 / 20

- 一、“红色绿化”阶段 / 21
- 二、“红绿交融”阶段 / 22
- 三、“绿色红化”阶段 / 26

### 第三节 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生态社会主义的主要观点 / 28

- 一、用“生态危机”理论补充马克思主义 / 29
- 二、生态危机的根源 / 31
- 三、克服生态危机的对策 / 37

### 本章小结 / 46

## 第二章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生态社会主义的新变化和动因 / 48

### 第一节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生态社会主义的新变化 / 48

- 一、对苏联和东欧生态教训的反思 / 49
- 二、提出了关于生态帝国主义的新理论 / 50



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更加深刻 / 51

四、经济政策更加务实 / 53

五、在政治理论方面更加重视工人阶级和阶级斗争 / 55

六、在指导思想反对“新无政府主义” / 58

第二节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生态社会主义新变化的动因 / 60

一、苏东剧变后西方大左翼阵营的变化 / 60

二、生态帝国主义的猖獗 / 62

三、绿党内部各派力量的消长 / 63

四、后现代主义的衰落 / 65

本章小结 / 66

### 第三章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生态社会主义的主要新观点——反思与批判 / 68

第一节 生态社会主义对苏联生态教训的反思 / 68

一、“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 / 69

二、苏联的生态教训 / 70

三、从“增长极限”的角度分析苏联粗放型增长模式 / 74

第二节 生态社会主义对生态帝国主义的批判 / 82

一、从早期生态殖民主义到当代生态帝国主义 / 82

二、生态帝国主义之资源掠夺 / 86

三、生态帝国主义之污染输出 / 88

四、生态帝国主义之生态战争 / 91

本章小结 / 95

### 第四章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生态社会主义的主要新观点——变革与途径 / 97

第一节 生态危机的根源与解决生态危机的前途 / 97

一、生态危机的根源是资本主义制度 / 97



## 目 录

二、解决生态危机的前途是先进的社会主义 / 104	
第二节 实现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的动力、主体与道路 / 113	
一、实现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的动力 / 114	
二、实现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的主体 / 122	
三、实现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的道路 / 128	
第三节 生态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 / 132	
一、“新无政府主义”倾向与“科学社会主义”倾向 / 132	
二、马克思与生态学 / 143	
本章小结 / 153	
第五章 生态社会主义的实践和启示 / 155	
第一节 生态社会主义的实践 / 155	
一、欧洲的“红绿联盟”政府 / 155	
二、德国的“红绿联盟”政府 / 158	
第二节 生态社会主义对中国的启示 / 164	
一、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是我国的唯一选择 / 164	
二、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 / 169	
本章小结 / 172	
结 语 / 174	
参考文献 / 178	
后 记 / 186	



## 绪 论

生态社会主义自 20 世纪 70 年代在西方兴起以来,已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思潮和运动。生态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友邻流派: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生态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盟友;在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群落中,生态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邻居。

一方面,说生态社会主义不是科学社会主义,是因为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出发点为生态问题,它的阶级基础主要是中产阶级,它否定暴力革命的社会变革道路,它的指导思想中包含了很多非科学社会主义的内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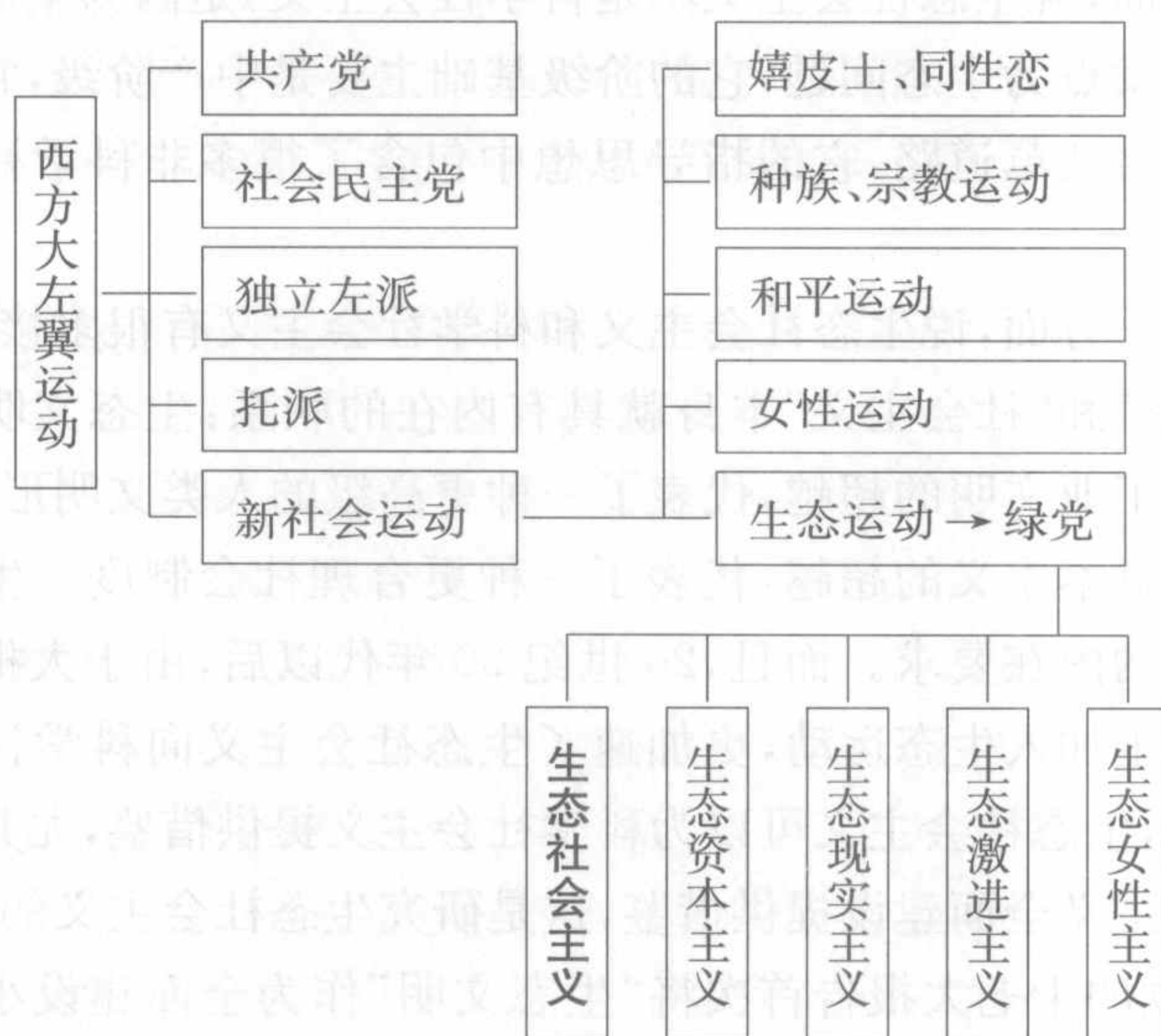
但另一方面,说生态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有很多接近之处,是因为“生态”和“社会主义”本身就具有内在的联系:生态文明作为对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超越,代表了一种更高级的人类文明形态;社会主义作为对资本主义的超越,代表了一种更合理社会制度。生态文明是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而且,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由于大批共产党员和左派人士加入生态运动,更加速了生态社会主义向科学社会主义接近。因此,生态社会主义可以为科学社会主义提供借鉴,尤其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建设提供借鉴,这是研究生态社会主义的意义所在。尤其是,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将“生态文明”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更加要求中华民族树立世界眼光,以开放的胸怀借鉴全人类的优秀文明成果,其中当然也包括生态社会主义。在借鉴生态社会主义的时候,要划清科学社会主义和生态社会主义的界限,在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立场的基础上,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什么是生态社会主义?

从字面上看,“生态社会主义”的英文是“eco-socialism”,它由两个词组成:其中,“eco-”是“ecological”的简写形式,表示“生态的”;“socialism”是“社会主义”的意思。这两个词为什么能结合在一起?生



生态社会主义者剖析两者之间的联系,可以归纳为一句话:生态危机的总根源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因为资本要求剩余价值最大化,而剩余价值最大化要求生产最大化;生产最大化要求消费最大化;如果不能实现消费最大化就会产生经济危机,资本主义通过奉行凯恩斯主义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消费最大化,也一定程度上消除了经济危机;但消费最大化必然造成资源消耗最大化和污染最大化。因此,生态危机的总根源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生态危机在资本主义框架内无法得到解决;要解决生态危机,最终要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实行社会主义制度。这是生态社会主义最基本的理论,也是“生态”与“社会主义”的内在联系。



生态社会主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狭义的生态社会主义是绿党的一个流派。现在,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有绿党,绿党已经成为世界政治舞台上一支重要的力量。绿党起源于生态运动,其内部派别林立,对这些派别的划分方法也有很多种,通常认为,绿党内部存在着五种流派:生态社会主义(eco-socialism)、生态自由主义(eco-liberalism,即生态资本主义的自我标榜的一种说法)、生态激进主义(eco-radicalism,或者叫生态原教旨主义)、生态现实主



义(eco-realism)及生态女性主义(eco-feminism)。<sup>①</sup>显然,这种划分没有采用同一的标准,只是根据各个流派的不同特征进行区分,不能排除这些流派之间的交叉与重叠;实际上,绿党本身的组织结构就十分松散,上述派别之间没有明确的组织界限。在理论上,生态社会主义和生态自由主义存在着尖锐的对立,而生态激进主义和生态现实主义也存在着针锋相对的矛盾,而生态女性主义则以其女性主义为特征。

从上图,我们可以看出狭义的生态社会主义在西方大左翼运动中的定位:狭义的生态社会主义是绿党的流派,绿党是生态运动的产物,生态运动是西方新社会运动的组成部分,而新社会运动又是西方大左翼运动的组成部分。西方大左翼运动的主体包括:共产党、社会民主党、独立左派、托派、新社会运动等。

广义的生态社会主义是以绿党为代表的生态运动和其他左翼组织互相影响所形成的“红绿联盟”。共产党、社会民主党、独立左派和托派等左翼组织,是生态社会主义中“社会主义”思想的来源。由于思想来源复杂,生态社会主义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社会主义,尽管其内部有科学社会主义的成分。

另外,国内外的一些文章和著作中经常出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ecological Marxism)这个名词,那么,“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和“生态社会主义”是什么关系?国内外学者对此存在着不同的观点。大致有三种:第一种观点认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比“生态社会主义”更加接近于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但本书认为,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因为阿格尔、莱易斯、奥康纳等人虽然自称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但其立场并不是更加接近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本书在第一章第三节和第四章第三节对他们的观点做了介绍。第二种观点主要从地域角度来划分,把欧洲的“红绿”思想称为“生态社会主义”,把北美的“红绿”思想称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两者在理论上没有区别,可以混用。这种观点反映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和“生态社会主义”在地域上实际存在

<sup>①</sup> Mayer, Margit and Ely, John(ed), *The German Greens-Paradox between Movement and Party*,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Philadelphia 1998, p. 8.



的称呼差异,强调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和“生态社会主义”在内容上的一致性,但忽视了两者在实践上的区别。第三种观点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看成是一种理论思潮,而“生态社会主义”不但是一种思潮而且是一种实践运动。这种观点反映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和“生态社会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区别,但却忽视了两者在内容上的一致性。

本书认为,第二种和第三种观点都有一定道理,但是需要把两者结合起来才能全面。在理论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和“生态社会主义”是一致的;在实践上,两者还是有区别的。在表示一种理论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和“生态社会主义”可以混用;但“混用”是有条件的,在表示一种社会运动时,应该使用“生态社会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只表示一种思潮。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说法和加拿大的本·阿格尔 1979 年的成名作《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有关。这本书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专著,而是向北美大学生介绍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教程,阿格尔在书中使用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又把它称为“北美马克思主义”。从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成为世界学术界普遍接受的话语,多数北美“红绿”人士沿用了这种说法。“生态社会主义”的说法可以追溯到德国生态运动中的一个左翼团体,他们自称为“社会主义先锋派”(the Socialist Pioneers)。可见,这两个概念产生的条件是不同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产生于学术研究,“生态社会主义”产生于社会运动;实际上,直到今天,欧洲生态运动的声势比北美要强大得多。但两者的基本理论是相同的。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生态社会主义出现了一系列的新变化。产生新变化的最主要动因是苏东剧变,另外生态帝国主义的猖獗、绿党内部各派力量的消长和后现代主义的衰落也是新变化的动因。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在生态社会主义内部,占主导地位的是“新无政府主义”倾向。所谓“新无政府主义”,就是传统的无政府社会主义融合了后现代主义和深生态学的内容。苏东剧变之后,随着大批共产党员和其他左派人士加入生态运动,“科学社会主义”倾向的影响日益扩大。因此,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生态社会主义出现了明显的新变化。本书的



重点就是对这些新变化进行研究。

##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近年来,生态社会主义已经成为国内学者关注的热点问题,大约有上百篇的论文发表,很多有关西方社会思潮的著作也对生态社会主义做了介绍,但关于生态社会主义的专著还不多见。这些研究成果对于了解生态社会主义思潮的发展进程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但是,相对于生态社会主义丰富而深远的影响,相对于国外丰富的论著,相关研究亟待加强。

### (一) 关于生态社会主义的国内著作

关于生态社会主义,笔者所见的国内学者的唯一专著是上海复旦大学陈学明教授的《生态社会主义》,2003年10月由台湾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该书是一部介绍性的著作。它介绍了从上个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最有代表性的4位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家:法国的安德烈·高兹、英国的大卫·佩珀、加拿大的本·阿格尔、美国的威廉·莱易斯;对他们最有影响力的著作和基本观点做了介绍,其中包括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2部著作。

1993年4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奚广庆、王谨主编的《西方新社会运动初探》,该书从新社会运动的角度涉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该书关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内容篇幅不大,而且是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观点。

1998年7月,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了陈林、侯玉兰等的《激进、温和,还是僭越?当代欧洲左翼政治现象审视》,从西方大左翼运动的角度涉及了生态社会主义,为研究生态社会主义提供了宏观的社会背景,但这本书显然不是关于生态社会主义的专著。

2002年7月,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刘东国的《绿党政治》对世界各国绿党做了全面研究。在介绍绿党内部派别的时候,涉及生态社会主义,并论述了生态社会主义和其他流派的关系。另外,山东大学郁庆治1998年出版的《绿色乌托邦:生态社会主义的社会哲学》和



2000 年出版的《欧洲绿党研究》，也是关于绿党研究的重要著作。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周穗明等人的两部著作也很有参考价值：《现代化：历史、理论与反思——兼论西方左翼的现代化批判》，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2 年 1 月出版；《文明的振荡——当代西方“后 30 年现象”》，由海天出版社 1998 年 8 月出版。这两部著作虽然不是关于生态社会主义的专著，但是从后现代主义的角度涉及了生态社会主义。

可见，国内关于生态社会主义的专著还非常少见，更多地从大左翼运动、新社会运动、绿党、后现代主义等角度涉及生态社会主义。

## （二）关于生态社会主义的重要译著

对生态社会主义的研究要进一步发展，必须有相当数量的高质量译著。国内学者在这方面也做了很多工作，但关于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的译著不多，靠译著还是无法满足研究的需要。

2005 年 1 月，山东大学郇庆治的译著《欧洲执政绿党》对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进入全国性政府的欧洲绿党做了介绍，对从绿党角度了解生态社会主义提供了帮助，但是该著作不是介绍生态社会主义的专著。

2005 年 1 月，山东大学国际政治专业 2003 级博士生刘颖翻译出版了佩珀的著作《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Eco-Socialism: From Deep Ecology to Social Justice*），原著的出版时间是 1993 年。

2003 年，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唐正东和炮兵学院南京分院政治理论教研室副教授臧佩洪翻译了美国生态社会主义者詹姆斯·奥康纳（James O'Connor）的著作《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Natural Causes: Essays in Ecological Marxism*），原著的出版时间是 1997 年。

1991 年 7 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慎之等翻译的本·阿格尔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流派做了全面介绍。该书第七章介绍了资本主义的危机理论，其中包括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若干观点，但篇幅也不长。阿格尔的原著出版是 1979 年，时间比较早，而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的生态社会主



义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

### （三）关于生态社会主义的研究生论文

近年来,还出现了一批关于生态社会主义的研究生论文,如:2001年,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汤传信的博士论文《生态社会主义研究》;2002年,北京大学罗永剑的硕士论文《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评析——兼论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思想》;2003年武汉大学柳红霞的硕士论文《绿色政治:生态社会主义》;2004年,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生骆光宗的《生态社会主义述评》;同年,中国人民大学孙绍燕的硕士论文《论生态社会主义思潮及其现代启示》等。

但是,在上述这些论文中,涉及20世纪90年代以后生态社会主义新变化的内容却很少。

### （四）关于生态社会主义的学术文章

随着生态问题日益成为我国的热点,国内在这方面的文章很多,可以找到的文章大约有100来篇,由于数量较多,不一一列出。

### （五）国外的研究现状

在国外,生态社会主义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思潮和运动,引起了西方学术界极大的关注,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自生态社会主义产生以来,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产生了大批代表人物。本书第一章第二节对此做了专门介绍。面对国外众多的生态社会主义者和大量的著作,需要进行合理的筛选。关于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生态社会主义者,本文选取了知名度较高的美国学者莱易斯和加拿大的阿格尔。

本书的重点是介绍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生态社会主义,所以主要选了4位代表性人物:法国的高兹、英国的佩珀、德国的萨卡尔、美国的福斯特。之所以这样选择,主要是因为他们分别来自不同的国家;其观点各不相同,具有多样性;其本人在国际生态社会主义圈子里享有较高的知名度。当然,本书还涉及其他生态社会主义者,并不是说他们的知名度就低,只是无法一一穷尽。另外,还有语言的原因,笔者只能阅读英文原著——除了英美的佩珀和福斯特,德国的萨卡尔的大量著作也是用英文写成的;高兹的原著都是用法文写成的,但是,他主要的著



作都已经被译成英文。关于上述几位学者的主要著作,本书的参考文献中已经列出。

## 二、选题意义

对于生态社会主义,要用科学社会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行全面的评析,不能简单地肯定或否定。本书的选题意义如下:

### (一) 学术意义

本书具有一定的前沿性。20 世纪 90 年代,由于各种政治和文化原因,很多共产党员和左翼人士加入了生态运动,给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带来了许多新变化,但是,国内能反映这些新变化的著作和文章相对还比较少;系统的介绍和评价显得不够。本书参阅了大量较新的外文原著,梳理了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生态社会主义的主要观点,和 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的主要观点进行了对比,并站在科学社会主义的立场上对各种生态社会主义观点进行了分析和评价,对于追踪、把握学术前沿问题具有一定意义。

### (二) 理论意义

对生态社会主义的研究涉及一些重大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问题,可以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提供借鉴。

第一,关于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失败的经验教训问题。这是当代科学社会主义探索的重大课题之一。生态社会主义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对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失败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对他们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总结,并提出:维护人与自然的和谐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尽管生态社会主义的某些观点有片面之处,但仍不乏启迪意义。

第二,关于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变革的问题。作为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一种“社会主义”运动,生态社会主义提出了关于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危机理论,并坚持解决生态危机的前途是社会主义。生态社会主义者对理想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进行了详细的描绘,并对实现理想社会的动力、主体、道路、指导思想、国际关系等



问题进行了探索,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这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第三,关于重新定位生态思想在马恩经典理论中地位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生态社会主义者重新发现了生态思想在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中的重要地位。他们认为,马克思不但有生态思想,而且还把生态思想运用到社会领域,对商品的循环过程进行分析。但是,商品的循环是一种虚假的新陈代谢,它违反了“归还的规律”,制造了“一个无法弥补的新陈代谢的裂缝”,要对这个裂缝进行系统性的修复,必须实行社会主义。这对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也有重大理论意义。

第四,关于全球化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生态社会主义提出了生态帝国主义的理论,批判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掠夺资源、输出污染、发动生态战争的恶行,并分析了阶级分化全球化的趋势。这对我们对外开放、应对全球化很有借鉴意义。

### (三) 现实意义

对生态社会主义进行批判的吸收,有助于使“生态文明”更好地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生态文明”首次被写入党的十七大报告,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认识的发展,中国当然应该有选择地借鉴生态社会主义的研究成果,建设中国的生态文明。

## 三、研究方法和逻辑结构

本书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对比的方法和“结构主义”的方法。

### (一) 对比的方法

第一,对20世纪90年代前后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变化进行对比,分析其发展走向。

第二,对一些重要的生态社会主义者(例如高兹、萨卡尔、佩珀、福斯特等)的思想进行对比,弄清其思想之异同;对某些生态社会主义者(例如高兹)自身的思想发展进行对比,分析其在20世纪90年代前后发生了哪些变化。



第三,对生态社会主义内部各流派之间的论争进行对比,尤其是生态社会主义与生态资本主义、生态激进主义之间的论争,发现其差异之所在。

第四,从大左翼运动的宏观视角,对生态社会主义与其他大左翼力量进行对比,发现“红”与“绿”之间的内在联系和区别。

第五,对生态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进行对比,界定两者之间的关系。

## (二)“结构主义”的方法

按照“结构主义”的说法,每个词语都镶嵌在一个“话语结构”之中。生态社会主义所说的“社会主义”和我们所说的科学“社会主义”镶嵌在两套不同的“话语结构”之中。只有弄清了这两套不同的“话语结构”,才可以参照科学社会主义的体系,对生态社会主义的体系进行对比和评价。要找出文字背后的“话语结构”,需要对不同的文本进行对比阅读,与沉默和空白对话,甚至对纠缠不清和自相矛盾的地方进行分析和解释,通过这些活动将词语背后的“话语结构”拖出来。

关于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的生态社会主义,国内研究成果较少,可参考的文章和著作有限,所以该论文写作没有一个现成的参考体系,缺乏一个坚实的立足点,很可能造成视野狭窄,甚至陷入某一局部问题不能自拔,造成论文缺乏“整体感”,成为一堆思想碎片的拼凑。只有发现词语背后贯通一致的东西——“话语结构”,把握这两套不同的“话语结构”,才能将局部问题置于这两套不同的“话语结构”中考察,从而获得比较全面的结论。

下面来谈本书的逻辑结构。

本书要说明的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生态社会主义的新变化,可以分成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的生态社会主义的简要介绍。这是本书的第一章,为讨论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的新变化进行铺垫。第一章第一节主要说明了生态社会主义的产生背景。生态社会主义产生于 20 世纪 70 年代,其产生背景主要包括环境危机的出现、国际工人运动的衰落、“新社会运动”的崛起和后现代主义的勃兴。第一章第二



节的主要内容是说明生态社会主义的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其特点是“红色绿化”；第二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其特点是“红绿交融”；第三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至今，其特点是“绿色红化”。第一章第三节简要说明了20世纪90年代以前生态社会主义的主要观点。虽然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生态社会主义者提出了当代资本主义新的危机理论；指明了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设计了解决生态危机的种种方案，但是其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倾向、反对科学技术的态度、乌托邦的色彩非常明显。

本书第二部分即第二章，是对20世纪90年代以后生态社会主义的新变化及其动因的分析说明。20世纪90年代以后，生态社会主义的新变化，主要包括六个方面：对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的失败进行了反思，提出了关于生态帝国主义的新理论，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更加深刻，经济政策更加务实，在政治理论上更加重视工人阶级和阶级斗争，在指导思想上反对“新无政府主义”、坚持“科学社会主义”。苏东剧变是最主要的动因，另外生态帝国主义的猖獗、绿党内部各派力量的消长和后现代主义的衰落也是新变化的动因。

本书第三部分详细说明和评价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生态社会主义的新观点。首先介评的是生态社会主义者对苏联生态教训的反思和对生态帝国主义的批判。这两个新变化是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生态社会主义者未曾深入研究过的，基本上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出现的全新内容。这是本书的第三章。第四章讨论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生态社会主义的另外三个新变化：生态危机的根源与解决生态危机的前途，实现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的动力、主体与道路，生态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20世纪90年代以前，生态社会主义对这三个方面也曾有过详细的论述；但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这些问题上，生态社会主义发生了明显的理论转折，形成了很多新的观点。由于这一部分是本书的重点，内容较多，故将之分成两章，一是因为各章内容之间的联系相对更加密切；二是求得篇幅的协调匀称。

本书第四部分即第五章，论述了生态社会主义的实践和对中国的启示。生态社会主义实践的主要形式是“红绿联盟”。本章论述了“红



绿联盟”在西欧各国执政的概况,并对德国的“红绿联盟”政府进行了重点研究。研究生态社会主义的真正目的是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借鉴。生态社会主义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友邻”流派,在政治、经济、思想、外交方面对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但是,生态社会主义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科学社会主义,所以,在借鉴生态社会主义的时候,要划清科学社会主义和生态社会主义的界限,在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立场的基础上,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 第一章

# 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的 生态社会主义概述

生态社会主义产生于 20 世纪 70 年代的西方生态运动,目前已成为一种很有影响的社会主义流派。它是“社会主义”和生态运动相结合,建立“红绿联盟”的产物,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对当代生态运动的影响,反映了当代西方左派从生态角度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也反映了解决生态危机的出路与社会主义前途的必然联系。尽管生态社会主义并非完全意义上的科学社会主义,但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启示,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友邻流派。

## 第一节 生态社会主义的产生背景

关于生态社会主义产生的历史背景,国内外学者做出了种种解释,从不同的侧面说明了生态社会主义兴起的背景,概括起来,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环境危机的出现、国际工人运动的衰落、“新社会运动”的崛起和后现代主义的勃兴。

### 一、环境危机的出现

生态社会主义产生的最直接背景当然是环境危机,但是,要弄清楚



的是：造成环境危机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

资本主义的剩余价值最大化要求生产最大化，而生产最大化必然要求消费最大化；如果消费最大化不能实现，其结果必然是经济危机。20 世纪 30 年代，为了摆脱经济危机，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开始接受凯恩斯主义，并依据它制定经济政策。凯恩斯主义主张通过扩大消费，甚至是浪费性的消费，来推动经济增长，缓解经济危机和失业问题。在国家政策、资本和广告的合谋之下，产生了生态社会主义者所说的“异化消费”。“异化消费”延缓了经济危机，却造成了生态危机。因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并没有被消除，只是表现形式发生了变化，生产的无限扩大化与社会购买力有限性之间的矛盾暂时缓解，生产的无限扩大化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有限性之间的矛盾凸显出来。

自 20 世纪 50 年代初，到 1973 年资本主义世界出现经济危机之前，西方发达国家经历了大约 20 年的经济高速增长，这一段时期被称为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但是，高速的经济增长，无疑加剧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无限扩大化与自然资源和环境承载能力有限性之间的矛盾，从而产生了一系列的能源危机和环境危机；同时，垄断资产阶级不但对不发达国家进行经济上的剥削，还推行生态帝国主义政策，对发展中国家的资源进行掠夺，并将环境污染转嫁到发展中国家，从而使资源和环境问题超越民族和国家，成为全球性问题。

面对资本主义盲目生产所引起的恶果，生态问题受到了全世界人民的普遍关注，人们不得不去思考生态危机的根源和解决办法。1962 年，美国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出版了《寂静的春天》，第一次从生态学角度阐述了人类同环境的关系，标志着新的“生态学时代”的开始，次年被联合国定为国际自然保护年。1968 年，罗马俱乐部成立，并于 1972 年发表了《增长的极限》的报告，第一次以系统的科学论证向世人敲响了环境警钟；同年 6 月，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在斯德哥尔摩召开，并通过了《人类环境宣言》。1973 年的石油危机应验了罗马俱乐部的预言，使环境问题得到了更为广泛的关注。

因此，群众性的生态运动在西方蓬勃兴起，成为西方“新社会运动”的主流。尽管它们都是一些自发性组织，甚至在生态保护方面显得过



于激进,但是却发展迅猛,对西方社会产生了强烈的影响。随着生态运动日益高涨,20世纪80年代,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从日益高涨的生态运动中,相继出现了绿党,并登上政治舞台,形成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把“新社会运动”推向了高潮。自绿党成立之初,生态社会主义作为绿党的一个流派,就在绿党内部发挥着重要的影响。

## 二、国际工人运动的衰落

生态社会主义的产生也有深刻的社会政治背景。二战以后,整个国际工人运动开始进入低潮。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生产力获得了巨大发展,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调整,由此引起了相应的阶级结构的变化,这主要表现在:传统工人阶级的队伍日益缩小,而且逐渐“丧失了阶级意识”;中产阶级的数量日益增长,逐渐成为社会的主要成分,尽管他们在丰裕的物质生活中也对资本主义怀有不满,但是,他们无论是在物质生活方面还是在精神生活方面,都和传统的工人阶级不同。与此同时,丰裕的社会财富也使统治阶级获得了较大的回旋余地,可以通过政策调整,来缓和阶级矛盾,维持社会稳定。

在这种情况下,传统工人运动在西方国家普遍走向衰落。西方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工党建立的所谓“福利国家”,并没有为彻底改变资本主义制度找到一条可行的道路;西方国家的共产党提出的“欧洲共产主义”,也因各种原因没能引起人们广泛的关注。在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斯大林主义”在经济、政治、文化上引起了种种负面效果,这对西方的左派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西方国家的激进分子对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失去了信心。从整体上来看,国际工人运动处于低潮。

但是,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并未消除。随着工人运动的衰落,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表现形式在其他方面日益凸显出来,如:战争危机、核危机、生态危机、女权问题、人的异化,等等。面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危机,面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现实,为了消除资本主义制度弊端,西方的广大民众不得不开始寻求新的社会变革道路,这是生态社会主义产生的另一个政治背景。



同时,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阶级结构的变化也为绿党和生态社会主义的兴起提供了阶级基础。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构成了整个西方社会的主体,他们在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大网中感到了一种“舒适的、平滑的、合情合理的、民主的不自由”,对资本主义的种种社会危机保持着敏感,因而时常会做出五花八门的反叛的举动。正是这些中产阶级构成了绿党和生态社会主义运动的阶级基础和行动主体。

### 三、“新社会运动”的崛起

从 20 世纪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开始,在“左”和“右”的中间地带,兴起了一场广泛的、持久的“新社会运动”。“新社会运动”的参与者以中产阶级为主体,他们卓尔不群于当权派及其追随者,向往一个替代社会(alternative society),是潜在的革命力量;但是,他们又异质于传统的工人运动和其他左翼运动。“新社会运动”包括反战运动、反核运动、种族运动、宗教运动、女权运动、生态运动,还包括同性恋、嬉皮士等社会现象。“新社会运动”极大地改变了整个欧美国家的政治格局和政治理念,也对世界未来的政治走向产生着深刻的影响。

“新社会运动”的开端是法国巴黎的“五月风暴”。1968 年 5 月,上千万的学生、工人和职员走上街头,这个数字几乎是法国全部劳动力的总数。“造反者”们在巴黎街头筑起街垒与数万警察和宪兵展开巷战,法国政府还动用了坦克和伞兵。“五月风暴”给法国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是 300 亿法郎;不久之后,戴高乐总统因此下台。而且,这场风暴越过国界,像野火一样烧遍了整个西方世界。

“五月风暴”的动因是什么呢?按照传统的说法,经济危机引起革命。但是,这场风暴却发生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高速增长的“黄金时代”,学生领袖和他们的支持者享受着丰裕的物质生活,所以,引起这场风暴的原因并非经济因素。它的动因主要来自思想观念领域,是一场“产生于厌恶的革命”。“造反者”们厌恶的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工具理性对人天性的扭曲。现代社会构建在工具理性的基础上:在科学技



术的基础上构建起了庞大的工业体系；在经济理性的基础上构建起了无限扩张的市场体系；在科学管理的基础上构建起了科层体制的金字塔——整个社会仿佛变成了一台庞大的机器。人被异化了，沦为这台机器上一个渺小的部件。往哪里安放人的天性呢？“造反者”们就是要去反对人的异化，把人的天性归还到人本身。

“新社会运动”和传统社会运动相比，具有以下几个“新”特征：

第一，参与主体的社会背景广泛而复杂。和传统的工人运动相比，“新社会运动”把不同阶级、不同阶层、不同政党的人士大量卷了进来，由于参加者的社会背景复杂，所以它并不体现为某一阶级的独立运动，没有鲜明的阶级倾向。

第二，没有长远、系统的政治目标。其斗争目标不局限于传统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而是上升到文化层面，突出日常生活批判的主题，诸如人性异化、环境破坏、性别压抑等；运动的发动常常来自参与者情绪的自然宣泄，没有经过科学的系统论证和事先的策划，所以缺乏远大的理想和系统的纲领。

第三，组织松散、不稳定。由于参与主体的社会背景和政治倾向复杂多样，所以，其组织形式也杂乱无章，变动不定，缺乏统一的组织纪律。常常是，当它的某种要求获得了实现，其组织也就销声匿迹了，或者转向其他方面。

第四，革命手段不同。与传统社会革命倡导的“暴力革命”不同，“新社会运动”奉行“非暴力”原则，采取抗议、罢工、游行、示威、侵占等“制度外”斗争方式。“非暴力”原则因为印度民族解放运动领袖甘地而声名大噪；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民权运动中，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又竭力倡导这一原则。后来，“非暴力”原则成为“新社会运动”的理论支柱之一。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除生态运动和女性运动之外的其他“新社会运动”都是旋起旋落，一旦其政治要求获得解决或者一定程度的解决，这个运动也就淡出政治舞台，或者保持在较低的水平上。但是，生态运动跟其他运动不同，由于环境问题不但没有得到解决，反而呈现出日益恶化的趋势，所以生态运动一直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上；而且，到20



世纪 80 年代,“新社会运动”从过去“制度外”斗争的方式,转向“穿越制度的长征”来实现对现行社会的改造,即通过制度化的方式来实现原来非制度化的目标。于是,从生态运动中产生了绿党,很多国家的绿党还进入了议会,和其他主流政党联合执政,生态运动逐渐从“制度外”斗争转向“制度内”斗争。随着绿党的崛起,“新社会运动”成为欧洲政治舞台上一支稳定的力量。

由此看来,绿党之“绿”有两层含义,一是生态含义,二是政治含义。一方面,它代表生生不息的生命和人与自然的和谐,这是绿党的“生态”含义;另一方面,“绿党”之“绿”代表了一种中间阶级和中间道路。“绿”是相对于共产党、社会民主党等所代表的“红”和各类资产阶级政党所代表的“白”而言的,绿党试图超越“左”和“右”,去寻找一条社会变革的“第三条道路”,所以,绿党的一个著名的口号是:“我们既不右,也不左,而是向前的。”(We are not on the right, nor the left, but the front.) 尽管绿党标榜中立,但从总体上看,大多数国内外学者仍把绿党看作是西方广泛含义上的左翼政治力量,或者叫做“大左翼”政治力量。

生态社会主义作为绿党的一个重要流派,它的基本特征是:一方面,它不满资本主义的社会现实,把其主要批判矛头指向资本主义反人道和反自然的倾向,反映了以生态主义者为核心的各阶层群众对在资本主义社会框架内解决生态危机已经丧失了信心,转而希望探索一种更合理的新的社会制度,这构成了连接“红”与“绿”的纽带;另一方面,生态社会主义是生态运动和左翼运动“红绿交融”的产物,它区别于科学社会主义。生态社会主义在理论出发点、阶级基础、社会变革道路以及指导思想等方面,与我们所坚持的科学社会主义存在着差距。

#### 四、后现代主义的勃兴

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和发展是生态社会主义产生的文化背景。多数国内外学者把“新社会运动”看作是后现代政治的实践,而绿党是“新社会运动”的产物,作为绿党的一个流派,生态社会主义当然和后现代主义有着密切的联系。



后现代主义是“后现代社会”的产物。随着产业结构和阶级结构的变化,西方发达国家相继进入了“后现代社会”(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等),相应地,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也发生了变化。

后现代主义的价值观为生态社会主义分析资本主义提供了新的价值尺度。随着现代社会向后现代社会的转变,人们的价值观念也发生了变化,特别是二战以后出生的年轻一代,他们的价值观从传统的重物质取向,转变为重意义的“后物质主义价值取向”。传统价值观念追求的是产量、效率、成就和个人财富等;而后现代主义价值观追求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温情和人与自然的和谐,因而后现代主义能跳出物质主义的圈子,对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做出新的判断: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表现形式已经从物质生产和分配领域下移,转移到消费领域,表现为异化的消费和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因而,生态社会主义反对经济高速增长,主张实行稳态经济,推崇典型示范的生活方式。

后现代主义还为生态社会主义提供了重要的分析方法。反对工具理性的霸权,重建人文理性和工具理性之间的关系,是后现代主义的主题。后现代主义认为,自文艺复兴以来,人类所确立的对理性的信仰包括互相补充的两个方面:以科学技术为主要内容的工具理性,和以人的自由解放为核心的人文理性。但是,在现代社会,人文理性已经陷入全面危机,自然科学全面侵占了人文科学的地盘,形成了“科学的专制”和“理性的放荡”局面。因此,后现代主义者常常怀着批判的精神来审视科学技术,颠覆科学的霸权地位。这对生态社会主义产生了显著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以前,生态社会主义总体上对科学技术所代表的工具理性持批判态度,他们反对大工业社会,渴望回归前工业社会质朴的丛林生活。同时,新的科学技术发展的确带来了诸多科学技术本身也无法预测的负面生态效应,这些负面效应已经累积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可以不夸张地说,从来没有哪个文明能像我们这样,它所创造出来的技术手段可以摧毁这个文明本身。

后现代主义为生态社会主义“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提供了依据。后现代主义采取一种彻底的文化无政府主义策略,通过消除一切



“中心”，来反对工具理性的霸权，从而重建人文理性和工具理性之间的关系。因此，后现代主义宣扬“去中心”、“多元化”的“解构主义”。这种观点和生态社会主义所坚持的“非人类中心主义”颇有契合之处。生态社会主义认为：自然界本身是“多元的”、“无中心”的，要保护环境，人类必须跳出“人类中心主义”的窠臼，站在“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上来尊重和保护自然，不应该只是以是否对人类有用的尺度去衡量其他物种的价值，任何生物都有其天然的“内在的价值”(intrinsic value)，因此，任何生物都应该受到保护——并不只是因为对人类有用，而是因为它的内在价值。

生态社会主义的思想明显地受到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后现代主义正式出现是 20 世纪 50 年代末至 60 年代前期。其声势夺人并震慑思想界是在 20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而这一时期也正是生态社会主义的兴起和发展的重要阶段。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后现代主义耗尽了它颠覆一切的冲动——颠覆一切也意味着对后现代主义本身的颠覆，这是后现代主义的悖论。所以，后现代主义开始表现出狂躁以后的疲惫，如一只泼尽了水的空碗，声势大减，生态社会主义也出现了从后现代主义重返现代主义的趋势，一些生态社会主义者提出了“捍卫现代性”的主张。可见，生态社会主义的兴起、发展和转向与后现代主义的兴起、发展和衰落是同步的。

## 第二节 生态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

生态社会主义的产生和绿党的产生无法分割。生态社会主义作为绿党的一个流派，这只是根据其理论特征来划分的，绿党的组织十分松散，其内部各流派之间没有严格的组织界限，所以，很难找到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来确定生态社会主义的具体产生时间。自绿党成立之初，它就在绿党内部发挥着重要的影响，“红”和“绿”本身就有内在的联系。所以，多数学者把绿党的产生当作生态社会主义的产生，是有道理的。



在生态运动和其他“新社会运动”兴起之初,西方各国普遍出现了众多的民间生态团体,为一些社区性的、具体的政治议题而斗争,它们没有稳定的组织,没有明确的纲领,也无法经常性地参加全国和地方性的选举,它们主要的斗争方式是进行“制度外”的抗议活动。随着环境运动规模的扩大,斗争的主题和内容都发生了变化,从早期的动员群众、唤醒社会的生态意识,转变为对国家的决策层施加影响,将民众的生态意识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并通过立法程序转变成社会实践。斗争内容的转换使得早期的“制度外”斗争不能适应新的形势,建立统一的全国性的政党渐渐提上了西方各国生态运动的政治议程。

世界上第一个全国性的绿党是1972年5月成立的新西兰“价值党”。1972年,初出茅庐的“价值党”就参加了新西兰的全国议会选举,并获得了2.7%的选票;1975年,该党的选票进一步上升到5.2%,引起了新闻界的广泛关注。它发表的竞选声明《新西兰蓝图》强调人口和经济的零增长;发展以人为核心的技术,建立一种新的环境友好型工业和能源系统;建立民主的分散化的政府;强调男女平等和人民的权利等。由于“价值党”内部派别斗争严重,20世纪80年代,该党分裂,从此销声匿迹,但它提出的一些思想却产生了较大影响,构成了后来世界各国绿党的基本观点。随后欧美许多国家都成立了绿党。绿党诞生后,这头“绿色的公牛”很快在政治上显示了活力,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舞台上扮演了一个引人注目的角色。进入20世纪80年代,德国、奥地利、比利时、意大利、英国、法国、芬兰、希腊、爱尔兰、卢森堡、瑞士等国的绿党相继通过大选在地方议会中获得数量不等的席位,取得了一定的政治地位和政治权利。

生态社会主义作为生态运动中的一个主要思潮和流派,大致经历了三个历史发展阶段。

### 一、“红色绿化”阶段

第一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以鲁道夫·巴罗、亚当·沙夫为代表,其特点是“红色绿化”。



鲁道夫·巴罗(Rudolf Bahro),生于波兰,原居东柏林,曾为民主德国共产党员。他从人道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对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提出了批评,因出版《东欧的选择》一书被判刑。20 世纪 70 年代末,巴罗移居联邦德国,在汉诺威大学任教授,受到了绿色左派人士的欢迎,后来成为联邦德国著名的社会活动家、绿党的主要理论家,被称为西方“社会主义生态运动的代言人”。1985 年,他因不满绿党的轮换制而转投德国社民党。他“热衷于幻想和预言”,在理论上主张“红”与“绿”政治力量的汇合,要求建立一个由生态运动、妇女运动和一切进步的非暴力社会组织组成的广泛的群众联盟。他有关生态问题的代表作有《社会主义与幸存者》(*Socialism and Survival*)、《社会主义,生态学与乌托邦》(*Socialism, Ecology and Utopia: An Interview*)、《由红到绿:与〈新左派评论〉的对话》(*From Red to Green: Interview with New Left Review*)、《建造绿色运动》(*Building the Green Movement*)等著作和文章。

亚当·沙夫,波兰共产党意识形态负责人,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波兰“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1968 年,沙夫被波兰共产党解职。沙夫后来担任了奥地利大学的客座教授、维也纳大学的哲学教授。1972 年,他成为“罗马俱乐部”早期的成员之一,1980 年任罗马俱乐部执行委员会主席,是共产党人中最先介入生态运动的人。

巴罗、沙夫等人从共产党转向绿党或者生态运动,被看作是“红色绿化”。他们的政治道路的典型特征是“从红到绿”。

## 二、“红绿交融”阶段

第二阶段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威廉·莱易斯、本·阿格尔和安德烈·高兹为代表,其特点是“红绿交融”。

20 世纪 80 年代,除了欧洲,生态社会主义在北美也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其代表人物是美国学者威廉·莱易斯(William Leiss)和加拿大学者本·阿格尔(Ben Agger)。阿格尔和莱易斯一起被认为是生态社会主义承上启下的代表人物。他们使生态社会主义从一种专家学者在



书斋里研究的纯学术理论,变成一种与现实的生态运动相结合的实践活动,使生态社会主义真正从西方绿色运动中分化出来,与社会主义运动汇合在一起;而且,阿格尔与莱易斯使生态社会主义成为较完整的理论体系:不仅包括当代资本主义危机理论、资本主义批判理论,而且还包括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动力、道路、策略的理论,以及关于未来生态社会主义社会较完整的构想。

威廉·莱易斯,是美国生态社会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著名社会学家。莱易斯师承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尔库塞,是联系法兰克福学派和生态社会主义之间的桥梁。莱易斯深受马尔库塞的影响,但是,莱易斯摒弃了法兰克福学派偏重哲理和书本的倾向,致力于经验世界的研究。从1974到1976年,他接连出版了《自然的统治》和《满足的极限》两本书,是“北美马克思主义”(即“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两部重要代表作。

1979年,阿格尔出版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在书中正式提出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并把莱易斯的两部著作——《自然的统治》和《满足的极限》,当作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作。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的序言中,阿格尔认为: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表述得最清楚、最系统的是莱易斯。从此,阿格尔使莱易斯一举成名,成为20世纪80年代生态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

莱易斯旗帜鲜明地主张以马克思主义透视绿色理论,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学的结合。他强调对马克思异化理论的继承,对资本主义的异化消费现象提出了批判,他预言社会革命的导火线即将出现在消费领域,而不是生产领域。同时,他对未来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进行了构想,设想了未来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和社会生活等,使生态社会主义成为一个系统的理论。20世纪80年代,生态社会主义运动在生态运动中独树一帜,使生态运动呈现出“红绿交融”的局面,这和莱易斯的贡献不无关系。

莱易斯在20世纪70年代出版了上述作品之后,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又出版了一系列有影响力的著作。但是,总的来说,莱易斯日益专注于对科学技术本身的研究,例如,如何制定安全标准,防止



技术的负面效应,从而日益远离了生态社会主义政治理论研究。

20 世纪 80 年代,北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代表人物是加拿大滑铁卢大学社会学教授本·阿格尔。阿格尔在生态社会主义的发展过程中,起了关键性作用。阿格尔不但是生态社会主义者,而且是“北美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北美马克思主义”,是 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在美国和加拿大等国的校园掀起的一股探索马克思主义的思潮。阿格尔本人也是在这一探索过程中成长起来的,后来他成了这一思潮在加拿大的主要发言人,与在美国的一些代表人物遥相呼应。阿格尔反对沉溺于对马克思主义做纯粹的理论研究,而是注重面向现实,尤其是面向当代世界生态危机的现实,致力于把生态问题纳入“北美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研究课题,使“北美马克思主义”走向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

阿格尔在 20 世纪 70 年代后半期发表了《论幸福和被毁的生活》、《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等著作,使“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及其基本思想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认同。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专门有一章论述“走向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最新发展阶段。他考察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危机理论在当代的新发展,提出了当代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理论:资本主义的扩张动力是挥霍性工业生产的根源,是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揭示了资本主义国家政权在形成生态危机过程中的作用。

阿格尔的理论背景非常广博。一般认为,生态社会主义有三方面的理论来源:一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辩证法;二是生态学、系统论、未来学的理论成果;三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阿格尔不是只与其中一个方面有理论渊源,而是较全面地继承了这三方面的理论。他除了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生态社会主义有比较深入的研究之外,在批判理论、女权主义和话语理论方面也有很多建树。从阿格尔的著述可以看出,虽然他被看成是生态社会主义承上启下的人物,但对生态社会主义的研究只是他理论成果中的一小部分。

20 世纪 80 年代,生态社会主义在欧洲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法国的



安德烈·高兹(André Gorz)。他不但是生态社会主义的重要理论家,而且是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

高兹和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有过密切的交往,是萨特的得意门生。20世纪50年代初,他和萨特一样,与共产党密切合作。20世纪50年代中期,波匈事件以后,高兹又和萨特一起疏远共产党。但是,就是在高兹和共产党脱离关系以后,他开始了把马克思主义和存在主义融合在一起的研究:一方面,他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去重新反思原先的存在主义观点;另一方面,他又致力于从存在主义的立场出发去批评和修正马克思主义。

20世纪70年代以后,高兹的思想发生了重大的转折。他的研究领域从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转移到生态政治学领域,他也从一个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者转变成为一个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是一个典型的“由红变绿”的理论家。

高兹是《新观察家》周刊创始人。他著作的英译本有《作为政治学的生态学》、《生态学与自由》,还有几部著作也非常有影响,虽然它们从表面看论述的是生态政治学以外的问题,但是实际上也和生态政治学颇有关系,如《劳动分工: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劳动过程与阶级斗争》(*The Division of Labour: The Labour Process and Class Struggle in Modern Capitalism*)、《告别工人阶级》(*Farewell to the Working Class*)、《通往天堂之路:从工作中解放》(*Paths to Paradise: On the Liberation From Work*)、《经济理性批判》(*Critique of Economic Reason*)等。

高兹把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与对工具理性的批判联系在一起,认为科学技术即意识形态,是一种控制术,这显然是受到了后现代主义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以后,这种观点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变。他强调,生态运动绝不能局限于生态运动本身,必须成为一个更加广泛的斗争的一部分,必须把生态问题与社会主义的前途结合起来,要解决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危机,必须按照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方式来实现。而且,高兹从解决生态危机的角度出发,具体生动地描述了生态社会主义的乌托邦图景。



### 三、“绿色红化”阶段

第三阶段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至今,其代表人物有安德烈·高兹、乔治·拉比卡、瑞尼尔·格伦德曼、撒鲁尔·萨卡尔、大卫·佩珀、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等欧美学者和左翼社会活动家,其特点是“绿色红化”。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高兹仍是生态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他继续对实现理想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的道路进行了探索,仍有颇具影响的著作问世,其英译本著作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生态学》(*Capitalism, Socialism, Ecology*, 1994, 法文版的出版时间是 1991 年)、《收回工作:超越工资社会》(*Reclaiming Work: Beyond the Wage-based Society*, 1999, 法文版出版时间是 1997 年)。高兹对生态社会主义的研究从 20 世纪 70 年代一直持续到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这在世界上的生态社会主义者中是非常少见的。高兹晚期的著作充满了悲观的预言,2007 年 9 月,高兹和妻子被友人发现在巴黎郊区家中双双自杀身亡,二人享年 84 岁。

另一位法国的代表人物是乔治·拉比卡。他早年参加过法国共产党,后因对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的失望而脱离法共,成为法国左翼运动的主要理论家之一。他曾担任过法国社会科学中心主任,法国巴黎第十大学校长、教授。20 世纪 80 年代末苏东剧变以后,他连续发表《生态学与阶级斗争》等论文,着力研究全球生态危机与生态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认为只有生态社会主义才能使世界真正摆脱生态危机,生态社会主义是生态运动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生态社会主义标志着工人运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即“工人运动的文化革命阶段”。

瑞尼尔·格伦德曼,德国左翼学者,哲学家,主张以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解决全球生态危机。他反对资本主义对自然的破坏和剥夺,也反对生态中心主义的自然崇拜;他批判资本主义的技术中心主义,也批判非理性的生态原教旨主义(深绿派)。他的主要理论贡献是为马克思的“人类中心主义”正名,捍卫马克思主义在人与



自然关系上所代表的理性传统,反对借口批判技术中心主义而否定一切形式的人类中心主义,着力为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奠定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基础。

另一位德国生态社会主义代表人物是撒鲁尔·萨卡尔(Saral Sarkar)。他1936年生于印度西本格拉,毕业于加尔各答大学,并在德国歌德学院学习德语和德国文学。1982年移居德国,积极参加德国绿色运动与和平运动,是德国绿党成员和社会主义者。多年来,他一直参与绿色政治争论,广泛地在印度、欧洲各国和美国杂志上发表文章。他的代表作是《西德绿色替代政治》(两卷本,1993,1994)和《生态社会主义还是生态资本主义?对人类基本选择的批判分析》(1999)。萨卡尔对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解体的原因进行了详细分析,并精细地描述了未来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和瑞尼尔·格伦德曼有所不同,萨卡尔明显地带有“深绿派”的色彩,他强烈地质疑科学技术,坚持“生态中心主义”的立场,并且与高兹和佩珀等人展开了论战。尽管笔者在很多方面并不赞成他的观点,但必须承认,萨卡尔代表着20世纪90年代以后生态社会主义中一种“生态中心主义”的观点,而且颇有影响。

大卫·佩珀是英国牛津布鲁克斯大学地理系主讲教师,20世纪90年代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佩珀的代表作有《现代环境主义的根源》和《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等。与前面几位生态社会主义者相比,佩珀的政治理论立场更接近于马克思的“革命的社会主义”。佩珀的主要理论贡献在于,他比较清晰地勾勒了生态运动中“红色绿党”和“绿色绿党”在理论上的深层次的区分,并且提出了用马克思主义来推动生态社会主义的发展。“绿色红化”的特点在佩珀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是美国著名的生态社会主义者,俄勒冈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目前担任美国《每月评论》(*Monthly Review*)杂志的联合编辑,该杂志已有50多年历史,在英语世界的社会主义圈子中颇有影响。他在生态社会主义方面的著述颇丰,20世纪90年代,他主要著作有:《反资本主义的生态学》(*Ecology Against Capitalism*, 2002),《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



自然》(*Marx's Ecology: Materialism and Nature*, 2000),《脆弱的星球,环境经济简史》(*The Vulnerable Planet, A Short Economic History of Environment*, 1994)。福斯特是一位集大成的生态社会主义者,他的论述涉及苏联的生态问题、生态危机的根源、生态帝国主义、马克思的生态思想等。

这一阶段生态社会主义的总体趋势是“绿色红化”。在这一阶段,不但出现像大卫·佩珀那样的人物,从研究生态学转而研究马克思主义;而且还出现了像拉比卡、格伦德曼和福斯特那样的人物,更加重视从生态角度对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研究。

生态社会主义自 20 世纪 70 年代产生以来,经历了上述“从红到绿”、“红绿交融”和“绿色红化”三个阶段,尽管这只是根据其内容的发展变化所做的一个粗略的划分,但从总体上看,生态社会主义在经历了这三个阶段之后,从生态运动中脱颖而出,成为当代西方社会主义运动中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同时,在生态社会主义内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影响在日益扩大。

### 第三节 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 生态社会主义的主要观点

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生态社会主义经过“从红到绿”和“红绿交融”两个阶段的发展,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不完全是我们所说的科学社会主义)和生态运动的融合。它主张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并以“生态危机”理论补充和完善马克思主义;它从生态问题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入手,探索了生态危机的根源,提出了解决生态危机的社会主义前途;它描绘了理想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并探索了实现这个理想社会的动力、主体、道路等,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本节将简要回顾 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生态社会主义的主要观点。



## 一、用“生态危机”理论补充马克思主义

20世纪七八十年代,生态社会主义者通过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分析,看到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表现形式的新变化,并提出用生态危机理论来补充和完善马克思主义。

对上述观点进行充分论述的是加拿大的阿格尔。1979年,阿格尔出版了他的代表作《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形成了当代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理论。在该书中,他明确提出:生态危机是当代资本主义的主要危机,资本主义的危机已经从生产领域转移到了消费领域,生态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

因此,在批判资本主义的同时,阿格尔断言: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危机的理论已经失去了时效。阿格尔说:“我们的中心论点是,历史的变化已使马克思主义原先关于只发生在工业资本主义生产领域的危机理论失效了。”<sup>①</sup>阿格尔提出的理由有两条:第一,当代资本主义的生产能力获得了巨大的发展,足以向工人阶级提供以前只有资产阶级上流人物才能消费的商品,劳资之间的矛盾减弱了,工人阶级丧失了阶级意识,使得马克思关于经济危机必然导致政治革命的设想落空了;第二,马克思错误地认为,只有生产领域中的危机才能导致资本主义的崩溃,没有充分分析消费领域,这是马克思的理论不能适用于当代资本主义的主要原因。

阿格尔认为,必须对当代资本主义危机进行新的探索,提出新的危机理论。他把“生态危机”理论与奥康纳的“财政危机”理论、哈贝马斯的“合法性危机”理论相提并论,把它们看作是对当代资本主义进行解释的三大最重要的理论。这些理论都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危机的场所已由生产领域转移到了其他领域:消费领域、政治领域和文化领域。这三种对资本主义危机的新探索是互相补充的:“财政危机”理论涉及的是资

<sup>①</sup> 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慎之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86页。



本主义的权力关系，“合法性危机”理论谈论的是资本主义的文化霸权，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则更加注重未来社会主义的社会经济结构；“财政危机”和“合法性”危机理论注重的是对社会关系的考察，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重点考察的是资本主义社会与整个生态系统之间的基本矛盾。

阿格尔认为，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理论以莱易斯和他本人为代表，从生态角度对资本主义的危机进行了探索。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与整个生态系统存在着根深蒂固的矛盾，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无限扩张性导致了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资本主义利益最大化的动机要求生产最大化，生产最大化要求消费最大化，最大化的消费必然造成资源短缺和污染最大化，破坏了自然生态系统。来自生态危机的压力将会迫使人们对资本主义的工业文明进行彻底的反思和重新评价，从而为实现社会主义社会提供了强大的动力。

阿格尔断言马克思主义过时的目的倒不是去彻底否定马克思主义，而是去挽救马克思主义。所以，他强调用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理论去补充和完善马克思主义。因此，他仍然举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帜，把他本人和莱易斯的生态理论称作“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或者“北美马克思主义”。但是，阿格尔承认，大多数美国民众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保持着距离，怎样使“北美马克思主义”在北美扎下根呢？阿格尔的策略是：首先把生态社会主义嫁接到北美民主主义上。

阿格尔通过研究得出结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可以而且应该嫁接到北美民主主义上去。他认为，北美政治生活中存在着由来已久的民主主义传统，对高压统治和大企业抱有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北美民主主义的政治主张是人们直接管理自己，其政治理想是非集中化的、反国家主义的。北美的民主非常贴近“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分散化、非官僚化和工人管理三项基本要求，“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可以在北美的土壤中生长。一旦与传统美国生活中的民主主义基础相结合，“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就会获得生机。

阿格尔认为，大多数美国人之所以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保持着距离，主要是由于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造成的，即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本质上是极权主义的。实际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完全是反极



权主义的。一旦他们明白这一点,就会对马克思主义持欢迎的态度,就会积极地实施民主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而这将给北美带来美好的前途。

那么如何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嫁接到北美的民主主义上去呢?阿格尔认为,应从两者最契合的地方开始,即从对官僚化的批判开始。官僚化是以破碎分工为基础的,所以,也就是从批判破碎分工开始。对破碎分工的批判是沟通“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和北美的民主主义的桥梁,批判分工与阶级斗争目标是密切相关的。取消分工和夺取生产资料相比,更有可能突破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领导权,成为阶级斗争新形式。阿格尔认为,假如“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民主主义在批判分工这一点上携起手来,并成功地成为一种阶级斗争,那么,“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就在北美扎下了根,并将对北美人民产生重大影响。

阿格尔提出了当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表现形式的新变化,并从生态危机来理解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显然颇有见地。但是,阿格尔笼统地断言,生态危机已经取代了经济危机,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危机理论已经失去时效,这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在阿格尔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把生态社会主义嫁接到北美民主主义的论述是很有特色的部分,他醉心于这种理论嫁接,尽管他用心良苦,为了使马克思主义在北美广泛传播,但正如许多评论者所说,阿格尔的“北美马克思主义”中还是充满了乌托邦式的幻想。

## 二、生态危机的根源

生态社会主义者都能在一定程度上利用马克思主义,从不同的角度,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根源进行分析,并能最终达成一致的结论:生态危机的主要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他们对生态危机根源的分析可以概括为经济、科技、文化三个方面,即:异化消费、对技术的选择、对自然控制与对人的控制。

### (一) 异化消费

从经济角度来看,生态社会主义者认为,生态危机的根源是资本主



义的“异化消费”。所谓“异化消费”，就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为了延缓经济危机而力图歪曲需要的本质，在资本和广告的操纵下，诱使人们把追求消费当作真正的满足。

提出这个观点的是阿格尔。从理论上讲，阿格尔遵循着这样的思路：资本主义利益最大化的动机要求生产的最大化，生产最大化要求消费最大化，消费最大化必然造成资源消耗最大化和污染最大化，其结果必然是生态危机。如果消除“异化消费”，则必然造成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大化和劳动人民有限的购买能力之间的矛盾，从而引发经济危机。可见，“异化消费”延缓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缓解了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矛盾，却造成了消费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并没有消除，只不过是其表现形式下移了。

“异化消费”不仅破坏了外在的自然，而且破坏了人的内在自然。在阿格尔看来，“异化消费”似乎为人们单调乏味的异化劳动提供了补偿，人们把消费当作一种自我满足的手段，把消费当作人生的唯一乐趣，消费只是为了消费，而不是为了满足真正的需要。所以，异化消费加剧了人的异化。“异化消费”的前提是异化劳动，但“异化消费”反过来又消除了人们对异化劳动的不满，麻痹了人们的斗志，延续了资本主义的寿命。因此，要消灭异化劳动，同时也需要消除“异化消费”。克服“异化消费”的关键是改造社会生产，使人们不是在消费中，而主要是在生产活动中实现自己的基本愿望。

阿格尔把“异化消费”作为生态危机的根源，他的思路是很清晰的，认为“异化消费”延缓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表现形式，也符合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的新特征。但是，阿格尔据此就断言生态危机代替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马克思主义已经失去了时效，显然缺乏具体的分析，是错误的。用马克思主义的“异化”理论对资本主义进行分析当然是可以的，但是，“异化”理论是马克思早期的观点，成熟的马克思主义已经大大发展了，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是人道主义和科学的结合。

## （二）对技术的选择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很多生态社会主义者把生态危机的根源归结为科学技术。法国生态社会主义者高兹就持这种观点，他认为：开展生



态运动的关键在于如何选择技术。

首先,高兹按照社会制度把技术划分为“资本主义的技术”和“社会主义的技术”。他认为,核技术是“资本主义技术”的典型代表,它要求独裁统治,要求把决定权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核力量本身就要求对人民实行严厉的控制,高兹说:“核技术预示着和决定着一个集权的、等级森严的和警察统治的社会。”<sup>①</sup>相反,“社会主义的技术”则是“温和技术”。“温和技术”利用的是日光、潮汐、风能和生物能这样的可再生能源,它是分散型技术,它有利于多数人的控制。人们不能出卖这些可再生能源,因此,它们本身不产生利润。这样的环境友好型技术是潜在的反资本主义的,它的存在是实现人类解放的必要前提,它有助于抛弃独裁统治,促进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尊重劳动者和自然。

接着,高兹论述了技术与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高兹认为,资本主义要发展的技术,必须与资本的逻辑相一致,资本所采用的技术一定要有利于加强资本的统治;相反,对于那些无助于强化现存社会关系的技术,即使具有较多的生态合理性,资本对它们也弃而不用。“资本主义的生产和交换关系已经铭刻在由资本主义馈赠给我们的技术之中。”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和它的技术是融为一体的,国家的结构和性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所运用的技术。那么,要改变资本主义社会自然要从技术入手。高兹提出:“工具的转换是社会转换的基本前提。”为不同的技术进行斗争,是为实现一个不同社会进行斗争的核心。<sup>②</sup>所以,高兹把技术变革看成社会变革、解决生态危机的关键。

最后,高兹对马克思主义的科技观进行了批判。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技术中性论”是错误的,因为它没有看到科学技术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科学技术服务于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并且融入其中。科学技术作为意识形态就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科学技术的文化功能,清楚

<sup>①</sup> André Gorz, *Ecology as Politics*, Pluto Press Ltd., London 1980, p. 19.

<sup>②</sup> André Gorz, *The Division of Labour: The Labour Process and Class-Struggle in Modern Capitalism*, Harvester Press, Hassocks 1978, p. 19.



地打上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印记,打上了把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分割开来的印记。高兹把“技术中性论”视为特权和权力赖以建立的“神话”,认为“技术中性论”掩盖了科学技术的阶级内容,让人们产生这样的错觉:特权的建立不是出于资本积累的需要,而完全是从“客观需要”出发来实行劳动分工,而这种劳动分工进而要求建立某种服从模式、等级制度和专制统治。因此,很明显,技术是工厂里一切事情的母体和根源。“只要‘物质母体’仍未改变,那么对于工厂的集体占有,就纯粹只是法律上的所有权的抽象转移,这种转移永远不能终止工人的受压抑和服从的状况。”<sup>①</sup>

资本主义的大规模的工业生产当然是造成生态危机的重要原因,高兹提出使用“温和的技术”当然是解决生态危机的一个很好的办法。但是,高兹把科学技术和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混为一谈,认为科学技术是非中性的,这显然是错误的。这种思想显然是继承了法兰克福学派“科学技术即意识形态”的观点,把科学技术看成是一种控制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科学技术和科技的资本主义使用是分开的,科学技术是中性的。而且高兹还夸大了科学技术的作用,认为科学技术构成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物质母体”,从而又陷入了“技术决定论”的泥潭。高兹对科学技术的批判使他陷入了自相矛盾的境地:在 20 世纪 60 年代,高兹曾和马勒一起提出了“新工人阶级”理论,把科学技术工作者和管理人员看成是“新工人阶级”,是革命的力量;但是,大约 10 年之后,高兹为了批判技术分工,又把技术精英和管理人员看成是特权阶级。而且对科学技术的批判使高兹陷入了颠覆一切的空虚之中,使批判丧失了意义,只剩下一种批判的姿态。高兹应该是意识到了这些理论上的尴尬,所以到 20 世纪 80 年代末,他对科学技术的态度有了相应的转变,使他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自相矛盾的困境。

### (三) 对自然控制与对人的控制

从思想观念角度看,生态社会主义者认为,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源是

<sup>①</sup> André Gorz, *The Division of Labour: The Labour Process and Class-Struggle in Modern Capitalism*, Harvester Press, Hassocks 1978, pp. 8—9.



控制自然的观念。

对这个观点进行充分论述的莱易斯。他着重揭示了控制自然与控制人这两方面的内在逻辑联系,并在此基础上,深入讨论了控制自然、科学技术与社会进步之间的关系。

在生态危机的根源问题上,莱易斯首先驳斥了两种比较流行的观点,把它们看作是“两个陷阱”:

一个陷阱是,“把解决环境问题归属于经济核算”。这种观点颇为流行,而且似乎也很有道理:在前工业社会,环境的“供应量”是无限的,也就不存在对环境的“需求”,因此,环境在市场上就没有价格,或价格是零;随着工业社会来临,环境污染增加,环境的“供应量”则变成有限的了,人们产生了对环境的“需求”,因此,环境本身在市场上就产生了“价格”。因此,只要通过政府和社会的努力,通过会计核算,把环境成本纳入工业生产成本,经过一个涨价的过程,使企业采用相应的环境技术手段,人们完全可以用金钱去买到好的环境。莱易斯认为,这种观点把市场看作唯一解决问题的手段,对技术革新能力怀着崇高的信仰,完全把自然看成是满足人需要的对象,它只不过是悬挂在诱人的商品大厦上的最后的装饰,无法阻止物质需求的节节上升,如果相信它就会成为“落入陷阱中的牺牲品”。

另一个陷阱是,认为环境问题的根源在于科学技术,因为科学技术本身就蕴含着对自然的控制。这种观点把科学技术本身看成是一种控制学,对自然的控制是科学的“题中应有之义”。在莱易斯看来,在现实社会中,科学技术的确履行着控制自然的功能,但这只是现象,在现象的背后还有更深刻的东西。“诅咒科学”的错误就在于“把征兆当作根源”。科学技术充其量只是控制自然的工具,而真正导致对自然进行肆无忌惮的盘剥的是使用这种工具的人,是人“控制自然的意识形态”。显然,莱易斯的这个观点和高兹相反。

那么,造成生态危机的真正根源是什么?

在揭示了上述两种陷阱的基础上,莱易斯明确地指出:造成生态危机的真正根源是千百年来流传下来的、厚厚地沉淀在人们头脑中的控制自然的观念。而解决问题的关键也在于改变这种控制自然的观念。



在莱易斯看来,控制自然的观念是一种意识形态,目的是为了控制人。控制自然的意识形态的最根本目标不仅是控制外部自然,而是要控制全部的自然,包括人的内部自然。莱易斯在这里所说的“外部自然”指自然界,也包括人的肉身;“内部自然”指人的天性。在英语和德语中,“人性”和“自然”被当作一回事,同是一个词:在英语里都是 nature,在德语里都是 natur。只有在需要把两者有所区分的时候,才在 nature 或 natur 前面加上限定词“内部”或“外部”来加以区分。所以,控制自然与控制人也被当作一回事。莱易斯的这个思想来自法兰克福学派的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把“外部的自然”和人的“内部的自然”统一起来,把自然的解放看作是人的解放同盟军。

莱易斯认为,在控制全部自然的过程中,理性起了重要的作用。“理性”在这里实际上指的是“工具理性”,主要以科学技术为代表。“工具理性”是实现目标的手段,本来应该服务于人的天性。人要控制自然,就需要依靠科学技术,但科学技术在“客观”的名义下夸大了对主观意志的排斥,在这种条件下,人的“工具理性”已经不再是手段,而成了人性的主人,目的和手段的地位完全被颠倒了。对外部自然的控制表现为技术的进步;对内部自然的控制表现为对本能的克制。对本能的克制,就是对内在自然的控制。控制自然的欲望越强烈,自我克制就越自觉。

莱易斯认为,控制自然的另一个功用是阻碍被压迫者对人控制人的觉悟。控制自然的观念总是被说成人类普遍的任务,宣称它会对整个人类而不是个别的集团带来利益。但是,这种普遍性的说教实际上是一种控制术。由于人们认为对外部自然控制是正当的,所以,对内部自然的控制就显得非常合理。

莱易斯进一步揭示,要解决生态危机,就必须走出控制自然观念。既然科学技术充其量只是控制自然的工具,造成生态危机的真正根源就是控制自然的观念。那么,解决的办法就不是单纯地反对一切科学技术,回到对原始主义的崇拜;而是去改变控制自然的观念。

怎样去改变控制自然的观念?莱易斯认为,关键不是要从根本上



抹掉控制自然的观念,而是要对这一观念加以新的解释,赋予新的含义。新含义的主旨在于伦理或道德的发展,而不是科学技术的革新。应该努力把人的欲望中非理性和破坏性的方面置于伦理道德的控制之下。这种努力的目标是自然的解放,也是人性的解放。莱易斯认为,从伦理道德角度看,人类面临的最迫切的挑战不是征服自然,而是发展能够负责任地使用科学技术的道德,以及培养和保护这种道德的社会制度。

莱易斯认识到,造成生态危机的真正根源不是科学技术,这就摆脱了生态社会主义传统上“科学技术即意识形态”的谬误,和马克思主义的科技观保持了一致,从传统上否定科学技术的死胡同中钻了出来。莱易斯强调,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以负责任的方式使用科学技术,并且通过对社会制度的改造来保证人们负责任地使用科学技术的道德,这些观点也是合理的。

但是,很明显,莱易斯传承的是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克思主义观,而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莱易斯认为,“控制自然”是一种意识形态,是为了控制全部自然,即控制人;进而,控制自然并不是为了人类普遍的利益,而只是为了个别集团的利益——这显然是在说资产阶级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利用和炮制了“控制自然”的观念,实际上是为了控制劳动者,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已经呼之欲出了。但是,莱易斯却终究离开了阶级分析的方法,飘向了“人性、伦理、道德”。他把生态危机的真正根源看作是千百年来流传下来的观念,这显然是唯心主义;而他的解决办法实际上是要用伦理道德来对抗资本主义的利润最大化,对抗整个资本主义制度,这显然带有乌托邦的色彩。

### 三、克服生态危机的对策

生态社会主义者在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根源进行分析之后,提出了解决生态危机的对策,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 实行“破碎了的期望的辩证法”,消灭“异化消费”

这是阿格尔的一个重要观点。阿格尔认为,“异化消费”是造成生



态危机的重要根源,所以,要消除生态危机,就应该使消费者从异化消费的幻想中摆脱出来。怎样才能消除异化消费呢?阿格尔的办法就是实行“破碎了的期望的辩证法”。

阿格尔的“破碎了的期望的辩证法”包含下述 4 个过程:(1)当代资本主义的合法性是建立在人们对源源不断的商品供应的期望和消费基础上的;(2)由于生态系统无力支撑无限的增长,要求缩减工业生产,因此发生了供应危机,人们原来的期望破灭了;(3)人们已习惯于把自己期待的那份丰裕物质看作是异化劳动的补偿,当供应危机来临时,他们对资本主义的期望破碎了,对资本主义可以无限满足人的物质需求的期望丧失了信心,继而对整个资本主义制度产生了怀疑,于是他们开始重新考虑人究竟需要什么;(4)于是,许多陈腐的价值观念被摧毁了,产生了新的期望以及满足这些期望的新办法,学会从创造性劳动而非异化劳动中获得幸福。面临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破碎了的期望的辩证法”将促使人们弃绝对资本主义的期望,重新评价工业文明及其生活方式,促使人们在价值观上进行革命。

阿格尔把“破碎了的期望的辩证法”看成是生态社会主义者独创的社会变革模式,对它做了高度的评价:它将使马克思主义重新恢复活力,使人们对资本主义制度产生怀疑,也使人们从破灭了期望中重新燃起希望。对阿格尔的话可以做这样的理解:阿格尔曾经说过,生态危机已经取代经济危机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阶级斗争”的社会变革道路让人看不到希望,马克思主义已经“失去了时效”。“破碎了的期望的辩证法”弥补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危机理论之不足;同时,“破碎了的期望的辩证法”也是一种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在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面前,它使资本主义失去了合法性。生态危机使人们从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的观念中突然清醒过来,摧毁了人们原有的需求观念和价值观念,让人们去面临匮乏的生活,许多人似乎被抛进了世界末日,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将帮助人们树立起新的需求观念和对未来社会的期望,当新的观念和期望确立起来,乐观向上的气氛将重新降临人间。

“破碎了的期望的辩证法”的直接作用是消除“异化消费”的观念,



树立合理的消费观念是阿格尔用它去瓦解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对人们的观念进行变革,重新树立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当然是积极的方面。但是,它也存在消极方面:生态社会主义像其他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一样,由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结构已经发生了变化,他们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找不到进行社会变革的现实阶级力量,只好到观念领域去进行“观念革命”,用生态危机来促进观念领域的变革。观念革命也有其价值,但是,在否定阶级革命的基础上大谈观念革命,这就错了。

## (二) 实行小规模、分散化的生产

要解决生态危机,也需要在生产领域进行变革,消除大规模的集中的工业化生产。这也是阿格尔的一个重要观点。

阿格尔认为,小规模、分散化的生产不仅是解决生态危机的方法,而且从政治上有助于改造资本主义制度。高度集中的工业生产和官僚主义是联系在一起的。大规模的集中的工业生产是资本主义的一种统治手段;而小规模、分散化的技术与官僚主义是根本对立的。阿格尔强调,只有在小规模、分散化生产的基础上,才能使工人从官僚化的组织系统中解放出来,才能发展民主组织、实现工人对生产过程的民主管理。实施分散的工业生产和降低工业生产的规模,将会导致社会主义变革:生产者将组成联合体,实行民主管理的劳动,向人们提供有意义的非异化劳动。

阿格尔的这个观点来自英籍法国经济学家舒马赫。舒马赫在《小的是美好的》一书中批评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高度集中的工业生产,提倡一种小规模、分散化的“适宜的技术”。舒马赫还从道德和政治的前提出发,论证了大的未必就是好的,而小的才是美好的。阿格尔一方面借助于舒马赫的思想,引申出:社会主义经济就是一种分散化、非官僚化的经济;另一方面,他又批评舒马赫没有把实行小技术与社会政治制度变革联系起来,没有充分理解技术与社会结构之间的“连锁性”。阿格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对技术的变革不仅意味着要改组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技术过程,而且要对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进行改组。

阿格尔把实施分散化、小规模的技术,实行工人管理看作是解决生态危机,改造资本主义,进而走向社会主义的途径。这种思想曾经产生



过广泛的影响,并成为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生态社会主义中一个令人瞩目的主张。这种主张反映了早期生态社会主义的社会变革道路:不是对资本主义制度发起直接的挑战,而是试图通过对技术的变革来“绕过”和“超越”资本主义制度。而在整个世界经济已经全球化的条件下,根本不可能将它分割成独立的、分散的部分。阿格尔的主张明显地带有反工业化的后现代主义倾向。

从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分散的、小规模的企业同样会造成污染,而且监管起来更加困难;相反,大企业的资金、技术相对雄厚,管理也相对规范,对其进行治理相对容易。笔者在上海市浦东新区进行了调查,环保部门反映:他们最担心的并不是工业园区内的大企业,而是“散养”在园区之外的中小企业。

阿格尔的主张在理论上说不通,在实践上也无法推行,因此,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多数生态社会主义者都摒弃了这一主张,舒马赫主义普遍受到了冷遇。

### (三) 实行“稳态经济”,建立“守成社会”

“稳态经济”是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生态社会主义者的基本主张,也是西方生态运动长期以来的一个基本经济纲领。它显然是继承了罗马俱乐部《增长极限》和《人类处于转折点》的基本思想:对经济发展来说,要限制细胞分列式的量的增长,强调生物进化式的质的提高。这实际上是对“增长”和“发展”的概念进行了严格的区分,是进步的观点。

“稳态经济”就是一种使人口和产品的总量保持恒定的经济。人口和产品这两个总数是恒定的,但不是静止的,因为人会死亡,产品会折旧,所以必须以生育来弥补死亡,以生产来补偿折旧。如果这种输入和输出的速度能够基本相等,而且保持在较低的水平上,则说明人口的寿命和产品的寿命都很高。当这两个总数保持稳定时,物质和能量的输入量就等于输出量,所以,这两个相等的量都可以用吞吐量(throughput)来表示。吞吐过程包括生产、消耗、折旧,最后废物进入到环境中成为污染。无论是经济还是有机体,要想得到生存,就必须把这种吞吐量限制在资源和环境承载能力的范围内。

“稳态经济”不能有量的增长,但可以有质的发展。地球的资源、环



境承载能力是有限的,经济只是地球的一个子系统,经济产品的储量不可能以几何级数持续不断地增长,所以“稳态经济”反对量的增长;在“稳态经济”中也存在着非恒定因素:知识和技术是非恒定的,收入分配和资源分配是非恒定的,所以,人类可以通过知识和技术的进步、维护社会的公平来解决现存的社会问题,实现质的提高。

根据“稳态经济”的主张,生态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增长方式进行了批判。因为资本主义经济与“稳态经济”是根本对立的,资本主义经济必须维持不断扩大的再生产——扩大再生产停止了,资本就死亡了。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对“稳态经济”理论论述最充分的是莱易斯。

莱易斯把“稳态经济”看作是通向新社会的有效途径,并详细论述了“稳态经济”的基本理念:

第一,实现“稳态经济”要求对整个社会结构进行改变。首先,要改变人的需求结构。莱易斯的逻辑是这样的:要消除生态危机必须消除“异化消费”,这就要改变人的需求结构,而新的需求结构只能产生于和当今不同的生活方式。其次,要改变社会政治结构。莱易斯主张,在非等级制的自由联合体的基础上,建立人们共同劳动和共同决策的生活,让个人在自由和自主的条件下来决定自己的需求,使每个人通过自主的劳动来直接满足自己的需要。再次,要改变社会经济结构。应该消除破碎化的劳动分工,因为破碎化的劳动分工只能造就片面的、畸形的、异化的人;应该逐步拆散工业经济的庞大的制度结构,尽可能地减少每个人对这种结构的依赖。

第二,“稳态经济”并不主张消灭市场交换,它所要消灭的是“把商品交换当作满足需要的唯一的方式”。在莱易斯看来,现代文明是与市场交换联系在一起的,现代人的富裕也是建立在市场交换的基础上,因此,“商品和市场交换本身并不存在固有的邪恶,因此没有理由认为完全消灭它们才合乎需要”<sup>①</sup>。但是,在莱易斯设计的稳态经济方案中,

<sup>①</sup> 转引自陈学明:《生态社会主义》,台湾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版,第182页。



由于越来越多的需要可以通过人们自主的劳动来直接获得满足,这样,对市场交换的依赖程度将大大减弱,但减弱不等于完全消失。无疑,在未来社会中,市场交换的重要性大不如以前,但不能无视它的客观存在。

第三,“稳态经济”要求把科学技术的使用分散化,但并不反对科学技术本身,它反对的是科学技术的集中垄断的使用方式。莱易斯的稳态经济方案并不是要让人们“回到过去那种以穷乡僻壤为特征的艰苦生活环境中去,而是要把现代技术的优势在更大范围的各种不同的环境中进行分散,不用说,这种分散要有意识地放弃集中生产所追求的值得怀疑的‘效益’”<sup>①</sup>。莱易斯高度肯定科学技术的作用,认为发达的科学技术是现代文明的象征,现代文明的物质财富主要是由科学技术创造出来的。显然,莱易斯反对的不是科技,而是资本对科技的操纵。

莱易斯关于“稳态经济”的思想来自 100 多年前的经济学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穆勒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中就提出了建立“稳态经济”的主张。穆勒在当时就告诫人们,生产能力和人口水平已趋近于极限,不需要再进一步发展了。人与人之间在自我实现的机会方面和生活愉快的程度方面存在着严重的不平等现象,但这种不平等现象只能通过建立较合理的社会组织来补救,而不能一味地寄希望于量的增长,即借助于增加总量来解决。在穆勒看来,量的增长并不能改善整个人类的命运,由量的标准转向质的标准才是未来社会迫切需要解决的事情,人们必须改变表达和满足需求的方式。莱易斯对穆勒的观点高度赞扬。莱易斯认为,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穆勒观点的正确性已得到了证明。

在“稳态经济”理论的基础上,莱易斯又提出了“守成社会”(the conserver society)的主张。莱易斯认为:在经历了现代工业社会之后,我们可以提出比穆勒的“稳态经济”更有可行性的方案,这就是“守成社会”。“守成社会”是把克服环境危机和实现社会公平的政策总结在一

<sup>①</sup> 转引自陈学明:《生态社会主义》,台湾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3 年版,第 184—185 页。



起的社会,它要实现两个目标:第一,克服异化的消费,把人均能源和资源消耗量降到最低限度;第二,克服即使在最发达的工业国家也存在的贫困——如果不能克服贫困,“守成社会”就不能代表一种社会进步。

莱易斯对“守成社会”做了说明:“守成社会”本身并不是目的,它只是一项社会变革政策,使人们放弃量的满足标准,而采用质的标准;GDP究竟是增长、稳定还是下降,这一点并不重要,这要根据环境和需要的变化而变化;重要的是,使需要的满足不再成为纯粹的消费活动,人们应该越来越多地在理想的职业中、在生产和参与决策中获得满足。莱易斯实际上是希望人们摆脱剩余价值最大化的束缚,理性地调节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个观点是很有道理的。

“稳态经济”强调以质的提高代替量的增长,其方法是通过科学技术进步;并强调“守成社会”并不完全反对经济增长,而是要把经济增长限制在环境承载能力的范围内,这对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倡导的“生态文明”建设颇有启发意义。其次,和很多生态社会主义者不同,莱易斯不反对市场经济,和我国目前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也基本一致。此外,莱易斯并不反对科学技术,而是将技术和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区别开来,也很有进步意义。“稳态经济”思想对一些发达国家产生了重要影响。例如德国,“红绿联盟”从1998年开始执政,德国1999—2004年经济年均增长率只有1.2%,2005年的GDP增长率扣除价格因素后只有0.9%<sup>①</sup>,在欧盟当中是最低的,但德国经济质量却很高,2003—2006年连续保持头号出口大国的地位。

中国并不能简单套用“稳态经济”的观点。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发展经济、摆脱贫穷、解决温饱乃是当务之急;以经济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竞争日益激烈。中国目前仍是发展中国家,综合国力仍有待进一步提高,完全实行“稳态经济”是不切合实际的。但中国完全可以借鉴“稳态经济”的合理成分,着力提高经济质量,以“污染减排”为着力点,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经济发展限制在环境承载能力范围内,实现“又好又快发展”。

<sup>①</sup> <http://frankfurt.mofcom.gov.cn/column/print.shtm>.



#### （四）打破“经济理性”，坚持“社会—生态理性”

这是高兹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的重要观点。1988 年，高兹出版了《经济理性批判》（法文版）一书，开始在比较抽象的哲学层面探索生态危机的根源。他把生态危机的根源归结为“经济理性”。

对于什么是“经济理性”，高兹在《经济理性批判》中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在他的论述中，“经济理性”是一个十分模糊的概念：它既可以指“计算和核算”手段，又可以扩大到“计算和核算”背后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本身。

对“经济理性”认识的模糊性反映了高兹对工具理性态度正处于变化之中。在 1988 年出版《经济理性批判》之前，高兹颇受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和后现代主义的影响，认为现代化就是工具理性无限扩张的过程，造成了科学技术对人文精神的专制，科学技术成为意识形态，成为人控制人、人控制自然的工具，造成了社会的不公正和生态危机。因此，在此之前，高兹对以科学技术为代表的工具理性大加批判。但是，对工具理性（科技）的批判会将人抛进颠覆一切的空虚之中，批判本身就丧失了意义，这正是“批判理论”和后现代主义的悖论。“经济理性”这个概念的模糊性反映了高兹思想正在发生变化：从对科学技术的批判转向对工具理性背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从而使高兹绕开了这个后现代主义的悖论，坚持了现代主义的立场。在《经济理性批判》这本书里，高兹的主张是对理性和现代化本身加以合理化，不再从根本上反对工具理性和现代化。

高兹认为，“经济理性”要求“更多”和“更好”的联结。“经济理性”所谓的“更好”就是获得“更多”的交换价值，而不是对某种使用价值的满足。高兹认为，要打破这种联结，就要坚持“社会—生态理性”，把“更少”和“更好”联结起来，实现“更少的生产，更好的生活”。

高兹认为，“更少的生产，更好的生活”是可能的。只要我们生产经久耐用的、易于修复的产品，或者生产每个人都可以买得起的商品，那么，我们就可以工作得更少，消费得更少，而生活得更好。“当人们发现，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是可以量化的，认识到金钱并不一定能买到所有的东西，而那些不能用钱买到的东西恰恰是最重要的，甚至是不可或



缺的,‘以市场为根基的秩序’就从根本上被动摇了。”<sup>①</sup>这里,“以市场为根基的秩序”显然指的是“计算和核算”背后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经济理性”的内涵不单是指“计算和核算”。

除了对环境造成危害之外,高兹还说明了“经济理性”的另外两个危害:第一,“经济理性”使生活世界殖民化。“经济理性”把主体排斥在外,把思维编入技术程序,把种种关系技术化、货币化和异化,使思维完全丧失了反思和自我考察的能力,使活生生主体面对这个物化的世界成了陌路人,“这一异化的世界只不过是他们的产品,与威力无比的技术发明相伴随的是生活艺术、交往和自发性的衰落”<sup>②</sup>。第二,“经济理性”在现实的世界中造成了“奴隶主义”。由于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现代人获得了大量的自由时间。但是,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理性”仍然在起作用,整个社会仍然受“越多越好”的原则驱使,这样,节省下来的闲暇并不是平均分配的,而是越来越多的人日益在经济生活中被边缘化,而另一部分技术精英则获得更高的收入,两极分化日益加剧了。这样,技术精英们可以从越来越多的失业者那里购买到额外的空闲时间。对于提供个人服务的这部分人来说,他们服从于和人身依附于他们为之服务的那些人。今天,技术精英可以雇人来做仆人的工作,这和以前富人雇用一大批佣人没有多少区别。“奴隶主义”再次复活了。

为了克服现代“奴隶主义”、实现社会的公平,高兹提出了解决办法。尽管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工作机会减少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仍然要让每个人都有工作。哪怕把劳动时间减少到每天两个小时,也要让每个人都享有劳动的权利,这正是19世纪以来劳工运动斗争的目标。这样,在剩余时间里,人们可以自愿地联合起来,组织社区公共事业,按照他们的情趣从事自主的劳动。不然的话,只能任由这种“奴隶主义”的现象发展下去。

20世纪80年代末,高兹在一定程度上转变了以前对现代化和工具理性的批判态度,从而转向对工具理性背后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

<sup>①</sup> Gorz, *Critique of Economic Reason*, Verso, London and New York 1989, p. 116.

<sup>②</sup> Gorz, *Critique of Economic Reason*, Verso, London and New York 1989, p. 124.



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他把自然界的生态危机和精神世界的异化联系起来，这也是值得肯定的；他把生态危机和社会结构的变化联系起来，提出了“新奴隶主义”的观点，而且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高兹进一步发挥“新奴隶主义”观点，把这些新失业者看作是社会变革的主体，还是值得肯定的。

但是，正是，高兹忧虑找到切实的可行的先服生态危机的对策。“更少的生产，更好的生活”，很大程度上依赖人的主观世界的觉醒；通过大量减少劳动时间，发展自主劳动，充满了乌托邦的色彩，在现实的物质主义世界中无法实现。从而高兹陷入了悲观主义之中，据法国一些学者分析，对现实世界的失望和对理想的幻灭是 2007 年 9 月高兹夫妻双双自杀身亡的原因之一。

## 本章小结

本章论述了生态社会主义的产生背景、发展阶段和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主要观点，为讨论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生态社会主义的新变化进行了铺垫。

生态社会主义产生于 20 世纪 70 年代，在 20 世纪 90 年代之前，经过“红色绿化”和“红绿交融”两个阶段的发展，生态社会主义把“社会主义”和生态运动相结合，形成了一套比较系统的理论，为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生态社会主义的新发展奠定了基础。总的来说，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的生态社会主义既表现出一定的积极意义与理论成就，又有一定的局限性。

从积极的方面看，生态社会主义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运用马克思主义考察了当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新变化，提出了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的新的危机理论；从不同角度揭示了生态危机和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指明了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把自然的解放与人的解放结合起来，并设计了解决生态危机的种种方案。

但是，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生态社会主义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



第一,生态社会主义断言生态危机已经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生态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并进而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失去了时效,这显然是一种错误的观点。

第二,生态社会主义在分析生态危机的根源时,把生态危机的根源归结为“异化消费”、技术的选择、控制自然的观念、“经济理性”等,他们的分析要么局限于主观意识层面,表现出鲜明的乌托邦色彩;要么对科学技术本身进行批判,陷入颠覆一切的空虚之中。这也说明,他们的理论依据主要来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流派,而不是科学社会主义。由于其理论来源的多样性,所以,他们的观点之间经常彼此矛盾,甚至是自相矛盾。

例如,在关于科学技术的问题上,高兹和莱易斯的观点是尖锐对立的。再如,高兹本人对科学技术的态度也是前后矛盾:20世纪60年代,高兹提出了“新工人阶级”理论,对科学技术持肯定态度;到了70年代,高兹对科学技术大加批判;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高兹的态度又一次发生了转折,对科学技术基本上持肯定态度。这种互相矛盾和自相矛盾说明了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生态社会主义还不够成熟。

第三,生态社会主义者提出的解决生态危机的方案大多是不切实际的。“稳态经济”和“分散的、小规模的生产”显然违背了历史发展的潮流,具有开历史倒车的倾向;“破碎了的期望的辩证法”和“更少的生产,更好的生活”的主张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人的主观世界的觉醒,充满了乌托邦的色彩。

总的来说,生态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友邻流派。在反对资本主义的社会运动中,生态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盟友;在整个“社会主义”理论群落中,生态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邻居,从生态角度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启示,开阔了视野。但是,“友邻”二字也准确地说明,生态社会主义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科学社会主义,两者之间理论上的对立和差异十分明显。

生态社会主义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之下,生态社会主义呈现出一系列的新变化,进入了“绿色红化”的新阶段。在后面几章中,本书将围绕这些新变化进行深入的论述。



#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生态社会主义的新变化和动因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生态社会主义出现了一系列的新变化,本章将对这些新变化进行描述,并分析产生这些新变化的动因。

## 第一节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生态社会主义的新变化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的生态社会主义者经历了两个“失望”：  
其一是对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的失望。苏东剧变使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受到了强烈的震撼。  
其二是对“生态资本主义”的失望。资本主义赢得了“冷战”，很多生态社会主义者倒向了“生态资本主义”，但“生态资本主义”却无法阻止生态问题继续恶化，进入政府的绿党没有采取坚决、有效的措施来阻止反生态的增长模式，甚至在大力推动它；资本主义赢得了“冷战”，生态帝国主义更加肆无忌惮，他们向第三世界国家输出污染，更大规模地从发展中国家掠夺资源，为了控制石油资源，他们甚至连续地发动战争，某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局部环境改善了，但是，这种“改善”和全球环境的“恶化”密切联系着。苏东剧变以来，生态资本主义给这个世



界带来的是越来越多的“失望”。

很多生态社会主义者心中仍然对社会主义怀着“希望”。只要资本主义带来的各种矛盾仍然存在,社会主义就有不朽的价值;但是,他们深深地认识到,需要对社会主义进行新的探索。

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这两个“失望”和一个“希望”中,生态社会主义也获得了新的“生机”,呈现出和20世纪90年代以前所不同的新特征。

### 一、对苏联和东欧生态教训的反思

20世纪90年代以前,生态社会主义者对苏联问题的论述是非常少的,主要是在理论上沿袭了法兰克福学派的“趋同论”,对实际问题的研究几乎没有。法兰克福学派的哈贝马斯在《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和科学》(收入《走向一个合理的社会》一书)等论著中提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并非是中性化的,它是一种意识形态;法兰克福学派的另一位人物马尔库塞在《苏联马克思主义》(*Soviet Marxism*)中首先提出科学进步导致两种社会制度趋同的理论。法兰克福学派的观点是生态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理论来源。20世纪90年代以前,生态社会主义者关于苏联问题的论述主要是承袭了法兰克福学派的“趋同论”。例如,高兹认为,“工具的转换是社会转换的基本前提”,并推论:“倘若社会主义运用和资本主义一样的工具的话,它与资本主义就没有什么区别了。”<sup>①</sup>所以,他认为,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与西方的资本主义实际上是同一个“工业社会”的两个版本,同样都是反生态的。

当时,在“冷战”状态下,东西方隔绝,身在西方的生态社会主义者对苏联生态问题的实际状况并不了解,他们对苏联问题的研究只是“隔着纱窗看晓雾”,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自说自话,缺乏相关的事实依据。20世纪90年代以前,生态社会主义关于苏联问题的认识无论在理论

<sup>①</sup> Gorz, André, *The Division of Labour: The Labour Process and Class-Struggle in Modern Capitalism*, Harvester Press, Hassocks 1978, pp. 19—20.



上还是在资料上都是非常单薄的。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客观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苏东剧变之后,总结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教训,探索新的社会主义道路,成为全世界社会主义者的共同课题,当然也成了生态社会主义者的热点话题。第二,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随着戈尔巴乔夫的“公开化”(glasnost),苏联以前被政治原因掩盖起来的生态问题日益暴露出来,为生态社会主义者提供了大量的素材。

生态社会主义者揭露了苏联大量的生态问题的事实,认为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生态问题至少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样严重;并从“增长的极限”角度总结了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生态教训,分析了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失败的原因。关于苏联问题的认识,无论是理论深度,还是具体事实,都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的生态社会主义所无法相比的。

1999 年,德国生态社会主义者撒鲁尔·萨卡尔出版了《生态社会主义还是生态资本主义?对人类基本选择的批判分析》,在该书中,萨卡尔以翔实的资料揭示了苏联的生态问题,从“增长的极限”角度分析了苏联解体的原因,并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必须符合增长极限的要求。美国生态社会主义者约翰·贝拉米·福斯特 1994 年出版了《脆弱的星球,环境经济简史》(*The Vulnerable Planet, A Short Economic History of Environment*),也在事实基础上讨论了苏联生态问题,并分析了原因。高兹在 1991 年出版了《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生态学》一书,沿着他原来的观点,继续批判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只不过提供了一幅资本主义基本特征的滑稽放大图,高兹思想的发展在于:从苏联的生态教训中进一步完善了他对生态社会主义的设想。

## 二、提出了关于生态帝国主义的新理论

20 世纪 90 年代,生态社会主义提出了生态帝国主义理论。这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的生态社会主义所未曾涉及的内容。

1994 年和 2002 年,美国生态社会主义者福斯特分别出版了《脆弱的星球,环境经济简史》和《反资本主义的生态学》等著作,对早期生态



殖民主义进行了考察,并且与当代生态帝国主义的行径进行了对比。通过对比,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生态帝国主义是早期生态殖民主义的升级版。根据福斯特的论述,生态帝国主义包括三个方面内容:资源掠夺、污染输出和生态战争。

“资源掠夺”说明,在当代生态帝国主义阶段,中心地区仍在继续从边缘地区掠夺有价值的生态资源,而且在生态帝国主义阶段,这种生态掠夺被合法化和制度化了。

“污染输出”说明,在生态帝国主义阶段,中心和边缘地区的关系也“进化”了。在早期生态殖民主义阶段,中心地区和边缘地区的生态关系是“单向度”的——只是从边缘地区输入有价值的生态资源;在生态帝国主义阶段,中心地区和边缘地区的生态关系则是“双向度”的了——中心地区继续从边缘地区掠夺有价值的生态资源,同时,还向边缘地区输出污染。输出污染包括两种形式:污染产业输出和垃圾出口。

“生态战争”主要从两个方面来讲:一是从战争的目的看,20世纪90年代以后,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控制中东的石油资源,发动了一系列的战争,被称为生态战争。二是从战争的手段看,二次世界大战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战争中使用了某些新型武器,对生态系统、自然环境和地质构造等造成了严重破坏,也被称为生态战争。

产生这些变化的主要原因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20世纪90年代以后,由于苏东剧变,国际格局发生了变化,没有了苏联的制约,帝国主义更加猖獗,随着石油资源日益紧缺,美国为了维护自身的能源安全,不惜动用战争手段。第二,20世纪90年代以后,全球化理论的发展,为生态社会主义对生态帝国主义的认识提供了理论依据。第三,20世纪90年代以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国内生态运动的压力之下,相继出台了一系列限制污染环境的严厉措施,一些企业为了逃避处罚,牟取暴利,造成污染输出十分猖獗。

### 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更加深刻

20世纪90年代以前,尽管生态社会主义者也意识到生态危机与



资本主义利益最大化的追求有关,但是,他们不能深入地观察现象背后的本质,没有深入揭露资本主义和生态系统到底是怎样对立。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生态社会主义者详细论述了资本主义和生态系统具体在哪些方面存在着根本对立,从而认定,应该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去寻找原因,而不是片面地把生态危机归咎于其他因素。美国生态社会主义者福斯特反驳了各种“非资本主义”的归因论,认为尽管人口、产品量和技术等是影响环境的因素,但是,在这些因素背后起作用的还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

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生态社会主义者在分析生态危机的根源时所依据的理论并不是科学社会主义,而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流派。他们把生态危机的根源归咎于“异化消费”、“控制自然”的观念、技术的选择、经济理性等,当然从这些方面进行分析也涉及了资本主义制度,但同时也夹杂着很多错误的观点。他们反对科学技术,认为“科学技术即意识形态”;强调主观世界的革命,远离现实的阶级斗争,不是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发起直接的进攻,而是从边缘领域的“观念”和“技术”入手,站在制度的边缘,从“边缘”和“空白之处”入手来侵蚀资本主义制度。因此,受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的影响,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尽管生态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批判,但批判并不深刻。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科学社会主义对生态社会主义的影响日益扩大。出现了一批以英国的佩珀、美国的福斯特为代表的,持“科学社会主义”倾向的生态社会主义者。例如,佩珀就明确地表示,自己正是为了捍卫科学社会主义而介入红绿之间的论争,他正是要用科学社会主义来改造绿色运动,来消除“红绿联盟”之间的分歧,从而把生态运动引入健康发展的轨道。就连观点比较多变的高兹也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生态运动的“解毒剂”,有利于消除形形色色的错误观点。由于指导思想的变化,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生态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更加深刻。

生态社会主义的这种变化最主要的原因是,苏东剧变之后,由于大量共产党员和左派人士加入生态运动,壮大了生态社会主义的队伍;左派政党迫于政治风向右转,与生态运动结盟,客观上抬高了生态社会主



义的地位。

#### 四、经济政策更加务实

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解决生态危机的出路问题上,生态社会主义提出的方案更加务实,具体地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稳态经济”到适当增长。

20世纪90年代以前,大多数生态社会主义者都主张实行“稳态经济”。“稳态经济”是西方生态运动的一个基本经济纲领,其含义是指实现经济在数量上的“零增长”,谋求质的发展,以此来保护生态环境。这种主张虽有其可取之处,但在现实的世界经济格局中是不现实的,对于广大贫穷的第三世界国家来说是不公平的。特别是对于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来说,要治理环境污染,减少资源消耗,也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量和质是不能分开的。

20世纪90年代以后,生态社会主义者一般都主张放弃稳态经济,保持适度的经济增长。要实现环境保护,经济增长与否并不是关键,关键是必须跳出资本主义利润最大化的控制,理性地调节人与自然的互动关系。

英国生态社会主义者大卫·佩珀认为,自然的限制是和人类的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对某一种生产方式的自然限制,并不是普遍地存在着,也不具有普遍的形式,不是对所有生产方式都起作用。改造生产方式意味着改变需求,因而对资源供应的需求也随之改变,那么一系列的生态难题也会相应地变化”<sup>①</sup>。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将改变资本主义需求最大化和生产最大化的状况,从而为生态危机的根本解决开辟了道路。

法国生态社会主义者安德烈·高兹提出“生态重建”的理论。按照高兹的说法,“生态重建”最根本的思想就是,使生产和利润最大化的经

---

<sup>①</sup> Pepper, David, *Eco-Socialism: From Deep Ecology to Social Justice*, Routledge, London and NY 1993, p. 233.



济标准服从于社会—生态理性。“生态重建”反对的不是经济增长,当进入到社会主义社会,摆脱了资本主义利润最大化的束缚,人们可以将经济发展置于社会—生态理性的控制之下,当然可以保持经济适当的发展。所以,高兹说:“除了对资本积累的冲动进行限制,和通过自我约束减少消费,不存在其他的生态重建。”<sup>①</sup>高兹在这里说的“减少消费”当然是指资本和广告操纵下过度的“异化消费”。

第二,从“小即美”的舒马赫主义到反对舒马赫主义。

英籍法国经济学家 E. F. 舒马赫在其一本很具影响的书《小的是美好的》中明确地反对高度集中的大规模工业生产,提倡一种“适宜的技术”,即小规模、分散化的技术。他还从各种道德和政治的前提出发认为:最大的并不一定就是最好的,而小的才是美好的。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大多数生态社会主义者都接受舒马赫主义。阿格尔对舒马赫主义大加赞赏,并且把舒马赫主义和工人阶级的解放联系起来:“只有按小规模技术发展起来的民主地组织和调节的生产过程才能使工人从官僚化的组织系统中解放出来。”<sup>②</sup>但是,舒马赫主义带有严重的乌托邦性质和对初期工业化时代的迷恋,具有开历史倒车的倾向。

20 世纪 90 年代的生态社会主义者大都放弃了舒马赫主义。他们认为,在当前经济全球化的现实下,庞大的失业大军、严重的资源短缺及人口爆炸等问题早已超出一国范围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根本无法将其分割为一个个独立的部分。要解决生态危机,关键是消灭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而不是技术本身的大或者小,集中或者分散。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之下来提倡小规模、分散化的经济,只能造成污染在更加广泛的范围内扩散,而且这种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主张是绝不可能实现的。

产生这些经济政策变化的原因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红绿联盟”执政的过程中,绿党这头“绿色的公牛”日益失

<sup>①</sup> Gorz, André, *Capitalism, Socialism, Ecology*, Verso, London and New York 1994, p. 34.

<sup>②</sup> 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慎之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503 页。



去了它的野性,逐渐接受了适度增长的经济政策,其政治态度日渐务实,这当然对他们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产生了影响。

第二,随着绿党进入政府成为执政党,其内部各流派之间力量的消长与20世纪90年代以前发生了变化。生态现实主义派逐渐取代了生态激进主义派(生态原教旨主义派),成为绿党的主导力量。生态现实主义对生态社会主义的影响日益扩大,生态激进主义对生态社会主义的影响日益减小,生态激进主义所信奉的“生态中心主义”在生态社会主义中也日益失去了市场。

第三,20世纪90年代以后,后现代主义的影响日渐衰落。后现代主义在经历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高歌猛进之后,在90年代日益显露出狂躁之后的疲惫,其反理性、反工业化的主张在生态社会主义中的影响也日渐消退。

第四,最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在生态社会主义中的影响日益扩大。马克思主义强调的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当人类摆脱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当然可以理性地控制生产,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实行“稳态经济”,也不在于必须实行“小规模、分散的生产”,而是要变革社会生产方式,从而跳出剩余价值最大化的制度束缚。马克思主义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但这种“人类中心主义”和资本主义唯利是图的“人类中心主义”显然是不同的。

在上述因素的共同作用之下,20世纪90年代,在采取何种经济政策的问题上,争议的焦点逐渐集中在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上来制定经济政策,从实际的发展趋势来看,“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逐渐取代了“生态中心主义”的立场。

## 五、在政治理论方面更加重视工人阶级和阶级斗争

20世纪90年代,生态社会主义在政治理论方面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社会变革主体的变化;二是社会变革道路的变化。

第一,在社会变革的主体方面,更加重视工人运动和工会组织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



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生态社会主义者认为,工人阶级已经丧失了自己的阶级意识,无法承担社会变革的使命。1980 年,法国生态社会主义者高兹出版了《告别工人阶级:对后工业社会主义的论述》一书,他断言:工人阶级已经丧失了阶级意识,变成了机器的附属物,对他们所承担的历史使命浑然不觉。对享受着优裕物质生活的工人来说,阶级政治已经成为一个“疲倦的神话”。他的理论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无产阶级新变化,对西方左派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因此,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多数生态社会主义者把“新社会运动”当作新的革命主体。但是,“新社会运动”的主体并不是无产阶级,而主要是中产阶级。之所以把它当成左翼,主要是因为它也反对资本主义,而不是因为参与“新社会运动”的人和无产阶级有着共同的阶级立场。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生态社会主义者对工人阶级的看法发生了改变:

对于发达国家的工人阶级来说,生态社会主义者认为,工人阶级仍是革命的潜在力量:工人阶级由于直接从事生产劳动,受环境污染最重,因而最具革命性,是未来社会变革的主体。20 世纪 80 年代末到 90 年代初,高兹“告别工人阶级”的观点也有所改变,开始重视工人阶级的作用。他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科技的发展带来闲暇的增多,但是,却造成了越来越多的失业、半失业的“后工业工人阶级”。1991 年,尽管他仍认为“新社会运动”是社会主义变革的承担者,同时,高兹也强调“新社会运动”不但要和“现代工人”相结合,而且要和那些失业、半失业的“后工业工人阶级”相结合。<sup>①</sup>1997 年,高兹又出版了《收回工作:超越工资社会》一书,对于科技进步引起的失业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研究。高兹观点的变化反映了生态社会主义者对工人阶级作用的重视。

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工人阶级来说,他们的作用引起了生态社会主义者更大的关注。生态社会主义者根据阶级分化全球化的研究认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发展中国家制造了相当于西方 19 世纪的社会状

<sup>①</sup> Gorz, André, *Capitalism, Socialism, Ecology*, Verso, London and New York 1994, pp. 72—3.



况,第三世界的无产阶级必将起来斗争,和西方的工人阶级一起,构成实现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的主体。

产生这种变化的原因主要有两个:其一,随着苏东剧变,西方大量的“中间阶级”纷纷右转,倒向了生态资本主义。生态社会主义者原先所依赖的社会变革力量减弱或者没有了,于是,他们开始更加注重工人阶级和工会组织的作用。其二,20世纪90年代以后,马克思主义对生态社会主义的影响日益扩大,这当然也使生态社会主义更加重视工人阶级的作用。

第二,在社会变革的道路方面,20世纪90年代以前,生态社会主义者反对“二元对立”的阶级斗争的方法;20世纪90年代以后,生态社会主义者更加强调“二元对立”的阶级斗争。

20世纪90年代以前,生态社会主义者的社会变革道路是改良主义的,不是对现政权发起直接挑战,而是试图绕过和超越它。例如,1980年,高兹在他的著作《告别工人阶级》中提出,社会变革对象不应该是具体的阶级,而是产生着等级制和控制(hierarchy and domination)的二元对立的权力结构本身。在二元对立权力结构之内,靠一个阶级的专政代替另一个阶级的专政,革命无法取得成功,因为“二元对立”压迫型权力结构仍然存在;只有在人的自治层面发展一种新的社会关系,才能彻底绕过并超越这个权力结构。<sup>①</sup>因此,他既反对资产阶级专政,也反对无产阶级专政。

20世纪90年代以后,一些生态社会主义者批判了非阶级的社会变革道路,更加强调阶级之间的“二元对立”。佩珀明确地批评高兹实行的“绕过”资本主义的社会变革道路行不通。佩珀认为:“激进的变革必然引起冲突。那些拥有权力而又不想放弃的人和那些想夺取权力的人之间的冲突是在所难免的。”要实现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认清两大阶级之间的冲突是至关重要的。<sup>②</sup>当然,佩珀并不完全否定和

<sup>①</sup> Groz, André, *Farewell to the Working Classes: an Essay on Post-Industrial Socialism*, Pluto, London 1982, p. 63. 法文版 1980 年出版。

<sup>②</sup> Pepper, David, *Eco-Socialism: From Deep Ecology to Social Justice*, Routledge, London and NY 1993, pp. 19—20.



平的社会变革道路,他所强调的是阶级斗争的中心地位。关于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行阶级斗争,在佩珀看来,目前的条件还不成熟;但是,根据阶级分化全球化的状况,佩珀更加强调了第三世界国家的工人阶级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

产生这种变化的原因主要是两方面:其一,由于苏东剧变,原先的“红”色力量加入“绿”色运动,生态社会主义内部科学社会主义的成分增多,因此相当部分生态社会主义者更加倾向于阶级斗争的变革道路;其二,随着学界对全球化研究的深入,在阶级分化全球化理论的影响下,20 世纪 90 年代的生态社会主义者更加清晰地看到了阶级冲突也日益全球化。

## 六、在指导思想上反对“新无政府主义”

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在生态社会主义运动中占主要地位的是“新无政府主义”。所谓“新无政府主义”生态社会主义,就是传统的无政府社会主义(如施蒂纳、蒲鲁东、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等人的无政府社会主义),融合了后现代主义和深生态学的内容。“新无政府主义”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坚持“生态中心主义”,在政治上坚持非阶级的“人性论”和“差异政治”,在经济上反对工业化,在文化上提倡“去中心”、“多元化”。我们从 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莱易斯、阿格尔、高兹的观点中可以明显地发现“新无政府主义”的种种特征。本书第四章第三节对“新无政府主义”进行了详细说明,此处不再赘述。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在生态社会主义内部,“科学社会主义”倾向日益增强。“科学社会主义”倾向和“无政府主义”倾向之间的分歧和论争也日益激烈。以英国的佩珀、美国的福斯特、德国的格伦德曼为代表的生态社会主义者,对“新无政府主义”倾向提出了批判,努力把生态社会主义导向科学社会主义的轨道。1993 年,佩珀出版了《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在该书中,佩珀对各种社会主义的观点进行了归纳和分析,着重说明了“红”与“绿”之间的分歧。佩珀明确表示,他自己正是为了捍卫科学社会主义而介入“红”与“绿”之间的论争,他



正是要用科学社会主义来改造绿色运动,来消除“红绿联盟”之间的分歧。

要用科学社会主义来改造绿色运动,那么就要解决一个最基本的问题:马克思是否具有“生态原罪”(the original ecological sin)?所谓马克思的“生态原罪”,就是很多生态社会主义者,包括一些社会主义者认为,马克思是一位“生产力主义者”,马克思把生产力高度发展,物质极大丰富作为实现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物质基础,忽视了自然对人类发展的限制。所以,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很多生态社会主义者也认为:从根本上说,马克思是反生态的。

20世纪90年代以后,美国生态社会主义者波凯特和福斯特等人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长期研究,提出了新的观点:生态思想在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马克思不但有生态思想,而且他把这种生态思想运用到社会领域,对商品的循环过程进行分析,从而揭示了剩余价值的存在;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之作《资本论》说明:商品的循环是一种虚假的新陈代谢,它违反了“归还的规律”,在人与自然之间制造了“一个无法弥补的新陈代谢的裂缝”,要对这个裂缝进行系统的弥补,必须消灭剩余价值,实行“劳动者的联合生产”。正是马克思把解决生态问题的出路和社会主义的前途联系起来,这构成了当代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础和开端。

产生这些新变化的原因在于: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大量的共产党员和其他左派人士加入生态运动,科学社会主义在生态社会主义指导思想中的地位和影响日益扩大。

总的来说,和20世纪七八十年代相比,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生态社会主义出现了明显的新变化。它对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的失败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它针对当代帝国主义的行径提出了生态帝国主义理论;它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更加深刻;它在经济上更加务实;它在政治上更加重视工人阶级和阶级斗争;在指导思想上更加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并坚决地捍卫马克思主义。这些新变化和20世纪七八十年代相比,是一种明显的进步;从总的趋势来看,20世纪90年代以后,生态社会主义向科学社会主义更加接近。



## 第二节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生态 社会主义新变化的动因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生态社会主义出现新变化的动因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 一、苏东剧变后西方大左翼阵营的变化

苏东剧变,毫无疑问是 20 世纪世界政治史上重大的政治事件。它不仅彻底改变了苏联和东欧地区的社会性质,而且也极大地改变了西方大左翼阵营政治力量的格局。

在西方大左翼阵营内部,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的局面更像是“十月革命”前后局面的颠倒:当时是社会主义政党争相左倾,每一个落在后面的政党都设法去拉住前面政党的后襟;现在却是竞相右倾,每一个党都用自己的后背贴向比它更靠后的党,而那个党便急忙向后闪开,唯恐成为前面那个党的避风墙。从整体的情况来看,苏东剧变对整个西方大左翼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可以预料,在最近的将来,这种局面不可能有彻底的改观,任何不切实际的乐观都是有害的;当然也应该看到,欧洲社会主义和左翼运动并没有灭亡,而且只要资本主义存在,它便不可能灭亡,它将继续生存并不断为自己开辟道路。

在西方大左翼阵营内部,不同的左翼力量所受到的打击程度是不同的,整个大左翼内部的政治力量格局发生了变化。

首当其冲的是西欧共产党。尽管西欧的共产党大都早已改宗“欧洲共产主义”,宣布与苏联模式决裂,但现在却再一次受到苏联模式崩溃的牵连,陷入困境。他们有的分崩离析、被迫解散,有的改名易帜(如意大利共产党),有的尽管保留了原来共产党名称(如法国共产党),但在纲领和政策上却进一步社会民主党化。尽管采取了种种措施,他们的处境仍十分艰难:党员人数锐减,党员年龄老化,政治主张缺乏号召



力等。这些现象成为西欧共产党所面临的普遍问题。

社会民主党的选举虽有所上升,但思想却日益右转,最终没有躲过苏东剧变冲击波的打击。尽管在左翼阵营内部,欧洲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长期以来互相攻击,但是,随着西欧共产党的右倾,社会民主党却不得不采取更右的立场。例如,德国社会民主党理论家托马斯·迈尔解释道:“在几乎所有东欧国家共产主义政党都宣布改信民主社会主义的时候,我们还能用‘民主社会主义’的概念来说明自由的社会主义者的想法而不致遭到歪曲、招致毁谤和引起系统的误解吗?”<sup>①</sup>尽管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和英国工党等中左力量,在选举中的成绩明显上升,但其思想理论影响却不见丝毫发展,反而却日渐右转,甚至正是思想理论的右转促成了得票率的上升。但是,政治身份丧失所产生的负面作用在日益积累着,很多党员因丧失了对党的政治认同而纷纷退党,德国社会民主党甚至发生了分裂,一部分左派与前共产党联合起来另立新党。在21世纪初,欧洲的社会民主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接连倒下:2005年世界上最古老的社会民主党——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大选中失败;2006年,瑞典社会民主党下台,而瑞典被看作是“全世界社会民主党人心目中的圣地”;2007年,欧洲另一个大党——法国社会党也失去了执政地位。法国前公职部长拉·鲍尔曾经是法国共产党员,1994年脱离法共,他说:欧洲的社会民主党并没能躲过苏东剧变冲击波的打击,社会民主党遭受打击的时间只不过晚了大约10年罢了。

在这强劲的向右吹的风暴中,绿党似乎成了各种左派人士的避风港,获得了出人意料的发展。很多左翼政党,为了谋求生存与发展,纷纷与绿党结成“红绿联盟”,这无疑抬高了绿党中生态社会主义派的地位;从前组织被解散或者退党的共产党员和其他左派分子中,也有相当多的人加入了绿党,这无疑壮大了绿党中生态社会主义派的力量。20世纪90年代以前,欧洲各国执政的绿党都是在地方政府层面活动,到

---

<sup>①</sup> 托马斯·迈尔:《社会民主主义导论》,殷叙彝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第168页。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随着绿党的发展,已经有芬兰、意大利、法国、德国、比利时、瑞典 6 个欧洲国家的绿党进入全国性政府,成为全国性执政党。当然,绿党作为非主流政党,为了进入议会和政府,也改变了“绿色用不着婚嫁”的主张,与主流政党建立联盟。从绿党的政治实践来看,他们大多是与左翼的社会民主党、人民党或者社会党组成“红绿联盟”。因此,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生态社会主义成为绿党中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无论是其政治立场,还是其思想理论,都明显左转。21 世纪初,欧洲各国绿党相继退出政府,原因是随着欧洲的社会民主党纷纷下台,绿党也失去联合执政的盟友,但绿党本身仍保持着较大的政治影响力。

## 二、生态帝国主义的猖獗

20 世纪 90 年代,生态社会主义者提出了生态帝国主义理论,对生态帝国主义进行了尖锐的批判,这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的生态社会主义者所不曾深入研究的,构成了 20 世纪 90 年代生态社会主义的新变化。

形成这个新变化的主要原因是,20 世纪 90 年代,生态帝国主义十分猖獗。生态帝国主义的猖獗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生态掠夺;二是污染输出;三是生态帝国主义战争。

中心地区对边缘地区的生态掠夺,从早期资本主义殖民时代就开始了,这本身不是什么新变化。但是,在生态帝国主义阶段,掠夺的手段更加高明,而且生态掠夺本身被合法化和制度化了,这是早期的生态殖民主义所望尘莫及的。

20 世纪 90 年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大量向第三世界国家输出污染。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在强大的生态运动的压力下,各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纷纷通过了一些关于环境保护的法令,有的法令规定得十分严厉。例如,美国 1986 年颁布的《超级基金法》(the Superfund Act)规定,拥有被污染土地的组织将承担被污染土地的清理责任,一旦企业资不抵债,向企业提供土地抵押贷款的银行将成为这些被污染



土地的所有者,因此将承担清理被污染土地的责任,而且,该法令具有追溯力,对该法颁布之前的破坏环境行为也可以进行惩罚。这种规定意味着企业将承担潜在的巨额清理负债。而欧盟则成为名目繁多的绿色标准的发源地,是世界上采用绿色标准最早、最多、最严格的国家集团。它的绿色标准涉及绿色卫生检疫、绿色技术标准(电磁辐射、安全标准等)、绿色包装、绿色生产、绿色回收等方面。另外,环境问题也引起了世界各国的高度重视,形成了一些国际环境条约。例如,1992年全球185个国家缔结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并于1997年在日本京都形成了关于限制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成文法案,被称为《京都议定书》,它是第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旨在防止全球变暖而要求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条约。它要求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承担“共同的但有区别的”义务,“附件I国家”(发达国家)在2008—2012年间总体上要比1990年二氧化碳排放水平平均减少5.2%,发展中国家暂不承担减排义务。在这些国内国际法令的限制下,很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将高污染、高能耗的企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同时,随着垃圾种类和数量的增多,垃圾处理成本也不断增高,处理无害化率日益下降,于是,在经济利益驱动下,许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向第三世界国家或者东欧国家出口垃圾。

苏东剧变后,全球力量格局失衡,美国成为傲视全球、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因此,美国提出要抓住这个机会建立起一个由美国领导的单极的“新的世界秩序”(A New World Order)。美国是一个“轮子上的国家”,为了保证美国的经济安全,控制中东的石油资源,美国相继发动了两次海湾战争,战争引起油井大火与美军使用的贫铀弹对环境造成了严重影响。由于战争的目的和手段都和生态有关,所以,这些战争被称为“生态帝国主义战争”。

### 三、绿党内部各派力量的消长

20世纪90年代以后,生态社会主义出现了一系列的新变化,这与绿党内部各流派力量的消长也很有关系。



按照通常的说法,绿党内部存在着五种流派:生态社会主义和生态资本主义,生态激进主义和生态现实主义,还有生态女性主义。显然,这种划分不是一种严格的分类方法,只是根据各个流派的不同特征进行的区分,存在交叉重叠现象。

20 世纪 70 年代,在绿党成立之初,生态社会主义派在绿党中明显居于主导地位。但是,自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很多绿色人士对生态社会主义方案提出了质疑,因此,他们成立了生态自由主义派,也就是生态资本主义派,来反对生态社会主义。苏东剧变前后,很多生态运动人士转向了生态资本主义。随着生态资本主义派力量的增长,他们的反社会主义言论也更加激烈,他们认为:资本主义显然赢得了冷战,在这种情况下还继续坚持生态社会主义,似乎失去了意义。但是,另一方面,苏东剧变之后,由于大量左派人士加入绿党,左翼政党和绿党建立了“红绿联盟”,生态社会主义派的地位也获得了提高,其思想理论向马克思主义进一步接近。这样,在 20 世纪 90 年代,生态社会主义派和生态资本主义派之间的交锋更加激烈,在这个过程中,生态社会主义理论获得了进一步发展。

执政也促进了绿党内部各流派力量的消长。20 世纪 70 年代,绿党成立之初,生态激进主义以其鲜明的绿色形象在绿党内部占据主导地位;当时,绿党的主要斗争方式是“制度外斗争”。20 世纪 80 年代,在多数欧洲国家,绿党相继进入了地方性政府,而进入政府的绿党成员多数都坚持生态现实主义。这样,随着各国绿党在现实政治中涉足越来越深,生态激进主义的方案越来越难以找到市场,而生态现实主义派在绿党内部的影响越来越大,生态激进主义派和生态现实主义派之间发生了激烈的斗争。到 20 世纪 90 年代,绿党内部生态激进主义派和生态现实主义派之间的纷争已基本结束了,生态现实主义取代了生态激进主义派的主导地位,绿党在新的生态现实主义的基础上重新团结起来。在执政的过程中,绿党这头“绿色的公牛”日益消失了它的野性,其政治态度日渐务实。生态激进主义所信奉的“生态中心主义”已成为明日黄花。在这样的背景下,生态社会主义也摆脱了过于理想化的主张,从“生态中心主义”重返“人类中心主义”。



#### 四、后现代主义的衰落

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世界性文化思潮,对生态社会主义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生态社会主义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的新变化和后现代主义的衰落有着密切的关系。

后现代主义认为,自文艺复兴以来,“现代性计划”所确立的对理性信仰包括两个方面:以科学技术为主要内容的工具理性,和以人的自由解放为核心的人文理性。但是,在现代社会,人文理性遭到了工具理性的全面侵占,形成了“科学的专制”和“理性的放荡”局面,文化危机和信仰危机产生了。反对工具理性的霸权,重建人文理性和工具理性之间的平衡关系,是后现代主义的主题。因此,后现代主义常常对科学技术抱着怀疑甚至是敌视的态度,试图颠覆科学的霸权地位。所以,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在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下,生态社会主义迷恋丛林生活、反对科学技术的情结非常兴盛:主张小规模、分散化的生产;提倡稳态经济,反对过度增长。

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文化无政府主义。为了重建人文理性与工具理性之间的关系,后现代主义通过宣扬“去中心”、“多元化”的“解构主义”,来打破任何形式的文化霸权。因此,在政治上,后现代主义奉行的是“差异政治”,让那些被压抑的“他者”(the other)有发声的机会。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多数生态社会主义者明显受到后现代主义的影响,认为马克思主义作为现代旧政治,已经过时了,因为人类已经进入了后现代社会,现代社会中大规模、高度集中的福特主义,已经让位于小规模、分散化的后福特主义(post-Fordism),与福特主义相联系的阶级政治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革命的目的也不是为了去建立某个阶级的专政,用一个阶级去代替另一个阶级统治,而是为了超越和绕过这种产生专政的二元结构,建立一个“多元”的社会。

从后现代主义的发展阶段来看,它声势夺人并震慑思想界是在 20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但是,后现代主义本身陷入了理论上的死胡同:对工具理性的颠覆使它自己陷入空洞和虚无,后现代主义的批判只



剩下一一种批判的姿态和情绪的宣泄。到 20 世纪 90 年代,后现代主义开始表现出狂躁以后的疲惫,声势大减——从最初颠覆工具理性的暴怒转变为狂躁之后的疲惫,谋求将工具理性与人文理性相融合。

所以,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生态社会主义的立场也发生了相应的转换,从后现代主义重新回到现代主义。很多生态社会主义者明确表示,现代政治并没有终结,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现代政治仍然有效。佩珀对后现代主义持批评态度,他认为,后现代主义“跟反对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相比,它与晚期资本主义有着更多的共鸣。后现代主义的世界是破碎的、表面化的,缺乏秩序和方向。它的非理性消解了理性和进步”<sup>①</sup>。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高兹明显带有“后现代主义”思想——他批判科学技术,宣扬“告别工人阶级”和阶级意识的幻灭;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高兹提出了“捍卫现代性”的主张,而且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现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是生态运动的解毒剂,说明他向“科学社会主义”立场有所接近。

## 本章小结

本章说明了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生态社会主义的新变化,主要包括:对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生态教训进行了反思,提出了关于生态帝国主义的新理论,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更加深刻,经济政策更加务实,在政治理论上更加重视工人阶级和阶级斗争,在指导思想反对“新无政府主义”、坚持“科学社会主义”。

其中,前两个新变化——对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失败的反思和对生态帝国主义的批判,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的生态社会主义基本上未曾涉及的新内容,反映了时代的新变化。关于生态危机的根源、经济

<sup>①</sup> Pepper, David, *Eco-Socialism: From Deep Ecology to Social Justice*, Routledge, London and NY 1993, p. 57; Scott, A., *Ideology and the New Social Movements*, Unwin Hyman, London 1990, p. 103.



政策、政治理论和指导思想等问题,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的生态社会主义曾有过详细的论述;但是,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在这些问题上,生态社会主义发生了明显的理论转折。总的来看,这些新变化反映了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生态社会主义向科学社会主义更加接近的趋势。

本文还揭示了产生这些新变化的动因,最主要的动因是苏东剧变,另外,生态帝国主义的猖獗、绿党内部各流派力量的消长和后现代主义的衰落也是新变化的动因。在上述因素的共同作用之下,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生态社会主义出现了一系列的新变化。其总趋势是向科学社会主义更加接近。后面两章将对这些新变化进行具体讨论。



##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生态社会主义的主要新观点——反思与批判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生态社会主义出现了许多新变化,本章将详细说明其中两个方面的新变化:一是对苏联生态教训的反思;二是对生态帝国主义的批判。这两个新变化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的生态社会主义者未曾深入研究过的,基本上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出现的新内容。

### 第一节 生态社会主义对苏联生态教训的反思

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生态社会主义者也曾涉及苏联的生态问题,但缺少可圈可点的地方。他们的理论主要是沿袭了法兰克福学派的“趋同论”,认为社会主义苏联和资本主义西方实际上是同一个“工业社会”的两个版本,同样都是反生态的。而且,这个“借来”的理论也不能和实际结合——由于政治原因,西方的生态社会主义者对苏联生态问题的实际情况并不了解,所以他们谈论苏联生态问题显然是“隔着纱窗看晓雾”。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苏东剧变成为生态社会主义者的热点话题;而且,随着苏联的“公开化”(glasnost),大量的苏联生态危机的事实被



揭露出来,使生态社会主义者有条件来了解苏联生态问题的实际情况,对其原因进行详细分析,并进一步从生态角度对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失败的原因进行思考。20世纪90年代以后,关于苏联生态问题的认识,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是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生态社会主义无法相比的。

## 一、“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

在谈论苏联的生态问题之前,我们首先要明白,对于生态社会主义者来说,“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个概念是有区别的。

一些生态社会主义者认为,在苏联和东欧,从来就不曾存在真正社会主义,因此就谈不上讨论什么社会主义的失败。资本主义西欧和“社会主义”东欧有那么多的相似之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已经融为一体了,现存的两种社会制度只是同一事物(工业社会)的两个变种。很多生态社会主义者从纯粹的理想主义角度出发,把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政权和严格的社会主义标准相比较,进而得出结论:它们不是社会主义。于是,他们说,在东欧失败的是另一种东西,并非社会主义。

例如,法国生态社会主义者高兹认为,“现存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奉行经济理性、对抗生态保护这一点上没有实质性的区别。高兹认为,资本主义奉行的是利润最大化的经济理性,而经济理性是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源。1991年,在《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和生态学》中,高兹认为,如果把资本主义的经济理性加诸于社会主义,那么,这种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没有什么两样。真正的社会主义应该限制经济理性的作用,以生态理性取而代之,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符合社会主义的含义和实现社会主义的宗旨。所以,他强调,苏联的社会主义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仅仅向人们提供了一幅资本主义基本特征的滑稽的放大图。高兹对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政权全盘否定,当然是错误的,受到了其他生态社会主义者的批评。

其他生态社会主义者(如德国的萨卡尔)认为,对现实社会主义的否定实际上只是文字游戏,用这种方法回避问题,没有什么意义。他们



认为,尽管可以把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和西方的资本主义看成是工业社会的两个变种,但这两个变种毕竟有不同之处,所以才把它们称为“两个变种”。但是,他们仍然对“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个词语做了区分:在表示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政权及其制度的时候,使用加了引号的“社会主义”,当然,他们表示:使用引号的时候并没有什么贬义,只是特指具体的、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制度;在表示一种普遍性的、抽象的社会主义概念时,他们使用不加引号的社会主义。他们认为,这种区分应该被允许,也是无法避免的,因为社会主义已经是一顶没有了形状的帽子,太多的人戴过它。

基于对“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个概念的区分,德国著名的生态社会主义者萨卡尔说:“‘社会主义’死了,但是社会主义还没有死,社会主义还有前途,但是它必须吸取生态教训。”<sup>①</sup>

## 二、苏联的生态教训

随着苏联问题的公开化,大量的生态问题被暴露出来,生态社会主义者对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对这个问题论述得最充分的是德国的萨卡尔,美国的福斯特也做了相关的研究。

萨卡尔认为,世界上第一个苏维埃政权诞生在一片幅员辽阔的土地上,这里的资源非常丰富。在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自然条件方面,没有哪个国家可以比得上这一片广袤富饶的土地。所以,“社会主义”的敌人在武装干涉失败后,仍无法从经济上扼杀苏维埃政权。但是,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造成了资源浪费,也带来了严重的污染。萨卡尔详细说明了苏联实际存在的大量的工业污染、农业中的化学污染和水土流失,还有严重核污染等问题。通过分析,萨卡尔认为,由于治理环境成本日益增加,苏联的经济增长日益被治理环境成本所抵消了,因此,苏联经济也日益陷入停滞。

<sup>①</sup> Saral Sarkar, *Eco-Socialism or Eco-Socialism?*, Zed Books, London and New York 1999, p. 5.



美国的福斯特也认为,严重的生态危机阻碍了苏联的经济,也严重损害了苏联人民的身心健康。苏联已经是现代化程度非常高的国家,这和苏联的大国地位是非常不相称的。在东欧,生态状况也是同样糟糕: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是欧洲工业污染水平最高的国家。

为什么在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生态问题也如此严重?这个问题的影响十分重大,它有可能动摇生态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要解决生态危机,必须实行社会主义制度;而实际情况是,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生态状况也同样糟糕。生态社会主义者必须对这个问题作出明确的回答。

对这个问题进行全面深入研究的是德国的萨卡尔,他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 在解决生态问题方面,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制度更优越

萨卡尔首先肯定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他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所有的资源和生产资料都归国家所有,所以就不会像资本主义社会那样,产生“外部成本”(external cost)。所谓“外部成本”,就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企业造成的环境污染是不计入成本的,而是转嫁到企业外部,由社会来买单。在社会主义社会,如果任何国有企业试图通过牺牲环境来获取额外的利润,那么最终付出代价的还是国家。污染者是国家,承担污染的还是国家,国家不能把环境成本转嫁到社会,所以社会主义国家当然应该注重环境保护。对此,萨卡尔说:“实际上,这也是20世纪70年代所有社会主义者的基本观点。”<sup>①</sup>肯定社会主义制度在解决生态问题上的优越性非常重要,否则,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就被动摇了。但是,如果社会主义国家不采取有效的措施来保护环境,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当然无法发挥出来。

(二) 随着大规模的工业化,经济发展压倒了环境保护

萨卡尔肯定,苏维埃的领导人也曾做过很多努力,试图去完成这个寄托在社会主义制度上的希望。列宁曾把环境保护放在十分重要的地

<sup>①</sup> Sarkar, Saral, *Eco-Socialism or Eco-Socialism?*, Zed Books, London and New York 1999, p. 37.



位。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建立自然保护区的国家。苏维埃还通过了大量保护自然的法律,除了专门的法规,1977年,苏联还把环境保护作为国家和公民的责任,写进了宪法。这说明苏联对生态保护的重要性十分清楚。

萨卡尔继续说,从 20 世纪 20 年代末开始,苏联相继实行了三个“五年计划”,开始了快速工业化,“在苏联的决策层,经济发展压倒了环境保护”。<sup>①</sup>萨卡尔分析了苏联领导层之所以这样做的原因:新生的苏维埃国家面对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威胁,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必须迅速实现工业化。但是俄国是一个相对落后的国家,原有的工农业各个部门都非常薄弱。要实现经济快速增长,必须把每一点每一滴的剩余财富投入生产。因此,当然不会拿出很多的钱来投入环境保护。但是,要治理生态环境,需要的投入非常巨大。萨卡尔引征戈尔巴乔夫的首席环境顾问雅布罗可夫的说法:要有效地保护环境,苏联需要每年把 GNP 的 5% 投入环境保护,这对于苏联来说显然是做不到的。苏联实际的环保投入是多少呢?只有 GNP 的 1%。<sup>②</sup>苏联官方的资料显示,在 1976—1980 年的“五年计划”中,苏联年平均增长率是 4.2%,1980—1985 年度的年平均增长率仍维持在 3.6%,这个数字并不算低,但是为什么苏联经济还是陷入了停滞?萨卡尔认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经济增长被环境成本抵消了。

### (三) 苏联的“时代精神”与环境保护也存在着矛盾

萨卡尔还从文化角度分析了苏联环境恶化的原因。他认为苏联的“时代精神”(zeitgeist)包含着人对自然的破坏和征服。萨卡尔引用 1926 年苏联作家萨苏布林(Sasubrin)在第一届作家大会上的发言来证明他的观点。萨苏布林这样说:“我希望,西伯利亚这颗柔软绿色的乳房,套上水泥铸成的城市盔甲,罩上石头砌就的工厂烟囱口套,拴上铁

<sup>①</sup> Sarkar, Saral, *Eco-Socialism or Eco-Socialism?*, Zed Books, London and New York 1999, p. 39.

<sup>②</sup> Sarkar, Saral, *Eco-Socialism or Eco-Socialism?*, Zed Books, London and New York 1999, p. 48; Jablokow, Alexej, “ökologische Ignoranz und ökologisches Abenteuerium”, in Afanassjew, Juri, ed. *Es Gibt keine Alternative zu Perestroika* 1988, p. 312.



路的锁链。把那些针叶林砍光,烧成灰烬,把西伯利亚草原踏在脚下。让这一切到来吧,它一定要实现。只有在水泥和钢铁之上,才能建立起全人类的友爱,才能建立起全人类钢铁般的友爱。”<sup>①</sup>显然,萨苏布林的发言中包含着对自然的践踏和破坏。

#### (四) 苏联没有奉行生态帝国主义政策

萨卡尔把“没有殖民地”作为苏联生态恶化的重要原因,以此来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环境相对改善进行对比。尽管苏联曾多次发动过战争,但是,战争的目的不是像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那样,为了掠夺和控制自然资源,而主要是出于政治原因。相反,苏联对外扩张和军备竞赛消耗了大量的人力和资源,反而加剧了经济发展与环境承载能力之间的紧张状态。本节将对萨卡尔的这个观点进行比较详细的介绍,此处不再赘述。萨卡尔的这个观点还是比较公道的,生态帝国主义包括生态掠夺、污染输出、发动生态帝国主义战争三个方面,按照这三条来衡量,苏联不是一个生态帝国主义国家。

总的来说,生态社会主义者认为,工业社会不可避免地会造成生态危机,但是,社会主义制度本来可以更好地解决生态问题。这一观点坚持了社会主义制度在解决生态问题上的优越性,是值得肯定的。生态社会主义者对苏联生态问题原因的具体分析也颇有启发意义。

但是,本书认为,萨卡尔对苏联的工业化完全持否定态度,这是不妥的。工业化是必须的,关键是平衡工业化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在相对落后的俄国单独实现了。这就需要在社会主义阶段去完成本应在资本主义阶段就完成的工业化;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面对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尽快实现工业化,这是没有错的。苏联的工业化确实超越了粮食生产、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但是,在找到一条更好的工业化道路之前,萨卡尔完全站在生态保护的立场上否定工业化是不对的。

<sup>①</sup> Sarkar, Saral, *Eco-Socialism or Eco-Socialism?*, Zed Books, London and New York 1999, p. 39.



这并不是说,历史的实际进程违背马克思的预言就必然导致严重的生态破坏。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经济和环境之间的矛盾本来可以得到更好的解决。特别是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苏联已经奠定了强大的工业基础,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大大增强了,国际环境也远远好于战前,苏联获得了良好的机会来调整经济和环境之间的矛盾。但是,苏联仍然奉行军备竞赛和对外扩张的争霸政策,使经济发展与粮食、资源、环境承载能力长期处于紧张状态。这是错误的。如果说这种超越粮食、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增长方式在短时期内还可以维持,但是,要长时期维持是绝对不可能的。

为了“赶英超美”,中国也曾长期超越粮食、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结果酿成严重的生态灾难,欲速则不达。但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坚决地把过高的经济指标降下来,为改革开放创造了宽松的社会环境。当前,中国的环境问题仍十分严峻,汲取苏联和我们自己以前的生态教训非常必要。党的十七大报告顺应中国和世界发展的大势,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新要求,这对于发挥社会主义制度在解决环境问题上的优越性具有重大意义。

### 三、从“增长极限”的角度分析苏联粗放型增长模式

苏东剧变之后,对苏联模式的反思成为一个热点话题。苏联为了实现快速工业化,创造了粗放型增长模式,这一模式在一段时期内曾经使苏联经济保持高速增长;而且,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模式被当作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生态社会主义者从“增长的极限”角度对粗放型增长模式进行了研究,认为苏联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模式超越了增长的极限,造成了经济停滞,必须看到苏联经济停滞背后的“增长的极限”的作用。

“增长的极限”一词来源于 1972 年著名的“罗马俱乐部”的报告《增长的极限》。1974 年,罗马俱乐部又出版了另一个影响较大的报告《人类处于转折点》。在这两部著作的基础上形成了“增长的极限”理论的基本观点。所谓“增长的极限”,就是粮食、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对工业和人口增长的限制,超越这个限制,就会造成社会失序、资源枯竭和环



境破坏。要符合“增长的极限”的要求,就要转变增长方式,不但要注重量的增长,而且要注重质的提高。其实,早在《增长的极限》出版之前,中国对“增长的极限”的道理也有一定程度的认识。20世纪50年代,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在“三大改造”过程中,也出现过一词,“冒进”或“冒了”。“冒进”或“冒了”,简单地说,就是“超过时代,超过当前的情况”。那么,经济增长超过了粮食、资源和环境的承载能力,自然也是“冒进”。现在,还有一个词叫做“粗放型增长”,主要是从增长方式来讲的。“粗放型增长”依靠高投入来维持高产出,是一种数量型的增长,忽视质的提高,按这种增长方式发展下去,势必会到达“增长的极限”,对整个生态系统造成破坏。因此,要转变“粗放型增长”,注重质的提高,实现“集约型增长”。“冒进”和“粗放型增长”与“增长的极限”的主要思想是一致的。

从“增长的极限”角度,对苏联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论述得最充分的是德国的生态社会主义者萨卡尔。萨卡尔认为,为了实现快速工业化,苏联建立了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超越了粮食、资源和环境的承载能力;而且苏联也没有新式的海外殖民地,无法把粮食、资源、环境危机转嫁到第三世界国家;由于长期的“经济主义”的宣传,社会主义国家也像资本主义一样,陷入了“异化生产”和“异化消费”,创造“社会主义新人”的宏伟工程失败了,当苏维埃的领导者们看到像欧美那样丰裕的物质生活不可能实现了,就依靠手中的特权来实现优裕的生活,于是腐败产生了,社会主义道德堕落了。下面,从农业、工矿业、外贸、社会道德四个方面来介绍萨卡尔的主要观点。

#### (一) 工业增长超越粮食生产的承载能力

萨卡尔认为,苏联工业增长所需要的巨大积累主要来自农业,快速的工业增长显然也超越了粮食生产的承载能力,对农业生产造成了破坏,使农业生产成为苏联经济的沉重负担。

萨卡尔认为,快速工业增长对农业造成的破坏,成为苏联经济难以愈合的创伤。萨卡尔说:“1917年之前,俄国是欧洲的主要的粮食出口国。从1909年到1913年,俄国平均每年的粮食出口量为1100万吨。但是,工业化之后,粮食的年出口量从未超过780万吨,这个数字是在1962年才达到的……1929—1933年集体化运动的目标之一就是要把农



业的积累转移到工业。”<sup>①</sup>工业增长对农业的破坏是显而易见的,萨卡尔的这个观点也可以在我国关于苏联工业化的史料中得到印证:如果以 1928 年的农业总产值为 100%,那么 1929 年为 98%,1930 年为 94%,1931 年为 92%,1932 年为 86%,1933 年为 81.5%。畜产品的下降更甚,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牛从 6 010 万头下降到 3 350 万头,羊、猪、马的数量下降 2/3 以上。<sup>②</sup>

萨卡尔认为,尽管工业化之后,苏联在农业机械、灌溉、化肥和农药上投入了大量资金,但农业长期落后的局面并未完全消除,其不良后果仍久久不散。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落后的农业加重了政府的财政负担。为了发展农业,国家提高了粮食收购价,并给农民其他好处。由于政治原因,苏联的食品零售价不能提高。1962 年,赫鲁晓夫曾经试图提高食品价格,结果招来了抗议和混乱。所以,苏联政府一方面要给农民补贴,另一方面要以低价的形式对城市居民进行补贴,苏联的粮食销售价常常低于收购价。到 1980 年,苏联每年对农业的补贴高达 500 亿美元。

第二,落后的农业加重了苏联的外汇支出。从 1963 年开始,苏联开始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口粮食和大量的肉类、奶制品。这引起了西方国家高度的关注,但是苏联进口粮食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发生了饥荒,而主要是作为饲料。因为长期意识形态的宣传和国家领导人对“土豆烧牛肉式的共产主义”的承诺,人民对肉类和奶制品的需求总是在增加,造成肉和奶长期的缺口,国内畜牧业生产还没有从过去的创伤中恢复过来,无法满足这个缺口,尤其是在农业歉收的年份。

所以,萨卡尔这样评价苏联的农业:“苏联农业从‘社会主义原始积累’(primitive socialist accumulation)的主要来源变成了苏联经济的沉重负担。”<sup>③</sup>

<sup>①</sup> Sarkar, Saral, *Eco-Socialism or Eco-Socialism?*, Zed Books, London and New York 1999, pp. 30—1.

<sup>②</sup> 王春良、祝明主编:《世界现代史》上册,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235—236 页。

<sup>③</sup> Sarkar, Saral, *Eco-Socialism or Eco-Socialism?*, Zed Books, London and New York 1999, p. 31.



## (二) 工业增长超越自然资源的承载能力

萨卡尔认为,落后的苏维埃俄国要快速实现工业化,除了剥夺农业之外,还通过剥削自然资源来换取经济高速增长。苏联的自然资源之丰富程度是无与伦比的,但是,在苏联粗放型增长方式下,苏联很快耗尽了开采条件最优越的自然资源,并引起了环境恶化。

萨卡尔以矿业为例,来说明苏联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式开发。萨卡尔引用苏联经济专家的话来证明他的观点:“很多有价值的矿石和石油被留在矿井和油井中或者被丢弃……很多矿山和油井的回采率只有50%。”由于采富弃贫,至少一半的资源都损失了。所以,到20世纪60年代,这位苏联经济专家开始表示“担心这个国家极为丰富的资源会很快枯竭”<sup>①</sup>。萨卡尔说,在赶超战略的影响下,不但矿山的经营者,而且国家的计划者也是那样急功近利,纵容了这种掠夺式的开发行为。国家计划者甚至为这种行为进行辩护:如果苏联的资源不是那样相对丰富,苏维埃政权也不会那样不理智地浪费丰富的原材料,这样可以节约其他更有限的生产要素,如劳动力和资金。

萨卡尔指出,这种掠夺式的开发当然无法长期维持。为了克服矿业产出不断下降的状况,国家只好以高投入来维持矿业生产的高增长。但是,高投入就可以维持高增长吗?尽管国家对矿业的投入在不断增加,但是,矿业增长率却在不断下滑。所以,萨卡尔说,通过大规模的采矿业,苏联很快地耗尽那些开采条件最优越的自然资源。当然,矿业只是最直接地反映了苏联对自然资源的掠夺。超越自然资源和环境承载能力的增长,在其他部门也同样存在,这种增长当然无法长期维持下去。

粗放型的增长方式和掠夺式的开发也超越了环境的承载能力,带来了严重的环境问题,而环境恶化又造成生产成本上升和劳动力健康状况的恶化,苏联的GNP增长率被环境成本抵消了。

<sup>①</sup> Sarkar, Saral, *Eco-Socialism or Eco-Socialism?*, Zed Books, London and New York 1999, p. 27; Goldman, Marshall I., *The Spoils of Progress-Environmental Pollution in the Soviet Union*, Cambridge, Mass 1972, pp. 48—9.



### (三) 无法获得“来自穷国的馈赠”

萨卡尔认为,快速工业化和苏联粗放型的增长模式影响了苏联的对外贸易和出口产品构成,使苏联在世界市场上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

所谓“来自穷国的馈赠”是英国《经济学家》(*The Economist*)杂志的说法,萨卡尔引用了这个说法。《经济学家》杂志对“来自穷国的馈赠”做了这样的解释:“就像昨天高昂的石油价格曾两度让富裕的国家陷入滞胀,今天便宜的原材料可以帮助他们消灭通货膨胀并推动经济增长……大多数富裕国家还没有认识到……来自穷国的馈赠是多么巨大。在过去的 12 个月中……金属的价格降低了 15%,石油价格降低了 5.5%。这种降低……意味着消费者可以获得同样的东西,但比 12 个月前少付 650 亿美元。”<sup>①</sup>“来自穷国的馈赠”实际上指在当代国际经济旧秩序依然存在的条件下,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

萨卡尔认为,直到苏东剧变之前,在世界市场上,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原材料和初级产品的价格一直在下跌,这对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极为有利。1961—1964 年,西欧的一只瑞士表可以换到 7.5 公斤的坦桑尼亚咖啡;10 年之后,1971—1974 年,同样的一只瑞士表可以换到 14.2 公斤的坦桑尼亚咖啡。1985 年,西欧可以用一辆联邦德国产的拖拉机,从象牙海岸换到 7.6 吨的可可;而 1990 年,则可以换到 29 吨可可。<sup>②</sup>

萨卡尔认为,苏联在国际贸易中的份额很低,所以无法获得这份“来自穷国的馈赠”。萨卡尔认为,这是由于历史原因和政治原因。为了实现快速工业化,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免受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威胁和军事威胁,苏联不得不实行了一套相对自给自足的经济政策。所以,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无法像西方国家那样,得到这份优厚的“来自穷国的馈赠”。在苏联有限的国际贸易中,与第三世界国家的交易额尤其低。因为,在赶超战略的影响下,苏联对外贸易的主要任务是

---

<sup>①</sup> Sarkar, Saral, *Eco-Socialism or Eco-Socialism?*, Zed Books, London and New York 1999, pp. 52—3; *The Economist*, 6 December 1985, London, p. 13.

<sup>②</sup> Sarkar, Saral, *Eco-Socialism or Eco-Socialism?*, Zed Books, London and New York 1999, p. 52; Daily Newspaper: *Frankfurter Rundschau*, 25 July 1991.



换取硬通货,引进西方先进的技术和设备,而多数第三世界国家付不起硬通货。

萨卡尔还说,赶超战略也造成了苏联不良的出口产品构成。为了赶超西方,引进西方先进的技术和设备,苏联对外贸易的主要任务是换取硬通货。但是,苏联的工业品在国际市场上没有什么名气,发达的国家能付得起硬通货,却不愿意购买苏联的工业品。所以,为了换取硬通货,苏联只好向发达国家出口低附加值的初级产品,或者是原材料,这使苏联的出口产品构成和第三世界国家一样,存在着不良特征。国际市场上燃料、原材料价格的下降,给苏联经济带来了和发展中国家一样的不良后果。

根据上述分析,萨卡尔得出两点结论:第一,“来自穷国的馈赠”至少构成了西方国家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第二,它也部分地解释了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在赶超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过程中,反而落后了。

#### (四) 社会主义道德的堕落

萨卡尔认为,粗放型增长模式背后的指导思想是“经济主义”,“经济主义”的指导思想导致了社会主义道德的堕落,葬送了苏联“社会主义”。

萨卡尔认为,粗放型增长模式的指导思想是所谓的“经济主义”,“经济主义”是传统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理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经济主义”认为:持续的经济增长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须的。“经济主义”还认为:物质极大丰富对于实现共产主义社会是不可少的。由于这种“经济主义”的思维,“社会主义者”们对他们的经济增长速度和物质的丰富程度从来都没有感到满意过。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初,建立在超越粮食、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基础上的“苏联模式”再也无法维持最初的高速增长,经济停滞出现了。物质极大丰富对所有的公民来说不可能实现了,为了让自己享受意识形态所许诺的好生活,统治集团开始给自己特权,于是腐败滋生了,整个社会的道德开始堕落。

萨卡尔又进一步说明了“经济主义”对社会主义道德的影响。他说:“我认为社会主义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增长的极限和道德堕落”:一个



是客观因素，“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失败的原因主要是它违反了增长的极限。”另一个是主观因素，从“异化消费”角度来看，“‘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在创造‘社会主义新人’方面失败了，社会主义新人的行为应该以新的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道德为指导”<sup>①</sup>。

在萨卡尔看来，一个社会制度的失败包括很多方面，如果仅仅是在某些方面失败了，而在其他方面仍然能保持成功，那么这种社会制度仍有可能维持下去。资本主义社会在道德方面显然是堕落的，例如，美国社会充斥着犯罪、暴力、心理扭曲、吸毒、失业、无家可归等等现象，但是，美国在经济方面显然是成功的，所以，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仍然能够维持下去。在苏联和东欧，即使经济停滞了，但是，如果共产党的道德原则和国家的道德原则还没有被“异化消费”观念所腐蚀，还是社会主义的，那么，“社会主义”政权还能继续存在；反过来，即使道德下降了，人们陷入了“异化消费”，但是，如果经济持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社会主义”政权也能继续存在。然而，这两个条件都没有得到满足。萨卡尔在这里显然过分看重了道德的力量，这是他的一贯看法，他不相信科学技术的作用，把道德进步看成是实现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的动力。

萨卡尔认为，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模仿了苏联体制，他们的经历至少在经济方面十分相似，所以随着“苏联模式”的崩溃，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也相继失败了。

萨卡尔认为：对苏联历史的分析非常重要，不单是为了发现苏联模式失败的原因，而且是为了构想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很多将在未来社会主义社会中遇到的问题，都曾在苏联的历史中展现出来，有些问题甚至还经过激烈的争论。从这一段历史中可以得出很有价值的教训——未来社会主义社会必须符合增长极限的要求。

萨卡尔强调了生态问题对于社会主义的重要性，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但是，他们的分析也存在着很多缺陷。具体地说，表现在以下几

<sup>①</sup> Saral Sarkar, *Eco-Socialism or Eco-Socialism?*, Zed Books, London and New York 1999, pp. 5—6.



个方面：

第一，萨卡尔过分强调和夸大了“增长的极限”的作用。

萨卡尔是一位“生态中心主义者”，他以生态问题为出发点，来构建整个生态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他过分强调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的对立，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是一种“经济主义”，甚至主张用“增长极限的范式”来取代马克思主义。但是，生态问题固然重要，它只构成了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失败的各种原因中的一个；同时，生态问题也只能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方面，而不是全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不能单纯建立在生态问题基础上。

第二，萨卡尔对苏联超越“增长极限”的工业化持全盘批判的态度，缺乏对当时具体历史条件的分析。

如果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业化全盘否定，就陷入了对历史的全盘否定。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普遍地实行了快速的工业化，他们的经济增长都超越了粮食生产、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如果这只是某个国家的特殊现象，我们可以把它归结为政策的失误，但是，如果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这样，那么，超越“增长的极限”则有其必然性。在社会主义的实际历史进程中，如果没有苏联的快速工业化，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进程就要改写，就没有战后社会主义国家阵营的壮大。具体到中国，自1840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在这100多年中，中国饱受帝国主义的侵略；而且，到1953年，朝鲜战争还没有结束，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仍面临帝国主义战争的威胁。可以说，快速实现工业化，是全中国人民的共同心愿。没有当年的工业化，就没有今天完整的工业体系，没有中国经济的全面发展，就没有中国今天的大国地位，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也难以像今天这样稳固。

反思过去不是诋毁历史，当然也不能为破坏环境进行辩护。如果说过去社会主义国家超越“增长的极限”是迫于种种历史的压力和国际环境的压力，那么，今天，这种做法必须停止，因为，就像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所昭示的那样，长期的“冒进”是不可能的。正如生态社会主义者所指出的那样，社会主义必须符合生态要求，而这正是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应有之意。



## 第二节 生态社会主义对生态帝国主义的批判

20 世纪 90 年代,生态社会主义提出了生态帝国主义的概念,并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这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的生态社会主义所不曾做到的。美国生态社会主义者福斯特相继出版了《脆弱的星球,环境经济简史》(1994)和《反资本主义的生态学》(2002)等著作,对生态帝国主义做了比较全面的论述。

“生态帝国主义”是指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第三世界国家进行的生态侵略和掠夺;同时,生态社会主义者也把生态帝国主义看成是资本主义的一个发展阶段。他们把早期的资本主义生态掠夺称为“生态殖民主义”,随着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生态殖民主义也发展到了生态帝国主义阶段,这和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是一致的。

### 一、从早期生态殖民主义到当代生态帝国主义

福斯特认为,当代生态帝国主义就是从生态殖民主义发展而来的。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意味着将全球分成中心和边缘地区,边缘地区的人和生态系统只是被作为附属品,来满足资本主义中心地区发展的需要,这就形成了早期的生态殖民主义。福斯特对早期的生态殖民主义进行了详细的考察。

早期的生态殖民主义涉及面十分广大,包括人口问题、植物的移植、动物灭绝、生物多样性丧失、荒野的退化、矿物质污染、大气污染、城市问题……无法一一详述。本书就先从植物学方面来介绍,主要目的是展现出从早期生态殖民主义到当代生态帝国主义的发展轮廓。

美国生态社会主义者福斯特对早期生态殖民主义的植物移植做了比较深入的考察,下面来看他的论述和观点。

福斯特说:“看一看欧洲的植物学研究是怎样组织起来去剥削热带地区的农业,就能非常清楚地了解边缘地区的生态资源是以怎样的规



模被转移到中心地区,去满足那里的需要。”<sup>①</sup>

在前工业社会,植物是热带地区的财富和那里大多数人民的生计。而欧洲的殖民者早就渴望着掠夺这些财富,最主要的几种植物资源是:糖、咖啡、茶、棉花、金鸡纳霜和橡胶。直到工业革命,植物移植才形成全球规模。

福斯特非常详细地叙述了植物园在生态殖民过程中的作用。“植物园”和我们今天所说的植物公园不是一码事,它是殖民国家的植物研究机构。荷兰、英国、法国都采用过植物园制度来管理国内的植物移植活动。在当时的殖民时代,最重要的是英国一个叫做“Kew”的植物园。该皇家植物园建于1772年,坐落在伦敦郊外。在18世纪,植物的运输非常困难,因为鲜活的植物在海上长途运输的过程中会很快枯萎。所以早期的植物园的职能主要是收集热带植物的资料并将它们整理分类。1829年,一位叫那撒尼奥·沃德(Nathanial Ward)的医生,发明了一种带有玻璃盖子的大木箱,被称为“沃德箱”,它能使娇嫩的植物经受长途运输而免于缩水死亡。这个小小的发明开创了植物移植的新时代。

在生态殖民过程中,英国各地层层设立了植物园体系,“Kew”很快脱颖而出,成了中心机构。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Kew”的植物学家们开始系统地研究植物移植:1872年,利比里亚的咖啡第一次被从西非移植到世界各地;1876年,巴西的橡胶树被移植到锡兰。移植的最终目的当然是将可以商品化的植物与廉价的劳动力相结合,提高产量,满足市场,从而获得最大限度的利润。植物采集者随着殖民扩张步伐散布到世界各地,将各类种子和植物送到“Kew”。在他们的努力下,到19世纪末,在“Kew”的园地和标本库里已经积累了100多万种植物,和世界上其他任何机构相比,“Kew”能识别更多的植物,了解它们的习性。“Kew”监管着设在香港、塔斯玛尼亚、那塔尔、加尔各答和新加坡等地的分支机构。福斯特引用一位生态学者罗西尔·布罗克维(Lucille Brockway)的话,对生态殖民主义做了这样的评价:“在英国,

<sup>①</sup> Foster, J. B., *The Vulnerable Planet*, Monthly Reviewer Press 1994, p. 91.



Kew 以微小的成本在世界各地(主要是在南美)寻找经济作物……改良其品质,并将它们移植到亚洲,它以这种方式把种植园制度扩张到了亚洲。”<sup>①</sup>

通过橡胶种植园的发展,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植物园所扮演的帝国主义角色。世界上最著名的橡胶树叫巴西海威尔橡胶树(*Hevea Brasiliensis*),它是土生的亚马孙雨林植物。福斯特详细地描述了巴西橡胶树的大规模移植过程:1876年,英国农场主亨利·维克曼(Henry Wickham)从亚马孙地区偷运出 70 000 颗海威尔橡胶树种,这些树种辗转流入“Kew”,在那里经过育苗,它们的幼苗被送到大英帝国控制下的各个殖民地。当时,资本主义正处在上升时期,对橡胶的需求非常大,为橡胶业带来了丰厚的利润。所以,在以后 3 年的时间里,英帝国的大多数植物学机构都积极地行动起来,去参与这场生态殖民大行动,来保证橡胶树移植成功。今天,我们在东南亚所能看到大量的工业化的橡胶种植园,它们的源头可以追溯到 1877 年,当时有 22 棵橡胶树苗被从锡兰(现在的斯里兰卡)运到新加坡,今天,那里几乎全部的橡胶树都是从这 22 棵树苗发展而来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生态殖民活动的庞大规模。

福斯特和其他生态社会主义者、生态学家论述了这种大规模的生态殖民活动所带来的生态危害:在资本主义全球规模的商品交换中,一切能带来利润的自然要素都被商品化了,物种的移植和改变,使商业化农业的单一性代替了自然的多样性。“就像产业革命使劳动从属于资本一样,它也使自然界从属于资本。生产要素的分裂构成了资本积累的基础,对劳动的分裂也带来了自然的分裂。这一过程在 20 世纪以更大的规模展开,其最终结果是‘基因流失’:生物多样性的丧失。随着单一化农业扩展,不但没有价值的植物品种会消失,重要作物及其多样性(陆生植物成亿万年进化的结果)也会丧失。”事实上,今天,人类越来越依赖有限的几种作物的基因多样性,这使得它们在自然灾害面前越

<sup>①</sup> Lucille Brockway, *Science and Colonial Expansion*,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9, p. 190.



来越脆弱,基因单一性很容易造成某些疾病大面积蔓延。1970年,美国南部的玉米大枯叶病使美国的玉米收成下降了15%—20%。<sup>①</sup>

通过对早期生态殖民主义的论述,福斯特认为:当代生态帝国主义是早期生态殖民主义的升级版。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以下三个原因:

第一,和早期生态殖民主义相比,生态帝国主义的掠夺更加“合法化”、“制度化”。如果说,早期的生态殖民主义还带着某些原始特征,还需要使用武力和偷盗手段,那么,在当代生态帝国主义阶段,同样的生态掠夺却完全被合法化、制度化了,从市场和制度层面看,这种生态掠夺不存在任何瑕疵。

第二,和早期生态殖民主义相比,生态帝国主义的掠夺方式更加多样。生态殖民主义的掠夺方式主要是把边缘地区的生态资源转移到中心地区,是一种“单向度”的掠夺;但是,到了生态帝国主义阶段,掠夺方式也演化为“双向度”的了:生态帝国主义国家经常把有毒的垃圾或者肮脏的工业输出到发展中国家,被称为“污染输出”。

第三,和早期生态殖民主义相比,在生态帝国主义阶段,掠夺手段更加残忍,出现了生态战争。“生态战争”主要从两个方面来讲的:一是目的,二是手段。从战争的目的看,随着某些重要资源全球性的日益短缺,20世纪90年代以后,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了维护本国经济安全,控制中东的石油资源,在中东地区发动了一系列的战争,这些战争从目的上来说,被称为生态战争。从战争的手段看,二次世界大战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战争中使用了落叶剂、贫铀弹、高能量炸弹等武器,对生态系统、自然环境和地质构造等造成了严重破坏。所以,从战争的手段上来说,这些战争也被称为生态战争。

总的来说,从早期生态殖民主义到当代生态帝国主义,掠夺的合法性、掠夺方式、掠夺手段都在“进化”着。下面将分别讨论生态帝国主义

---

<sup>①</sup> Foster, J. B., *The Vulnerable Planet*, Monthly Reviewer Press 1994, pp. 92—3; Headrick, *Tentacles of Progress*, pp. 243—50; Cary Fowler and Pat Mooney, *Shattering*, Tucson: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1990.



的三种形式：资源掠夺、污染输出和生态战争。

## 二、生态帝国主义之资源掠夺

从早期生态殖民主义发展到当代生态帝国主义，中心地区对边缘地区的生态掠夺仍在继续。下面仍以植物学为例，来说明福斯特的主要观点。

福斯特对当代“绿色革命”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他认为：通过“绿色革命”，生态帝国主义破坏了全球的生态多样性，使一些基因资源只在发展中国家的偏远地区才能保留下来；而生态帝国主义又通过对这些基因资源的掠夺，培育出新的品种，来推动“绿色革命”。两者如此循环，其结果是资本的膨胀和生物多样性的丧失。

福斯特认为，在利润最大化的驱使下，早期的大规模的植物移植活动发展到当代，形成了 20 世纪农业的“绿色革命”。“绿色革命”的核心是培育和推广某些作物品种，去适应大规模、工业化的耕作方法，以这些东西来取代传统的耕作方法。它带来了两个结果：第一，它使第三世界国家在经济上更加依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加强了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第二，它造成了生物多样性的丧失，使全球的生态系统更加脆弱。

先说第一个结果，“绿色革命”加强了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福斯特认为，“绿色革命”的新种子都是在遥远的实验室里培养出来的，所以无法适应当地的病虫害，需要施用大量农药；这些种子确实高产，但高产的前提是需要大量的化肥和灌溉用水。对农民来说，这意味着生产成本的直线上升；但对于跨国公司来说，却为他们生产出来的化肥、农药、除草剂和农业机械打开了巨大的市场，带来了高额的利润。这样，发展中国家的农业逐渐被纳入了跨国公司的控制，加强了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

“绿色革命”的第二个结果是生物多样性的丧失。福斯特认为，传统的耕作方法有利于保持品种多样性。但是，推广单一的“高产”的种子排斥了本地品种，使生物多样性日益丧失。有史以来，人类培育了



3 000 多种植物作为食物,可是,经过“绿色革命”的“洗礼”,今天,只有15种作物为人类提供了85%—90%的能量。大米、玉米、小麦3种作物的产量占世界上全部谷物产量的2/3。<sup>①</sup>自从人类进入20世纪以来,世界上只剩下仅有的几个植物基因多样性中心,被称为自然“基因库”,它们绝大部分位于发展中国家闭塞的山区,例如墨西哥、秘鲁、埃塞俄比亚、土耳其和我国的西藏。在一些国家,随着西方工业化的农业生产方式的侵入,这里的“基因库”也面临被破坏的危险。

所以福斯特指出:“绿色革命总的结果就是造成第三世界国家在经济上更加依赖发达国家,生态系统更加脆弱。”<sup>②</sup>

在很多人都为“绿色革命”高唱赞歌的情况下,福斯特尖锐地指出“绿色革命”的弊端是很有前瞻性的。应该承认,福斯特指出的“绿色革命”的两个不良后果确实很有道理。但是,“绿色革命”显然有进步的一面,它大大地提高了农业产量,为解决世界粮食问题发挥了重大作用,福斯特对这些积极作用只字未提,这是很片面的,也反映了生态社会主义者反对科学技术的不良传统。

福斯特还说明了生态帝国主义对发展中国家的生态资源掠夺。

福斯特说,全球生态多样性差不多被生态帝国主义国家破坏殆尽了,在发展中国家偏远的地区还保存着相对比较丰富的生态资源,被称为自然“基因库”。这些“基因库”不仅维护着生态多样性,具有生态价值;而且还具有巨大的潜在经济价值。于是,近年来,第三世界国家丰富的生物基因又成为发达国家掠夺的对象。在强大的经济利益驱动下,发达国家的科学工作者经常深入到发展中国家偏远的“基因库”,去寻找新的胚质,来改良现有的商业化作物品种,增强它们的适应能力,从而赢得更大的市场。而且,在现行的市场经济和国际专利制度体系下,生态帝国主义国家反而日益垄断了稀有的基因市场。

随着“绿色革命”在第三世界国家的推广,国际生物垄断组织也获

---

<sup>①</sup> Foster, J. B., *The Vulnerable Planet*, Monthly Reviewer Press, New York 1994, p. 94.

<sup>②</sup> Foster, J. B., *The Vulnerable Planet*, Monthly Reviewer Press, New York 1994, p. 95.



得空前的大发展。福斯特说明:从 20 世纪 70 年代到 90 年代 20 年中,国际生物化学跨国公司,就吞并了大约 1 000 家种子子公司。通过入股和有条件的援助,国际生物垄断组织可以用微小的代价获得发展中国家珍贵的生态资源。例如,美国利用墨西哥的小麦胚质在 1984 年获得了 20 亿美元。对此,美国的付出是多少呢?美国国际发展署(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简称为 AID)每年向墨西哥的玉米小麦改良国际中心(the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Maize and Wheat Improvement, 简称为 CIMMYT)提供仅仅 600 万美元的研究经费,就获得墨西哥方面的所有基因资源的使用权。<sup>①</sup>

通过福斯特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在当代生态帝国主义阶段,市场规则、专利制度将帝国主义的生态掠夺包装得天衣无缝,但是无论怎样也改变不了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生态帝国主义国家日益垄断了稀有基因资源的市场,但这些基因资源却是主要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自然“基因库”。另外,福斯特的观点也说明,发展中国家现存的自然“基因库”的潜在经济价值是无法估量的。就拿水稻来说,在水稻杂交育种方面,我国在世界上具有领先的地位,以袁隆平院士为代表的中国科学家为解决中国和世界的粮食问题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还保留着相当数量的野生稻。我国的野生稻主要分布在怒江、金沙江、澜沧江三江并流地区,是一个自然“基因库”,新的杂交水稻基因主要来源于这些“基因库”。所以,对这些自然“基因库”应妥善保护。

### 三、生态帝国主义之污染输出

生态帝国主义不但掠夺边缘地区的生态资源,而且向这些地区输出污染。污染输出包括两种形式:一是输出高污染的企业,二是直接出口垃圾。2002 年,福斯特出版了《反资本主义的生态学》一书,对生态

<sup>①</sup> Foster, J. B., *The Vulnerable Planet*, Monthly Reviewer Press, New York 1994, p. 95.



帝国主义的污染输出进行了批判。

福斯特对污染输出的批判从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劳伦斯·撒莫尔(Lawrence Summer)的一封信说起。福斯特转引了这封信的内容。1991年12月12日,这位撒莫尔先生的一位同事正参加一个关于环境问题的讨论会,撒莫尔给他的同事写了一个备忘录:“不要让其他人知道,难道世界银行不应该鼓励把肮脏的企业(dirty industries)转移到不发达国家吗?我有三个理由。”这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列举了他的理由:第一,衡量污染成本的尺度取决于污染所带来的疾病和死亡的那些人的收入,按照这个观点,要把污染降到最低,就应该把它转移到工资水平最低的国家。第二,如非洲那些第三世界国家,人口稀少,污染程度很低,可以接收更多的污染企业。第三,对清洁环境的审美要求和健康要求总是和收入成正比的,一些发展中国家5岁以下儿童的死亡率达到200%,这些国家的人对环境的要求自然是很低的。<sup>①</sup>

接着,福斯特对撒莫尔向第三世界国家输出肮脏工业的主张展开了批判。福斯特认为,作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撒莫尔的作用是为世界资本积累创造条件,只是代表了世界资本体系核心集团的要求。“除了资本积累的单一目标之外,无论是大多数人口的利益,还是地球的生态命运,甚至是某些资本家个人的命运,都被排除在外了。最令人吃惊的是撒莫尔对穷人的这种公开的剥削的态度,最典型地代表了资产阶级的经济学。”<sup>②</sup>这种经济学把健康、教育、工作条件、环境、甚至人的生命用美元来衡量,这种做法在美国从里根时代就开始了。在美国,一个工人的生命价值大约是50—200万美元,比富有的阶级要低得多,所以那些肮脏的工业总是被安排在穷人的社区附近;而美国工人的工资又比第三世界国家工人的工资高几百倍,这样,向第三世界国家进行污染输出就是顺理成章的了。“按照这种思维,按照这种自由市场的逻辑,有毒污染的问题似乎就不是那样严重了。”但是,污染问题得到解决

<sup>①</sup> Foster, J. B., *Ecology against Capitalism*, Monthly Review Press, New York 2002, p. 61.

<sup>②</sup> Foster, J. B., *Ecology against Capitalism*, Monthly Review Press, New York 2002, p. 62.



了吗？没有！福斯特引用美国另一位生态社会主义者贝瑞·康芒纳 (Barry Commoner) 的话来讽刺输出污染的观点：“如果受害的是穷人，那么危害就变得微不足道了。”<sup>①</sup>

最后，福斯特还揭露了生态帝国主义国家向第三世界国家输出垃圾的事实。福斯特说：“发达国家每年都把几百万吨的垃圾运往发展中国家。1987 年，有毒的工业废物被从费城输出到圭亚那和海地。1988 年，4 000 吨来自意大利的具有化学污染性的印刷电路板被运往尼日利亚，从锈蚀的桶中泄漏出来，污染了那里的土壤和地下水。”这就是生态帝国主义的行径。<sup>②</sup>

福斯特等生态社会主义者揭露了生态帝国主义输出污染的恶行，对我国的经济的发展很有启发意义。应该承认，近年来，随着生态运动的兴起，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环境状况确实出现了改善，但是，这种改善是和发展中国家环境的恶化相联系的。生态帝国主义国家输出肮脏的工业不但给发展中国家的环境带来了巨大的破坏，而且还制造了重大的人身伤亡事件。著名的印度博帕尔灾难<sup>③</sup>就是一个明证。早在 1982 年，B. 布路斯等人在《美国的后工业化》一书中提出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着“产业空心化”趋势——发达国家日益把一些制造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这是事实；但是，我们要弄清楚：他们转移的都是些什么样的产业？我国对此应该采取怎样的对策？

我国在对外开放过程中引进了大量国外产业，当然，这对于中国经济发展存在着有利的一面；但同时，应该承认，某些地方、某些部门存在着盲目引进的现象，只要是外资，统统大开绿灯，对于其潜在的生态危

<sup>①</sup> Foster, J. B., *Ecology against Capitalism*, Monthly Review Press, New York 2002, pp. 62—3; Barry Commoner, *Making Peace with the Planet*, The New Press, New York 1992, pp. 64—6.

<sup>②</sup> Foster, J. B., *Ecology against Capitalism*, Monthly Review Press, New York 2002, p. 63.

<sup>③</sup> “美国联合碳化物国际公司”是美国在印度中央邦首府博帕尔开办的一家农药厂。1984 年冬天的一个凌晨，农药厂一个装有 45 吨剧毒液态异氰酸甲酯的储气罐发生了严重的泄漏，毒雾笼罩了睡梦中的城市。据报道，共有 3 600 多人死于这次事故，该地区近 100 万居民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害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引进国外企业必须是有选择的。近年来,根据中央的要求,我国一些地方相应的规章制度,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这些规章制度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实行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严格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任何新建项目必须获得环保部门污染物排放总量认可,方可办理相关审批手续;改扩建项目必须做到依靠清洁生产削减总量,依靠“以新带老”消化总量,方可准入。第二,设置相应的“绿色门槛”:优先发展清洁、节约的新型产业;新引进产业项目的能耗水耗以及污染物排放必须达到国际同行业先进标准;依法淘汰落后的工艺技术和生产能力,对于那些污染严重、危险性大的企业,我们应该采取禁止或限制措施。第三,建立工业园区,加强对排污企业的环境监管:将工业区和居民区分开,防止出现“厂中村”的现象;在工业园区内,根据循环经济的要求建立产业链;对于“散养”在园区之外的工业企业要加强管理,根据条件搬迁到园区内。

出口垃圾是发达国家转嫁环境污染的另一个手段。中国近年来也发现了进口“洋垃圾”事件,都是某些不法公司利用我国垃圾填埋制度的漏洞,以进口工业原料为名,试图蒙混通过海关,结果被海关查处。因此,有必要加强我国的垃圾管理力度,防止“洋垃圾”流入我国;同时,对于国内产生的垃圾,尤其对电子废物、医疗废物、危险废物等特种垃圾要加强管理。

#### 四、生态帝国主义之生态战争

本书以越南战争和第一次海湾战争来论述福斯特对帝国主义生态战争的批判。

##### (一) 越南战争

福斯特揭露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军在越南战场上进行的野蛮的生态战术。他指出,在越南战场上,落叶战术(defoliation)是美军战略的中心组成部分,它的目的有两个:一是破坏大面积的森林,减少丛林对北方士兵的掩护;二是毁坏大面积的庄稼,人为地制造难



民营,加强对农民的人身控制。福斯特说,1961年,落叶战术首次在战场上实验性地使用。其中,最主要的一种落叶剂叫“橙色剂”,它含有致命的有毒物质二氧(杂)芑,又称戴奥辛,是一种致癌、致畸毒素。当然,美国空军也很清楚,这是一种野蛮的化学战,将受到全人类的谴责,但是,约翰·F.肯尼迪总统为了赢得战争,还是决定实行落叶战术。随着落叶战术的实施,受害森林面积从1962年的6000公顷增加到1967年的170万公顷。在9年的时间里,20%的丛林和36%的红树林被喷洒了这种落叶剂。越南的粮食作物也遭到了大面积破坏,1964年,15039公顷的农作物被喷洒了落叶剂;单是1967年,就有148418公顷的农作物被毁。

跟常规战术相比,落叶战术的危害要持久得多。福斯特援引落叶剂战争权威人士的观点,说明它的破坏作用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大面积雨林被毁,至今仍一片荒芜,而且还发生周期性的大火;珍贵的红树林被彻底地、永久地破坏;大面积的植物衰败又带来了严重的水土流失;由于栖息地被破坏,大批陆生动物死亡;很多淡水鱼类受到毒害而灭绝,海洋中的近岸鱼类减少;随着鱼类减少,蚊子开始肆虐,疟疾大面积传播;落叶剂对人体造成了伤害,包括长期的神经中毒、肝炎、肝癌、难产,特别是自然流产和先天畸形。<sup>①</sup>

## (二) 第一次海湾战争

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冷战的结束,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为了建立一元化的世界格局,美国在对外战争中,不惜造成严重的生态后果。本文着重介绍福斯特对第一次海湾战争的看法。

首先,福斯特指出,美国发动海湾战争的真正目的就是为了控制那里的石油资源。美国利用苏联解体后的“世界新秩序”,取代了苏联的势力范围。在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之后,1991年,美国趁机介入科伊问题。福斯特说:“美国表面上打着保护人权自由的旗号,而实际上,主要

<sup>①</sup> Foster, J. B., *The Vulnerable Planet*, Monthly Reviewer Press, New York 1994, pp. 102—3; Arthur H. Westing ed., *Herbicides in War*, Taylor and Francis, Philadelphia 1984, p. 22.



目的是为了控制这一全球战略要地和争夺石油资源,维护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安全。”<sup>①</sup>

接着,福斯特揭露了贫铀弹(depleted uranium,简称DU)对环境的危害。福斯特说,美军地面部队发射了5000到6000轮的贫铀弹来穿透敌军的装甲。美英联军还发射了50000枚贫铀导弹。根据英国原子能管理局(The United Kingdom Atomic Energy Administration)的报告,40吨的放射性残余物以U238的形式留在了沙漠中。U238的放射性可长达几百万年,这里曾经孕育过悠久的古代文明,但是,实际上,今天这个地方已经永远不适合人类居住了。<sup>②</sup>福斯特的看法没有错,两河流域曾经孕育过悠久的古代文明,按照《圣经》的说法,传说中的伊甸园在这里,诺亚大洪水发生在这里,希伯来人的祖先亚伯拉罕诞生在这里,5000年前的苏美尔人也生活在这里,但是,今天,这里已经被美英军队的贫铀弹永远污染了。

最后,福斯特还说明了空袭造成的油井大火对环境的危害。福斯特说:“据绿色组织‘地球之友国际’(Friends of the Earth International)估计,由于美军的轰炸和伊军入侵,泄漏在波斯湾中的石油总计为680万桶,这个规模是空前的。”但是,福斯特认为,波斯湾的石油泄漏只是整个石油悲剧的一小部分。主要由联军的空袭引起的油井大火携带着巨大浓烟涌进大气层,全世界都为之瞩目,从地下狂喷而出的石油只燃烧了三分之一到一半。如果科威特石油公司的估算是正确的:已经证明的石油储量是将近1000亿桶,这次战争带来的损失是总储量的3%,那么,至少有15亿桶或者直接泄漏在科威特的土壤中,或者以雾滴的形式降落在科威特、沙特阿拉伯、伊朗、伊拉克和波斯湾。这是从油罐和海上输出端泄漏总量的130多倍。<sup>③</sup>实际上,油井大火造成的污染范

<sup>①</sup> Foster, J. B., *The Vulnerable Planet*, Monthly Reviewer Press, New York 1994, pp. 105—6.

<sup>②</sup> Foster, J. B., *The Vulnerable Planet*, Monthly Reviewer Press, New York 1994, pp. 102—6.

<sup>③</sup> Foster, J. B., *The Vulnerable Planet*, Monthly Reviewer Press, New York 1994, p. 106.



围比福斯特的估计还要大。中国科学院 1992 年的监测分析表明,珠峰大气、水中增加的化学元素正是石油燃烧的排放物。此外,在青藏高原采集到的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冰芯——海拔 7 100 米的达索普冰芯也记录了这些污染事件。南极考察站的科学家们也在南极的雪中化验出了海湾战争的污染物。

另外,福斯特还说,美军还轰炸了 18 个化学工厂、10 个生物工厂和 3 个核电站,有毒的尘埃污染了伊拉克的大部分国土。

福斯特的著作《脆弱的星球》出版于 1994 年,在该书中他对第一次海湾战争进行了批判。福斯特指出美国发动战争的目的是为了控制波斯湾的石油生产,这个观点非常正确:美国是一个“轮子上的国家”,随着全球石油资源日益紧张,美国为了维护它的资本主义经济车轮运转下去,不惜动用战争手段,不惜污染全球的环境。为了掠夺石油资源,2003 年,小布什(George W. Bush)发动了第二次海湾战争。这一次,美国的做法就更加露骨:美军至今仍没有在伊拉克找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发动战争的借口成了问题。小布什在“反恐”的背景下出台了“先发制人”战略,并通过第二次海湾战争,将该战略变为现实。美国对一个毫无还手能力的国家大打出手,“先发制人”的目的是为了掠夺石油资源。侵略和掠夺是资本的本性,这一点永远不会改变。

总的来说,20 世纪 90 年代,生态社会主义者提出了生态帝国主义理论,反映了当代资本主义在全球扩张的实际,在理论上也很有意义。生态帝国主义理论将中心与边缘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阶级关系贯串在一起,反映了资本主义在全球扩张的全貌。

将这三者串在一起的主线是资本剩余价值最大化的本性。资本的本性要求在无限扩大的再生产过程中不断获得剩余价值,由此产生了资本本性的三部曲:第一是分裂,资本要求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的分裂,从而形成现代社会两大阶级的对立;将世界分裂为中心和边缘地区,造成城市和农村,殖民地和宗主国的对立;将构成自然界整体的生态系统分裂为孤立的要素,按照资本的要求在市场上运行,造成人与自然的对立。第二是剥削,资本剥削劳动者,资本剥削殖民地,资本也剥削自然。



在分裂的基础上,在剩余价值的驱动之下,资源不断地从自然界流向人类社会;财富不断地从边缘地区流向中心地区;剩余价值不断地从无产阶级流向资产阶级。同时,作为一种循环的回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输出贫困,中心地区向边缘地区输出垃圾,人类向环境输出污染。第三是扩张,扩张是资本无限追求剩余价值的要求。资本主义发展对外贸易,建立全球统一的市场,使世界经济全球化。资本运动的全球化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需要,推动经济全球化是资本的历史“使命”。资本本性的三部曲有机结合起来,不断地循环扩张,在时间上,表现为现代化和后现代化;在空间上,表现为全球化。对这种秩序的任何打断都必然威胁到剩余价值的实现,威胁到资本的生存,必然遭到资本家激烈的反对,包括动用战争手段。

所以说,造成中心对边缘地区生态剥削的根源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帝国主义的中心与边缘地区的关系,只是资本全球秩序的一部分。

## 本章小结

本章详细论述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生态社会主义的两个新变化:对苏联生态教训的反思和对生态帝国主义的批判。它们反映了时代的新变化,是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生态社会主义者基本不曾涉及的。

20世纪90年代的生态社会主义揭露了苏联生态问题的事实,并分析了苏联生态问题的原因。社会主义制度在解决生态问题上具有优越性,这个论断并没有错;但是,制度的优越性只是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苏联之所以存在严重的生态问题,是由于工业化压倒了环保,苏联的“时代精神”过分强调对自然的改造和征服,苏联没有像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那样实行生态帝国主义政策,苏联长期的争霸和扩张政策也加剧了经济与环境之间的紧张状态。

生态社会主义者还从“增长的极限”的角度对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粗放型的增长模式进行了分析,涉及了农业、工矿业、外贸和社会







#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生态社会主义的主要新观点——变革与途径

本章将继续深入探讨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生态社会主义的新变化。可以肯定地说,生态危机在资本主义的框架内无法得到解决,要解决生态危机必须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那么,在资本主义国家如何实现社会制度的变革?生态社会主义者进行了大量的探索,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生态危机的根源与解决生态危机前途,实现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的动力、主体与道路,生态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生态社会主义对这三个方面也曾有过详细的论述;但是,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在这些问题上,生态社会主义发生了明显的理论转折,形成了很多新观点。

## 第一节 生态危机的根源与解决生态危机的前途

### 一、生态危机的根源是资本主义制度

一切生态危机背后的总根源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态问题不能得到最终解决。这一论断对于生态社会主义



者来说,已经不是什么新观点。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生态社会主义者已经对此形成了定论。但是,随着柏林墙的倒塌,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政权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接连倒下,冷战结束,很多环保主义的领袖人物纷纷倒向生态资本主义。在这种情况下,把生态危机的总根源归结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似乎失去了意义。于是,20 世纪 90 年代,关于生态危机根源的“老话题”又成为一个“新话题”。生态社会主义者与生态资本主义者在生态危机根源的问题上进行了比以前更加激烈的交锋,从而使生态社会主义关于生态危机根源的理论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获得了新的发展。

### (一) 关于生态危机根源的新争议

苏东剧变之后,很多生态运动人士放弃了“生态社会主义”的希望,转而谋求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来挽救生态危机,把资本主义改造成“生态资本主义”(eco-capitalism)。这样,关于生态危机根源的“非资本主义”的解释日益流行。“非资本主义”的归因论十分繁杂,本文按照著名的 IPAT 公式,将这些观点进行归纳。

IPAT 公式是 20 世纪 90 年代著名的罗马俱乐部的成员米都斯和西方社会学者和科学家经过反复讨论确定下来的,经过验证,可以做定量计算,非常有用。IPAT 公式认为,环境负荷跟人口、产品量和技术水平成正比,即:

$$I = P \times A \times T$$

其中,I 为环境负荷(Impact);P 为人口(Population);A 为产品量(Affluence),可以用人均 GDP 来表示;T 为技术水平(Technology),可以用每生产一个单位的 GDP 所产生的环境负荷来表示,通常是用万元 GDP 所产生的环境负荷来表示。

根据对该公式的不同解释,可以将对生态危机根源的分析归纳成人口学派、消费学派、技术学派。下面是对各派观点的简要说明:

人口学派(新马尔萨斯主义 neo-Malthusianism)把环境问题的主要原因归结为人口增长,重点强调人口(P)对环境的影响,尽管他们也承认产品量(A)和 T(技术水平)也起着作用。早在 1798 年,马尔萨斯



在他的《人口论》(*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中就阐明了人口按几何级数增长,食物等生活资料按算术级数增长的观点,这样,必然导致人口过剩和贫困的问题,进而造成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和生态破坏。今天,新马尔萨斯主义仍非常有影响。

消费学派主要强调产品量(A)对环境的影响。他们呼吁树立环保的消费观念,强调节约,反对“消费就是促进生产”的商业伦理;反对制造和使用“用毕即弃”的商品,对产品的要求是“宁要少一些,但要好一些”,主张产品必须是耐用的和易于修复的;主张实现经济零增长的“稳态经济”。

技术学派主要强调技术(T)对环境的影响。这种观点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很有影响,英籍法国经济学家舒马赫(E. F. Schumacher)在《小的是美好的》一书中研究了工业技术对环境的影响,提倡一种小规模、分散化的技术。在舒马赫主义的基础上,该学派提出了软技术和硬技术的概念:认为以化学、物理为基础的硬技术只是拘泥于自然规律的某一方面,而忽视了其他方面,不顾技术置身于其中的整个自然界,割裂了技术活动与自然生命活动的统一,干扰了自然过程的多种节律,破坏了生物圈整体的有机联系。他们主张通过对技术的改造来解决生态危机,充分吸收工业技术的合理因素,尽可能地消除其负面效应,提倡以生物科学为基础的软技术(环境友好型技术),与自然相融洽。这种观点当然有其合理性的方面,在当代十分流行。

还有些学者将这些因素综合起来考虑,建议:第三世界国家可以通过控制人口来保护环境;东欧可以通过提高技术水平保护环境;西方国家可以限制产品的消费量。总之,上述各种观点只是在人口、产品量、技术这些表层因素上徘徊,不能深入到表层原因的背后,发现生态危机的真正根源——资本主义制度本身。

生态社会主义者跟上述观点不同。尽管他们认为上述主张有一定的合理成分,并将这些合理的部分吸收到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中去,但在对待资本主义的态度方面,生态社会主义者与上述观点存在着根本区别。生态社会主义将矛头直指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而且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生态问题无法得到解决。美国生态社会主义者福斯特对上



述“非资本主义”的归因论进行了一一反驳,他的观点可以概括如下:

第一,福斯特对该公式的解释与上述观点不同。福斯特认为,尽管人口(P)因素对环境有影响,但富有的个人、阶级、民族的产品消费量显然比贫穷的个人、阶级、民族的产品消费量大得多。拿煤、石油、天然气的个人消费量来说,1987年,美国最富有的10%的人的个人消费量是20%的最贫穷人口的个人消费量的11倍,也就是说,温室气体的排放量也是这个比例。<sup>①</sup>

在对产品量(A)的分析上,福斯特认为消费学派限制消费的主张固然具有生态合理性,但它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发生了冲突。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逻辑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它必然要求以最大化的效率生产大量的产品,而这一切则要求需求最大化和消费最大化。如果不能实现消费最大化,剩余价值就无法实现,对产品量的限制显然违背了资本主义利润最大化的逻辑,在资本主义框架内是行不通的。

在对技术(T)因素的分析上,福斯特认为,在当前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提倡小规模、分散化的经济,甚至提倡经济零增长的稳态经济,根本就是开历史的倒车,是绝不可能实现的。而且,在当代,技术体系已经与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融合到一起,它已经适应了资本主义利润最大化的要求,并且已经成为一种社会控制手段。要实现从硬技术体系到软技术体系的转变,必然要与大公司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发生冲突,也要向国际关系旧秩序发起挑战,只有打破资本的逻辑,这些环境友好型技术才能被推广应用。

第二,事实证明,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环保运动,并没有有效地限制资本主义对环境的破坏,因为它没有触及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很多生态社会主义者认为,IPAT公式只说明了生态问题的直接原因,在这些直接原因背后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生态运动从20世纪70年代兴起以来,各种生态运动只能在表层问题上做文章,其各种解决生态危机的方案都没有触及“公司董事会的办公

<sup>①</sup> Foster, J. B., *The Vulnerable Planet*, Monthly Reviewer Press, New York 1994, p. 31.



室”，没有触及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所以成效并不显著。

## (二) 全面系统揭示资本主义制度与生态系统的矛盾

对资本主义的态度问题是生态社会主义与其他绿党流派相区别的标志。20世纪90年代以前，生态系统和资本主义制度之间到底存在着怎样的矛盾，生态社会主义者的答案还显得不够系统全面。20世纪90年代以后，面对“生态资本主义”甚嚣尘上的局面，生态社会主义者坚决地捍卫生态社会主义，对生态危机的根源进行了更加深入的分析，进一步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态系统之间的矛盾。在这方面进行比较全面论述的是美国生态社会主义者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

1994年，福斯特出版了《脆弱的星球》一书，在该书中，福斯特总结了其他生态社会主义者，如贝瑞·康芒纳(Barry Commoner)、阿里可谢·雅布罗可夫(Alexei Yablokov)、K. 威廉姆·凯普(K. William Kapp)、海拉(Haila)和莱文思(Levins)等人的观点，论述了资本规律和生态规律之间的尖锐矛盾：

首先，福斯特等人认为，生态系统遵循4个规律：(1)每个事物与其他任何事物都存在着联系，联系是复杂多样的；(2)每个事物都有自己的位置；(3)自然最合理；(4)每一件事都有代价，并对它们做了详细的说明：

“每个事物与其他任何事物都存在着联系，联系是复杂多样的”，是说生态系统非常复杂，是普遍联系的。这种复杂性和普遍联系与单个有机体不同，自然生态系统中的联系则更加复杂多样，其演化过程也比单个有机体更加多变。这种复杂性和普遍联系一方面产生了它的自我修复功能，但另一方面，也意味着生态系统是一个放大器，一个小地方的混乱可能在另一个地方产生巨大的、广泛的、长期潜在的影响。

“每个事物都有自己的位置”，重申了热力学第一定律：在自然界没有最终的废物，物质和能量是守恒的，一个生态过程中的废物可以在另一过程中重新循环。例如，原始森林中一棵枯萎的树会成为不计其数的其他物种的生活来源。同样，动物呼到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和排泄到土壤中的粪便会维持植物的生长，反过来又为动物提供了食物。

“自然最合理”，意味着“任何对自然界的重大改变都意味着对生态



系统的破坏”。在 50 亿年的进化过程中,生物获得了一系列的本能和应激能力,维持着生物圈的运行。目前,人类对这些自然界的奥秘还没有完全掌握,现代化学工业突然制造出成千上万的、自然界原来没有的新物质,他们会按照同样的有机化学规律进入生命过程,但他们常常对生命造成损害,导致基因突变、癌症以及很多其他形式的死亡和疾病。某些生物从自然界消失经常是一个标志,说明生态系统中的化学变化出了问题。

“每一件事都有代价”,这是对人类来说的,说明人类对自然的开发/剥削(exploit)都要付出生态代价。从严格的生态角度讲,人类算不上一个生产者,而更是一个消费者。热力学第二定律告诉我们:能量虽然是守恒的,人类不能“消灭”能量,但却可以“耗尽”能量。因为能量在经过一定的转化之后,就会成为不能做功的能量——“熵”。熵的积累是宇宙间的普遍规律。最终,整个地球和宇宙会充满熵,达到“热寂”状态。

其次,福斯特等人认为,资本也形成了一个系统,也像生态系统那样运行着,它是反生态的,它遵循 4 个反生态规律:其一,事物之间唯一的联系是金钱关系;其二,不管事物在什么位置,只要加入资本循环就行;其三,自我调节的市场最合理;其四,自然的恩赐是资产所有者免费的礼物。资本规律与生态规律是截然相反的:

“事物之间唯一的联系是金钱关系”说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一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切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都被简化为纯粹的金钱关系。资本的本性要求,将一切自然因素置于一个共同的尺度——交换价值之下。生产什么产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有市场。人们之所以要破坏生物多样性,种植单一的作物,就是因为在那个地方存在着市场需求。割裂自然过程中复杂多样的联系,并把它们简化为孤立的生产要素,这是资本的要求。

“不管事物在什么位置,只要加入资本循环就行”是说: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物质的流动不像自然生态系统那样是循环的——不会产生垃圾;资本主义的物质流动是线性的,从资源到垃圾。

“自我调节的市场最合理”说明:市场日益统治了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一切商品都被看成是赚取利润的手段,而不去顾及它是否会对自然或者人本身造成潜在伤害。



“自然的恩赐是对资产所有者免费的礼物”说明：在资本主义的经济核算中，生态成本被“外部化”了，企业造成的污染并不是由企业本身承担，而是由第三人和整个社会承担。

福斯特等人认为，这4个反生态规律说明，资本的本性就是反生态的，生态危机的根源就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资本的增长必须是以生态破坏为代价的。资本并不关怀自然的健康，它关注的只是最大限度地消耗原材料和能量，因为原材料和能量的消费量越大，就能产生更高的效率，获得更多的利润。于是，形成了大量的能源密集型产业和原材料密集型产业，它们将更快地耗尽不可再生资源，产生更多的垃圾。例如，自二战以后，塑料日益取代了皮革。生产同样产值的产品，塑料工业所使用的劳动力只是皮革业的四分之一，但它动用的资本是皮革业的10倍，消耗的能量是皮革业的30倍，当然会产生更多的环境污染，但是，为什么塑料工业会取代皮革业？当然是因为可以赚到更多的钱。

那么，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生态问题能不能得到最终解决？资本主义可以被改造成为“生态资本主义”吗？福斯特等人的答案是否定的。

福斯特认为，从技术角度看，虽然由于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可以设计出更加可持续发展的技术方案来解决环境问题，但这些技术的研制和实施与资本主义利润最大化的追求发生了冲突，会遇到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家的阻碍。在资本主义社会，使用什么样的技术的主要决定权在大公司，而他们做决定的依据是利润率。福斯特以汽车生产为例，来说明自己的观点：为什么底特律的汽车制造商们更青睐于生产大型的、高油耗的汽车？亨利·福特二世(Henry Ford II)曾这样明了地解释：“小型车赚小利润。”而曾任通用汽车公司总裁的约翰·Z.狄洛林(John Z. Delorean)则说得更明白：“20世纪60年代，我们本应计划转产小型、节能的轻型车来适应市场的需要，但通用汽车的管理层拒绝这样做，因为‘生产大车能赚更多钱’。”<sup>①</sup>福斯特等人清晰地论述

<sup>①</sup> Foster, J. B., *The Vulnerable Planet*, Monthly Reviewer Press, New York 1994, pp. 118—24; Commoner, Barry, *Making Peace with the Planet*, New Press, New York 1990, pp. 80—1.



了生态系统和资本主义两者之间具体是怎样对立的,这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的生态社会主义者所未曾做到的,从而确切地证明了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

那么,资本主义还会继续生存下去吗?福斯特的答案也是否定的,从生态角度来说,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必然灭亡。资本主义的内在本性要求生产呈指数增长,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要变成商品,商品再变成更多的资本,这个过程必须不断循环扩大下去。静止的资本主义就意味着投资机会已经被耗尽,利润就无法实现。没有不断的扩大再生产,资本主义就不能存在,对这一过程的任何打断都将导致经济危机。但是,由于维持资本主义存在所必须的经济增长破坏了它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那么资本主义就再也无法生存下去了。从福斯特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引出这样的结论:人类现在面临着两个选择,一是任由资本主义发展下去,将这个星球连同资本主义本身一起毁灭,二是人类行动起来,在资本主义毁灭这个星球之前消灭资本主义。

从上文可以看出,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在关于生态危机的根源的问题上,生态社会主义出现了新的变化:第一,在理论深度方面发生了明显变化。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生态社会主义者虽然论证了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但是,至于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态系统具体是怎样冲突的,则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才得到了全面的论证。第二,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出现了福斯特等人的集大成之作,福斯特总结了前人的理论成果,在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的全面系统性方面,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的生态社会主义无法相比的。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生态资本主义与生态社会主义之间的论争显然构成了这些新变化的推动力量。在批判资本主义的基础上,生态社会主义提出,解决生态危机的前途是社会主义社会。

## 二、解决生态危机的前途是先进的社会主义

在批判资本主义的问题上,在生态社会主义内部,生态社会主义者



的立场是一致的；解决生态危机的出路是社会主义，这一点也是一致的。但是，未来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是什么样子？在这个问题上，生态社会主义者之间则观点纷呈，即使同一个生态社会主义者的思想也会前后不一致。很难对他们关于未来生态社会主义的设想做出完整的描述。所以，本书首先介绍高兹的生态社会主义设想，使读者有一个基本的印象；然后，再讨论生态社会主义者之间的论争。

#### （一）关于生态社会主义设想

生态社会主义者对未来的生态社会主义的设想是多种多样的，无法一一说明。本文首先以法国生态社会主义者高兹的主要观点为例，来说明生态社会主义者对未来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的设想。

1991年，高兹出版了《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生态学》一书（英文版于1994年出版）。在该书中，高兹认为：资本主义奉行的是经济理性，而资本主义的经济理性与生态理性存在着根本的对立。生态理性旨在用一种最合理的方式来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尽可能提供“更少的”，但“更好的”、有更大使用价值和更耐用的产品，相应地，花更少量的劳动和资源就能生产出这些东西。与此相反，经济理性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利润最大化的追求，它要求最大化的生产、最大化的销售和最大化的消费。其结果是：“生产力在企业层面上最大限度的发展，导致了整个经济领域浪费的日益加剧。从生态的观点看是浪费和破坏资源的事情，用经济的眼光来衡量则是增长之源：企业间的竞争加速了创新；销售量和资本循环速度的提高加快了产品的更新换代。用生态学观点看起来是节俭的事情，用GNP的形式来衡量，则显然是降低了生产，减少了财富，在宏观经济层面上则表现为一种损失。”<sup>①</sup>高兹在这里所论述的两种理性的区别，实际上说明了生态保护和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矛盾，从这两种理性的根本对立可以看出，生态危机的根源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

因此，高兹对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的设想也是基于经济理性和生态

<sup>①</sup> Gorz, André, *Capitalism, Socialism, Ecology*, Verso, London and New York 1994, pp. 32—3.



理性的分析。1991 年,高兹在批评资本主义经济理性、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和总结德国社会民主党新纲领的基础上,提出了他的生态社会主义的设想,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更少的生产,更好的生活。”也就是说,生态社会主义社会就是要以生态理性取代经济理性:缩减资本主义利润最大化造成的生产和消费的最大化,做到“更少”;实现人的自我绽放,做到“更好”。

高兹认为,作为资本主义的替代物,社会主义的首要特征就是更少的生产和消费。但问题在于,在“更少的生产”的情况下,能否给人们带来“更好的生活”?高兹认为,这是有可能的,而这也正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之所在。

高兹说明了“更少的生产”和“更好的生活”之间的联系。当人们跳出经济理性的束缚,将会实现“更少的生产”。生产的目的是不再是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奢侈品的生产将终止,而主要的产品将是必需的、耐用的、易于修理的、没有污染的东西。“更少的生产”必然带来两大结果:其一,工作时间会缩短,人们将获得更多的自由时间,大大地扩展了他们自由,个人和公众将以今天难以想象方式实现“自我绽放”,并使他们的生存方式多样化;其二,人与人之间将不再是激烈竞争的金钱关系;同时,人与环境的关系也发生了改变,环境与人不再处于对立状态,而是和谐相处。高兹强调,这两大结果都是与人们真正幸福的生活相联系的,显然是“更好的生活”。

高兹对“更少的生产,更好的生活”做了具体的描述。企业的产品是经久耐用的,易于修复的,机器可以使用很长时间,服饰在较长时间内也不会过时;当人们都生活在一个集体公有的、能提供广泛服务的公社中,对于易损坏的、昂贵的和浪费能源的物品的需求将会消失;由中央计划的工业生产主要是为了满足居民的基本需要。为了避免大量的失业,减少劳动时间,实行 20 小时工作周。在理想的社会里,市场的作用将大大下降,每个人都感到满足,人们共聚在一起,每个人各自计划着自己的生活,人们不会被强迫去从事那种千篇一律、单调乏味的劳动。马克思所期望的理想社会生活方式不正是这样的吗?

高兹还说明了实现理想生态社会的行动主体。由于科学技术的进



步,人们享有越来越多的闲暇。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它表现为固定工作时间的缩短、日益增加的失业。这些失业、半失业者的人数会越来越多,他们将构成实现理想生态社会的主体。为了避免经济发展造成的失业问题,人们应该自发地组织合作社,增加自决的劳动。在合作社里,收入并不是按工作时间来计算的。这并不是因为从事私人的家务劳动也具有“社会效益”,这种关于劳动的看法是工业社会里形成的实用主义。现在,技术进步增加了人们的自由时间,这种实用主义正在失去它存在的基础和意义。“更少的生产,更好的生活”不但是解决失业问题的办法,使每个人都能够去享受这种自由时间带来的好处;而且也涉及存在意义的问题,它将改变实用主义的计算标准。因为实用主义的标准总是在问这样的问题:“这是可以满足什么目标?”但是,外在于我的目标对于我来说有什么用处?“当人们从谋生的劳动中解放出来,就获得了自由时间,只有在不是为了其他,而是为了自我绽放(own unfolding)的活动中才能获得意义:自我绽放的时间,才是生的时间(the time of life)。”<sup>①</sup>

总的来看,与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思想相比,高兹的思想表现出明显的继承性。1988年,他曾在《经济理性批判》一书中论述过“更少”与“更好”之间的内在联系。1991年,高兹出版《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生态学》,提出了“更少的生产,更好的生活”,以此作为他理想中的生态社会主义模式。1997年,高兹又出版了《收回工作》,对科技进步造成的失业现象做了进一步研究,来说明实现理想社会的主体。

从高兹对未来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的设想,可以看出,高兹的思想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新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高兹对科学技术的态度发生了变化。20世纪90年代以前,高兹明显具有后现代主义倾向,对科学技术持批判的态度,反对“工具理性”,高兹最初所认为的“经济理性”就是“会计核算”;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高兹开始把“经济理性”理解为资本主义利润最大化的追求。这一

<sup>①</sup> Gorz, André, *Capitalism, Socialism, Ecology*, Verso, London and New York 1994, pp. 12—3.



概念变化也说明了高兹反对的目标的变化,使高兹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反对“工具理性”的后现代主义。所以,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高兹把科学技术作为实现生态社会主义的推动力量,并且提出了“捍卫现代性”的主张。第二,高兹把自己的理论建立在一定的社会现实的基础上。高兹不但是一位生态社会主义者,同时也是当代存在主义哲学的代表人物。所以,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高兹着重从克服人的异化这个方面来构想未来的生态社会主义,这决定了高兹的设想必然具有乌托邦的性质。1991 年,高兹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新纲领的基础上,提出了他自己关于生态社会主义的设想。高兹根据欧洲政治的现实来充实自己的设想,这会有助于克服他的乌托邦式的空想,是一种比较好的趋势。但总的来说,高兹的生态社会主义方案的乌托邦色彩仍然十分浓重。另外,高兹的生态社会主义方案比 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也更加具体、精细,这当然也是一种发展。

## (二) 关于生态社会主义社会设想的论争

未来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是什么样子?不同的生态社会主义者对这个问题回答是不同的,甚至存在着尖锐的对立。造成这种对立的一个主要根源是立场的对立:不同的生态社会主义者在构想未来社会的时候,立场是不同的,即:是站在“生态中心主义”立场上,还是站在“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上?

“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就是以人类的利益作为出发点来保护自然,认为保护资源与环境本质上就是为了人类更好地生存,主张在不削弱人类利益的前提下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

“生态中心主义”的立场强调自然的内在价值,认为保护环境不仅是为了维护人类的经济利益,而是出于对自然内在价值的尊重,人类只是自然生态系统有机体的组成部分,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决定着人类的命运和生活质量。因此,人类必须按照生态系统的要求对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进行根本性的变革。

“人类中心主义”构成了浅生态学(shallow ecology)的思想基础;而“生态中心主义”是深生态学(deep ecology)的核心思想。1973 年,挪威哲学家阿伦·奈斯(Arne Naess)在《探索》杂志上发表了《浅层生



态运动和深层、长远的生态运动：一个概要》一文，对“浅生态学”和“深生态学”作了区别和分析，从而明确地提出了深生态学的概念，对生态社会主义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生态危机日益严重，很多生态运动人士都信奉“生态中心主义”。但是，“生态中心主义”本身存在着难以解决的理论和实践困难。20世纪90年代以后，生态社会主义从整体上表现出远离“生态中心主义”，重返“人类中心主义”的趋向。20世纪90年代以后，持“人类中心主义”立场的著名生态社会主义者有法国的高兹、英国的佩珀、美国的福斯特和德国的格伦德曼。当然，20世纪90年代以后，“生态中心主义”的势力仍非常强大，本文下面将要介绍的德国的萨卡尔就是“生态中心主义”的代表人物。

#### 1. 萨卡尔的“生态中心主义”

前面，本文介绍了以高兹为代表的“人类中心主义”关于未来社会的设想；下面来看以萨卡尔为代表的“生态中心主义”对未来社会的设想，萨卡尔本人将他关于未来生态社会主义的要点总结如下：

- 不但世界经济，而且整个人类社会都必须可持续。一切战争、冲突、混乱、腐败和犯罪，只能加速环境恶化和资源枯竭，而这都是我们今天经济活动的结果。
- 为了实现可持续，必须实行稳态经济，工业经济必须收缩。
- 这种收缩要求人们接受比今天更低的生活水平，但快乐水平不一定会降低。
- 如果根据承受能力的原则，使人们按一定比例分担损失，就像实行激进的所得税改革那样，生活水平的降低是可以被人们接受的。
- 平等是让人们接受经济收缩政策的最好的方法。在稳态经济时期和经济收缩时期，平等的必要性在于：(a)保障所有的人获得最低限度的产品和服务，(b)防止社会矛盾激化。
- 经济收缩必须有计划有秩序。无秩序的收缩将导致社会混乱和崩溃。计划应该是全面的严格的，包括价格控制，不是像市场社会主义所说的指导性计划。



● 在人口增长的国家,最重要和最迫切的任务是停止人口增长,为此,国家的干预必不可少。

● 道德的发展,道德经济和道德社会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这在任何形式的资本主义社会都是行不通的;在社会主义社会,尽管不能保证,但却是可能的,因为社会主义是一项道德建设的事业。<sup>①</sup>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萨卡尔的观点十分鲜明:为了维护整个世界的可持续性,人类必须牺牲一部分利益。萨卡尔坚决地反对生产力发展,减少社会物质财富生产,相应地,人类应该学会克制自己的需求,走一条达到“富裕”的禅宗之路。这显然是“生态中心主义”的立场。

“生态中心主义”曾经在绿党和生态运动中占据主流地位,即使在今天,“生态中心主义”的影响仍然存在。在要不要发展生产力、要不要限制人类需要的问题上,萨卡尔对高兹和佩珀所代表的“人类中心主义”立场进行了批判:“总的来说,在这个问题上,他们的答案是在绿色的新瓶子里装旧酒。”萨卡尔认为,高兹和佩珀的生态社会主义没有限制人的需要,反而强调了“更丰富和高度发展的需要”;人们可以享受太多的“奢侈品”和“日益增加的自由时间”,“简而言之,佩珀和高兹设定的这么高的‘底线’也正是世界上大多数人的愿望,但是,这些愿望都是不现实的。这只是现代乌托邦社会主义。我认为,这些空想,和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不沾边儿。尽管我们最尊敬的伟大导师马克思也有这样的想法,但是,我们今天比 19 世纪的马克思有更多的科学知识,今天的科学社会主义必须接受增长极限的现实,必须接受熵的规律,不然的话,我们所说的社会主义就不是科学的。异想天开的社会主义是没有用的”。<sup>②</sup>

说到这里,萨卡尔的观点已经十分清楚了:他所坚持的生态社会主义,在反对资本主义这一点上是没有错的,要求控制人口也是没有错

<sup>①</sup> Saral Sarkar, *Eco-Socialism or Eco-Socialism?*, Zed Books, London and New York 1999, p. 202.

<sup>②</sup> Saral Sarkar, *Eco-Socialism or Eco-Socialism?*, Zed Books, London and New York 1999, pp. 205—7.



的；反对资本主义造成的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以及由此引起的生态危机，也是对的。但是，萨卡尔走向了极端，完全站在“生态中心主义”的立场上，他反对生产力发展，割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坚持贫穷的社会主义，要求人们通过“禅宗之路”克制自己的需求，明显具有开历史倒车的倾向，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行不通的。

## 2. 佩珀的“人类中心主义”

英国生态社会主义者大卫·佩珀是为了捍卫科学社会主义而介入“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的论争的。

他把持“生态中心主义”的生态社会主义人士和主流绿党人士比喻为“一头绿色的公牛”，而将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比喻为“一块红布”，来说明两者之间的尖锐对立。而他正是要用科学社会主义来改造绿色运动，消除“红绿联盟”之间的分歧。

佩珀首先指出，科学社会主义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和人道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拒绝生物道德（bioethic）和自然的神秘化，并拒绝由生物道德和自然神秘化所产生的任何的反人道主义（anti-humanism）。佩珀批评了“生态中心主义”的反人道主义立场，他认为：“人类不是一种污染物，也不‘犯有’傲慢、贪婪、侵略、过分竞争，或者其他暴行。而且，即便有人犯下这样的暴行，也不是由于无法改变的先天原因或者堕落的原罪造成的，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则是更主要的原因。”佩珀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的辩证观点：人通过社会来认识自然，并通过社会来改造自然；同时，人的一切活动也是自然的一部分。<sup>①</sup>

针对“生态中心主义”反对人类控制自然的观点，佩珀认为“我们不应该在试图超越自然的限制和规律的意义上支配或者利用自然，但是，为了集体利益，我们应该集体地支配（即计划和控制）人与自然的关系”。但是，这种“控制”和资本主义对自然的掠夺和破坏不同，在社会主义社会，人类对自然的“控制”应该像一位技艺高超的演奏家弹奏他的乐器。如何实现这种技艺高超的“控制”？那就要实现生产资料共同

---

<sup>①</sup> Pepper, David, *Eco-Socialism: From Deep Ecology to Social Justice*, Routledge, London & NY 1993, pp. 232—3.



所有制,因为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生产居于中心地位。<sup>①</sup>佩珀的话说中了问题的关键,人类必须控制自然,但关键是要跳出资本主义利润最大化的束缚,理性地控制自然。当人类实现了生产资料共同所有制,就摆脱了资本主义利润最大化的束缚,人类就可以理性地控制和调节人与自然之间的互动关系。

针对“生态中心主义”所奉行的“增长的极限”的铁律,佩珀坚持了人与自然关系的辩证观点,认为这个铁律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存在对经济增长‘非历史的’(ahistorical)迫在眉睫的限制。但是,最终的自然限制是存在的,它就是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边界。”所谓“非历史的”观点,就是认为生态危机与社会历史的发展阶段无关,是永远存在的。佩珀反对这种“非历史的”观点,认为自然的限制是和人类的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对某一种生产方式的自然限制,并不是普遍地存在着,也不具有普遍的形式,不是对所有生产方式都起作用。改造生产方式意味着改变需求,因而对资源供应的需求也随之改变,那么一系列的生态难题也会相应地变化”<sup>②</sup>。佩珀在这里指的是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将改变资本主义需求最大化和生产最大化的状况,从而解决生态危机。他从生产关系入手,动态看待人与自然的互动关系,是很有见地的。

针对“生态中心主义”限制人类需求的观点,佩珀认为,人类的需要在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将变得日益复杂和丰富,而所有这些物质需要可以通过社会主义生产来满足。同时,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将改变人们的需求,人们的物质需要将是有限的,人们将重新看待财富,所有人都享有丰富物质生活的合理“底线”。佩珀的说法是有道理的,因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使使用价值从属于价值,即人们生产使用价值不是满足自己的具体需要,而是为了获得更多的(交换)价值;而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将使价值从属于使用价值,人们创造价值的劳动只是为了获得使用价值,满足自己具体的需要。因此,在社会主义社会,人们的需求

<sup>①②</sup> Pepper, David, *Eco-Socialism: From Deep Ecology to Social Justice*, Routledge, London & NY 1993, p. 233.



将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

针对“生态中心主义”反对发展生产力和工业化的开历史倒车的主张,佩珀认为,不应该去排斥大规模的工业生产。生态危机的根源并不在于工业生产本身,而是在于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制度使生产力成为控制人的手段,而且造成了严重的生态危机,因此,资本主义必然被社会主义取代。如果工业生产摆脱了异化,它们就成为解放的力量。在社会主义社会,技术将增强生产者控制自然的能力,去理性地调节人与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而不是去破坏它们。

总的来说,生态社会主义者在生态危机根源问题上的认识是一致的,都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生态危机的根源,在资本主义框架内生态危机无法根本解决,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生态危机才能真正得到解决。反对资本主义,坚持社会主义,这构成了生态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这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立场也是一致的。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的挫败,生态资本主义大行其道,对生态危机的根源做出了“非资本主义”的解释,形成了生态社会主义和生态资本主义之间的新争议。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在20世纪90年代的新发展,更加深化了生态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

在对未来生态社会主义的设想上,生态社会主义者之间则矛盾纷呈。“生态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构成了最主要的分歧。这一论争无疑也推动了生态社会主义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以后,出现了从“生态中心主义”重返“人类中心主义”的理论转折。这形成了20世纪90年代之后,生态社会主义的另一个新发展。

## 第二节 实现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的动力、主体与道路

在对未来生态社会主义进行了描绘之后,生态社会主义者对实现生态社会主义的动力、主体与道路做了进一步论述。



## 一、实现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的动力

在本章第一节中,生态社会主义者对未来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提出了种种设想。要实现这些设想,就要为它们找到实现的动力。

生态社会主义并非完全意义上的科学社会主义,在实现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的动力问题上,生态社会主义内部存在着“新无政府主义”倾向和“科学社会主义”倾向。所谓“新无政府主义”倾向,就是传统的无政府社会主义(如蒲鲁东、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的社会主义理论),融合了后现代主义和深生态学的内容。关于“新无政府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倾向,本章第三节将有比较详细的说明,此处不展开论述。

“新无政府主义”倾向质疑科学技术的作用,把道德看作是实现理想社会的动力;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科学社会主义”倾向把科学技术作为实现未来理想社会的动力。能否把科学技术和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区分开,就构成了“新无政府主义”倾向和“科学社会主义”倾向争论的焦点问题。

### (一)“科学社会主义”倾向的科技观

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受法兰克福学派和后现代主义的影响,生态社会主义把道德(精神世界的改造)看作是实现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的动力;对科学技术则抱着批判和怀疑的态度。他们关于科学技术的主流观点是“科学技术即意识形态”,是一种控制术,它和资本主义是融为一体、不可分割的。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生态社会主义者的观点发生了变化。他们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尽管科学技术确实带来了生态危机,但是生态危机不是科学技术本身造成的,而是科学技术背后的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是资本把科学技术作为工具来破坏生态。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对科学技术做出全面论述的是美国生态社会主义者福斯特。

福斯特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确实带来了自然的破坏,这种破坏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在资本主义社会,科学管理破坏了人的自然(human nature),



即劳动者的精神世界。已经成为资本要素的科学直接运用到劳动者身上,就成了对生产过程的科学管理;科学管理就是改变劳动力与生产过程的关系,就是从制度上把劳动力变成生产工具。福斯特把“泰罗制”看作是科学技术对人本身破坏的典型事例。1911年,弗里德里克·温思罗·泰罗(Frederick Winslow Taylor)发表了《科学管理原则》(*Principles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一书,提出了科学管理的原则。泰罗制不仅节约了成本,提高了效率,而且从生产领域彻底消除了工人的反抗,它把劳动者降低为简单的可以替换的零件,最终的结果是把人彻底地非人化,人的创造性和文化多样性被破坏。

第二,在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也破坏了外在的自然。福斯特认为,就像科学技术增强了资本对人的统治一样,在资本主义社会,外在自然也经历着同样的被科学技术割裂的过程。科技在资本的操纵下不断将自然要素从整体生态系统中剥离出来,变成资本的要素,按照经济规则,而不是生态规则,在市场上运行;科学技术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大规模的生产创造出大规模的消费,也大规模地产生出垃圾,将陆地、海洋和大气变成垃圾的排放场所。生态环境并不是资本所关心的问题,所以,在已经资本化的科学知识迅速发展的过程中,生态知识远远落后了。

但是,批判科学技术本身是不明智的,福斯特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被资本化了。福斯特对科学技术的资本化形式进行了详细的说明。他认为科学技术成为资本附属品的典型产物就是企业科学实验室,“在美国,企业科学实验室的兴起也是和垄断资本主义的兴起相联系的”。美国第一家致力于发明的实验室是1876年由托马斯·爱迪生创立的。随后,许多大企业都相继建立了自己的科研机构,或者兼并了原先独立的科学实验室。到1920年,企业实验室的数量是300家;1940年,企业科学实验室发展到2200家。<sup>①</sup>许多独立的科研机构、大学也与企业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大量的研究经费来自企业的资助,其

<sup>①</sup> Foster, J. Bellamy, *The Vulnerable Planet*, Monthly Reviewer Press, New York 1994, p. 110.



研究方向、技术开发也必然是以资本需要为导向的。

福斯特进而指出,科学一旦资本化,就成为推动资本发展的力量,每一次产业革命都既是一场科学技术的变革,同时又是资本的巨大发展。今天,垄断资本主义之所以发展到“全球垄断资本主义”的阶段,庞大的资本积累和资本集聚之所以可能,科学技术当然是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反过来,资本也推动了科学技术的发展。科技革命不仅仅是科学知识的积累,也是资本“将科学本身转化成资本”的需要。

所以,福斯特总结道:今天,科学技术已经被资本化了,如果只是对科学技术进行批判,显然是忽略了科技背后的资本主义制度。

福斯特以美国汽车工业发展史为例,剖析了工业和科学技术背后的资本主义利润最大化的动机。福斯特认为,在各种反生态技术中,汽车工业是重要的一项。无论从能耗、污染程度、事故率、舒适性方面看,在现代交通工具中,汽车不能算是最理想的。但是,今天,美国对汽车的依赖太大了,号称是“轮子上的国家”,汽车在各种交通方式中占了90%。福斯特认为,造成这种不合理现状的原因就是资本主义的利润最大化的动机:一是政府方面的原因,在几乎整个20世纪,美国政府交通政策的核心实际上就是在助长利润最大化的公司战略。联邦基金在公路投资方面非常慷慨,而相应地,政府对公共交通的津贴在不断缩减。第二个原因是大垄断企业故意取消原来的公共交通体系。从20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美国最大的汽车制造商通用汽车公司(General Motors),联合了标准石油公司(Standard Oil)和火石轮胎公司(Firestone Tire),有计划地收购全国的电车企业,将电车换成公共汽车。电车公司从1936年的40 000家减少到1955年的5 000家。就这样,大公司控制了公共汽车行业;同时,大公司在火车机车制造方面也具有垄断地位。但是,大公司却不去发展公共汽车和铁路交通,而是大规模地削减公共汽车和火车机车的生产,同时极力扩大私用汽车的生产,以私用汽车取代公共汽车和火车。当然,大公司从这样的战略中捞取了高额的利润。结果,在陆路交通方面,美国的人和货物几乎完全依赖小轿车和卡车。1988年,美国的人与汽车的比例是1.3:1,全世



界最低,当然给环境带来了严重的后果。<sup>①</sup>

20世纪90年代以后,像福斯特一样,其他生态社会主义者,如法国的高兹、英国的佩珀、德国的格伦德曼等人,都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科学技术即意识形态”的观点,把科学技术和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区分开。这种区分十分重要,它使生态社会主义避免走进死胡同,从而获得了广阔的理论发展空间。

## (二)“新无政府主义”倾向的科技观

当然,20世纪90年代以后,批判和怀疑科学技术的观点仍保持着相当大的影响,这构成了“新无政府主义”倾向科技观的主要内容。德国生态社会主义者萨卡尔代表了这种科技观。

萨卡尔批评高兹和佩珀等人对科学技术仍然抱有幻想。他说:“一个颇为流行的幻想就是: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和应用会使人类克服生态危机,挽救工业社会,使南方获得可持续发展。实际上,关于科技革命,有许多值得商榷的地方。”<sup>②</sup>

佩珀和高兹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科学技术将摆脱利润最大化的束缚,成为一种解放的力量。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将步入信息化时代,越来越多的环境友好型技术将应运而生,人类对资源和能源的消费将日益减少。

于是,萨卡尔明确地对佩珀和高兹进行了批判。他指出:“佩珀正陷入古老的幻想之中”,“显然,高兹迷信奇迹”。因为,萨卡尔并不认为信息技术将解决资源和环境问题:例如,一台个人电脑本身要消耗19吨原材料,而通过自动化生产这些材料同样消耗大量的资源;尽管个人电脑并不消耗太多的能量,但是,生产电脑的机器人却消耗大量的能量。<sup>③</sup>萨卡尔还认为,降低污染的技术手段本身也会产生污染。通过技

<sup>①</sup> Foster, J. Bellamy, *The Vulnerable Planet*, Monthly Reviewer Press, New York 1994, pp. 115—6.

<sup>②</sup> Saral Sarkar, *Eco-Socialism or Eco-Socialism?*, Zed Books, London and New York 1999, p. 3.

<sup>③</sup> Saral Sarkar, *Eco-Socialism or Eco-Socialism?*, Zed Books, London and New York 1999, pp. 197—8.



术改造,增加过滤装置,可以在某个生产环节降低污染,但是,生产过滤装置本身也增加污染并消耗资源。随着过滤装置的大量使用,污染也会按比例增加,结果是导致需要更多的过滤装置,而且过滤装置不可能吸收所有的污染。

既然萨卡尔认为科学技术对于实现理想社会是无能为力的,那么,萨卡尔所认为的动力是什么呢?萨卡尔的答案是人类的道德。唯有依靠道德对人类的生产和生活进行自我约束,减少需求,才能实现他所设想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萨卡尔明确地说:“我反对生态资本主义,不单是因为它不起作用,更主要地是因为资本主义所代表的价值:剥削、残酷竞争、拜金主义、贪婪。我赞成社会主义,主要是因为社会主义所代表的价值:平等、合作、团结。”<sup>①</sup>萨卡尔认为,要维持社会的可持续性,维护未来人类和其他生命的利益,靠资本主义的个人主义和实用主义价值观是不行的。因为未来的人类和其他生命根本不会向当代人争取他们的权利,所以,维护社会的可持续性只有依靠人类的道德。萨卡尔的观点在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曾占据生态运动的主流地位,现在仍有一定的影响,它反映了“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论争的一个重要话题:科学与道德的关系。

### (三) 高兹的“生态重建”思想

“生态重建”是高兹的主要科技思想,本书之所以把高兹关于科学技术的思想单独进行讨论,是因为高兹的思想比较复杂多变,需要具体的分析。

#### 1. 高兹对科学技术态度的变化

高兹关于科学技术的思想经历了两次变化,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所以不能根据他的科技观简单地把他划归“新无政府主义”倾向或者“科学社会主义”倾向;而且,尽管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高兹基本上对科学技术持肯定态度,可以把他看作是“科学社会主义”倾向,但是,在社会变革的问题上,高兹仍然否定工人阶级的主体地位,否认阶级冲

<sup>①</sup> Saral Sarkar, *Eco-Socialism or Eco-Socialism?*, Zed Books, London and New York 1999, p. 5.



突的社会变革道路,所以,在社会变革问题上,仍应把高兹划归“新无政府主义”倾向。下面来看高兹科技观三个阶段的变化:

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60年代,高兹对科学技术持肯定态度。高兹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成为世界知名的存在主义哲学家,他和法国的马勒一起宣扬“新工人阶级”理论。1967年,他出版了《劳工战略》一书,把由技术工人和科技人员构成的“新工人阶级”看成是资本主义社会中最革命的力量,代表了工人阶级的未来。

第二个阶段从20世纪70年代初到20世纪80年代末,高兹对科学技术完全持批判态度。1973年,高兹出版了《劳动分工:现代资本主义的劳动过程和阶级斗争》一书,对科学技术的态度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折。为了批判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他很自然地将对劳动分工的批判延伸为对科学技术的批判。他认为,科学技术已经和资本融为一体,无法分开,要批判资本主义,就应该对科学技术一起批判。高兹不同意把机器和对机器的资本主义使用严格区别开来。在他看来,只要资本主义的技术仍然存在,即使改变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那也丝毫改变不了工人受压抑的状况,因为,技术是工厂里一切事情的母体和根源,“只要‘物质母体’仍未改变,那么对于工厂的集体占有,就纯粹只是法律上的所有权的抽象转移,这种转移永远不能终止工人的受压抑和屈服的状况”。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技术中性论”是错误的:“直到今天,绝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仍然认为生产力,特别是科学技术,作为意识形态是中性的,他们把生产力的发展视为是天生积极的。”<sup>①</sup>高兹的这种观点显然是一种技术决定论;而且,对科技的批判会将人类抛进颠覆一切的虚无之中,批判本身也就成为虚无,这正是一个后现代主义的悖论。

第三个阶段是从20世纪80年代末至今,高兹在一定程度上又重新对科学技术持肯定态度。高兹思想的变化始于《经济理性批判》一书,该书的法文版出版于1988年,英文版出版于1989年。它反映了高

---

<sup>①</sup> Gorz, André, *The Division of Labour: The Labour Process and Class-Struggle in Modern Capitalism*, Harvester Press, Hassocks 1978, p. 9, p. 159.



兹的科学技术观的又一次变化：他从反对具体的科学技术转向了反对抽象的“经济理性”。而“经济理性”这一概念的含义在高兹那里有很大的模糊性：高兹一方面认为“经济理性开始于计算和核算”，是一种“工具理性”；另一方面，高兹认为“在经济理性的指导下，生产必然仅仅是被商品交换所支配，它必然被在一个自由的市场上进行交换这一原则所驱使，在市场上，被割裂的生产者面对着同样被割裂的购买者，他们在竞争中发现自身”<sup>①</sup>，在这里，“经济理性”显然又指利润最大化的市场交换原则，或者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而高兹主要是在后一种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这一概念的模糊性反映出高兹对科学技术的态度也开始模糊了，或者说又开始转折了。说明高兹对科学技术和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有了区分，尽管这种区分还不是十分明确。

到 1991 年，高兹出版了《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生态学》，这时候，高兹已经把科学技术作为实现理想社会的动力。他认为科学技术是可以被改造利用的，他反对的目标已经不是科学技术，而是科学技术背后的资本主义制度。所以，高兹提出了“生态重建”的思想。所谓“生态重建”就是为了实现生态保护的目标，对科学技术进行改造，从而对科学技术背后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起挑战，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增加“社会主义”的因素。可见，高兹的思路是通过技术的改造，来实现社会制度的改造，也就是说，高兹希望通过科学技术这个“旁门”来绕过与资本主义制度的直接冲突，这当然是不可取的。但是，可以肯定，高兹已经把科学技术的变革作为实现理想社会的动力。

把科学技术和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区分开，十分重要，这构成了高兹提出“生态重建”思想的前提。正因为此，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高兹的思想才出现了新发展，提出了“生态重建”(ecological restructuring)的主张，为实现他的生态社会主义设想找到了动力。下面，对高兹“生态重建”的思想进行介绍。

<sup>①</sup> Gorz, André, *Critique of Economic Reason*, Verso, London and New York 1989, pp. 109—11.



## 2. “生态重建”的主要内容

1989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柏林召开大会,通过了新的党纲,融入了生态保护和社会正义的内容。1991年,高兹对该纲领进行了研究,提出了他自己关于“生态重建”的主张。它可以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生态重建。它将涉及农业、工业、交通运输等各个部门,也涉及产品的设计、生产、消费和再循环等各个环节。其核心思想是,生产最大化和利润最大化的经济理性必须从属于社会—生态理性。

高兹认为,“生态重建”会造成经济全面收缩,使一部分劳动和资本过剩。如果相信生态理性可以为在“生态重建”中过剩的劳动和资本提供新的盈利机会,那就是幻想。对于很多率先实行生态保护的公司来说,在生态重建的转型过程中,暂时会获得新的经济增长机会,但是,从宏观的、长远的观点来看,生态重建不能带来新的经济增长。他强调指出:“不能认为,由于生态现代化,工业和经济将获得更好的发展条件;必须接受这样的观点——没有生态现代化,工业和经济将面临比衰退更糟的结果。生态重建政策不是为工业和经济的发展找到一条新途径,也不能认为生态重建的动机就是为工业和经济提供新的发展机会。必须承认,该政策和资本的利润最大化动机相矛盾,像过去那样追求最大化的利润是不可能的了。对生态重建政策的犹豫不决将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也必然会影响到整个经济。”<sup>①</sup>

高兹把生态重建和社会主义的目标联系起来。高兹实际上是希望从技术、工业入手,它向技术、工业背后的资本主义制度发起挑战,以技术变革为动力,进而实现生产关系的变革。高兹把“生态重建”看作是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社会主义”的因素。高兹强调说:“除了对资本积累的冲动进行限制,和通过自我约束减少消费,不存在其他的生态重建。”<sup>②</sup>这里,高兹所说的“减少消费”当然是减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sup>①</sup> Gorz, André, *Capitalism, Socialism, Ecology*, Verso, London and New York 1994, p. 33.

<sup>②</sup> Gorz, André, *Capitalism, Socialism, Ecology*, Verso, London and New York 1994, p. 34.



所造成的“异化消费”。对现代资本主义进行社会主义的重建,包含着对资本主义的超越和对社会主义的开拓。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阿格尔也强调技术改造与社会改造之间的“连锁性”,高兹和阿格尔的思路是一致的,都是避免与资本主义制度发生直接冲突,而是通过对科学技术的改造来“侵蚀”资本主义制度。显然,他们都过分地看重了技术的作用,通过“生态重建”来颠覆资本主义制度是行不通的。

高兹并不是一位“稳态经济论者”。高兹的“生态重建”并不完全反对经济增长,当人们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摆脱了资本主义利润最大化的限制,人们可以将经济发展置于社会—生态理性的控制之下,当然可以保持经济适当的发展。

总之,萨卡尔、高兹和佩珀对科学技术的不同态度反映了三种社会变革的道路。萨卡尔以道德去对抗资本主义,显然是行不通的,只能退回到前工业社会,是一条“后退”的道路。高兹把科学技术看成是实现理想社会的动力,试图通过对科学技术的改造来“侵蚀”资本主义制度,避免正面的阶级冲突,这实际上是一条“绕过”资本主义的社会变革道路。佩珀则强调,首先应该通过阶级斗争,来改造资本主义制度,是一条“革命”的道路。

佩珀、高兹与萨卡尔的分歧也反映了,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以佩珀、高兹为代表的一批生态社会主义者开始从后现代主义重返现代主义,而以萨卡尔为代表的生态社会主义者仍然坚持后现代主义的立场,所以,双方展开了一场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争论。总的来说,从后现代主义重返现代主义已经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

## 二、实现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的主体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无产阶级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主体。但是,今天,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已经发生了新变化。社会主义革命的主体在哪里?这当然也是生态社会主义者探索的重大课题。

生态社会主义并非完全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尽管其内部存在着“科



学社会主义”倾向,但也存在着“新无政府主义”倾向。“新无政府主义”倾向把“新社会运动”当作实现理想社会的行动主体,而“科学社会主义”倾向则坚持把工人阶级当作社会变革的主体。

### (一)“新无政府主义”倾向的社会变革主体

#### 1. “无产阶级的消亡”

高兹的科学技术观经历了两次变化,分成三个阶段,到20世纪90年代,在科技观上,可以把他划归“科学社会主义”倾向;但是,在社会变革问题上,则应该把高兹划归“新无政府主义”倾向。关于社会变革的主体,高兹坚持的是“无产阶级消亡”的观点。

1991年,高兹出版了《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生态学》(英文版出版于1994年)一书,他认为:“历史发展和技术变迁,即便不是造成无产者的消亡,也造成了无产阶级的消亡”,社会主义已经丧失了它的“历史主体”。<sup>①</sup>高兹的这个观点可以追溯到1980年,他在《告别工人阶级:对后工业社会主义的论述》(英文版出版于1982年)中,就已经提出了这种观点,十多年来,高兹关于工人阶级的看法一直没有改变。

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生态学》中,高兹通过列举大量的数字来论证他的观点。“简而言之,工作变了,‘工人’也变了”;具体地说,包括这样几个理由:第一,传统工人阶级的队伍大大缩小了。1961—1988年,工业无产阶级的人数在英国缩小了44%,在法国30%,瑞士24%,德国18%。1975—1986年,欧洲的工业提供的工作岗位减少了三分之一到一半。第二,后工业社会的服务业又创造了大量的后工业无产阶级。后工业社会的工作和传统社会主义所说的工作存在着巨大的差别,后工业社会的工作大都是兼职的、不稳定的,因此,后工业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传统工人阶级的世界观显然也是不同的。第三,随着人们工作时间的不断减少,工作的重要性大大降低了。1960年的年均工作时间是2150小时,而1990年的年均工作时间只有1650小时。工作已经没有以前那样重要,1990年,在德国的

---

<sup>①</sup> Gorz, André, *Capitalism, Socialism, Ecology*, Verso, London and New York 1994, preface vii.



一个问卷调查中,只有15%的人把他们的职业生涯看得比个人的生活更加重要。<sup>①</sup>

总的来说,高兹还是在论证他在1980年就提出的“告别工人阶级”的观点:工人阶级已经丧失了阶级意识,变成了机器的附属物,对他们所承担的历史使命浑然不觉。对享受着优裕物质生活的工人来说,阶级政治已经成为一个“疲倦的神话”,任何革命的理论对工人阶级来说都已经失去了吸引力。由于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已经宣告终结。阶级和阶级对立是工业时代的产物,在后工业时代,马克思的理论已经过时。

1991年,高兹的结论仍是这样的:“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已经死了;作为一种社会运动和有组织的政治力量,社会主义已经行将就木”,社会主义已经丧失了它的“历史主体”。<sup>②</sup>本书在前面已经交代过,高兹并不把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当作真正的社会主义,对于他自己相信的“真正的社会主义”,他仍然是坚持的。当然,高兹的这种观点受到了其他生态社会主义者和左派人士的批判。

这里,暂且不去批判高兹的观点是如何错误,因为本书后面介绍的“科学社会主义”倾向会针对高兹的错误观点进行批判。但是,高兹的理论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无产阶级新变化,对西方左派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很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赞同高兹的观点,认为工人阶级已经无法成为革命的主体。那么,新的革命主体在哪里呢?

## 2. “新无政府主义”倾向的社会变革主体

在生态社会主义内部,以高兹为代表的“新无政府主义”倾向认为,新的革命主体是“新社会运动”。1991年,高兹明确地说:“新社会运动将成为社会主义变革的承担者(bearer)。”同时,高兹希望,新社会运动要和那些失业、半失业、只有短期或兼职工作的“后工业无产阶级”相结合。<sup>③</sup>

<sup>①</sup> Gorz, André, *Capitalism, Socialism, Ecology*, Verso, London and New York 1994, preface vii—viii.

<sup>②</sup> Gorz, André, *Capitalism, Socialism, Ecology*, Verso, London and New York 1994, preface vii.

<sup>③</sup> Gorz, André, *Capitalism, Socialism, Ecology*, Verso, London and New York 1994, pp. 72—3.



高兹对这些“后工业无产阶级”十分看重,这些人要么找不到工作,要么不愿意工作,总之,他们不再用工作界定自己的身份,从文化现象上,高兹把他们称作“非工人的非阶级”(non-class of non-workers)。而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的闲暇将日益增加,这种人的数量也将不断上升。他们更有可能参加废除付薪劳动的行动,实现高兹所希望的“更少的生产,更好的生活”的理想生态社会主义社会。

从高兹的上述观点来看,高兹的社会变革主体是“新社会运动”,尽管高兹也强调了“新社会运动”和“后工业无产阶级”相结合,但是,这些“后工业无产阶级”和传统的工人阶级是不一样的,高兹甚至不把他们当成是工人或者阶级,所以称他们是“非工人的非阶级”(non-class of non-workers)。

“新社会运动”和传统的工人阶级相比,毕竟不是一回事。“新社会运动”异质于以往传统的工人运动和左翼运动,包括反战运动、反核运动、种族运动、宗教运动、女权运动、生态运动,还包括同性恋、嬉皮士等社会现象。它和传统无产阶级之间存在着重大的区别:

首先,阶级立场不同。尽管我们可以把“新社会运动”看作是西方一支新兴的左翼政治力量,但是,它的主体不是无产阶级,而主要是中产阶级。之所以把它当成左翼,是因为它也反对资本主义,而不是因为它和无产阶级有着共同的阶级立场。

其次,革命对象不同。无产阶级的目标是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但“新社会运动”则反对任何专政——包括无产阶级专政,它的革命对象不是具体的阶级,而是“二元对立”的权力结构本身,实际上,它是在捍卫早期资产阶级革命所追求的自由、平等、博爱的价值观。

第三,变革道路不同。无产阶级的革命道路是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同时也不放弃合法斗争。“新社会运动”的变革道路则是绕过现政权,而不是直接挑战它。“新社会运动”变革社会的方法都是非暴力的,包括游行抗议、示威侵占等等,这些方法和阶级斗争并不矛盾,但是,“新社会运动”强调这些方法在革命的中心地位,否定暴力革命。

第四,指导思想不同。“新社会运动”更多地相信唯心主义的权力



论和后现代主义的反科学精神；无产阶级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和现代主义的科学精神。“新社会运动”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结构主义的，经常把问题过分简单化了，不应该总是把多样化的冲突简单化为夺取生产资料的斗争。在丰裕的声色现象中，新社会运动更强调表面现象的独立价值，它的世界是破碎的、表面化的。

因此，在生态社会主义内部，以佩珀、福斯特为代表的“科学社会主义”倾向不同意高兹的观点。佩珀强调了“新社会运动”和传统工人阶级之间的差异，并批评高兹把工人运动边缘化的观点。佩珀批评高兹等人：和劳动者相比，“更是把‘新社会运动’作为革命的主体，他们呼吁新社会运动和工人运动建立联盟，从而危及社会主义的根基”<sup>①</sup>。

高兹和佩珀在社会主义革命主体上的分歧反映了，在生态社会主义内部，存在着“新无政府主义”倾向和“科学社会主义”倾向之间的矛盾。

## （二）“科学社会主义”倾向的社会变革主体

以佩珀、福斯特为代表的“科学社会主义”倾向坚持，当代社会变革的主体仍是无产阶级，并对“新无政府主义”倾向进行了反驳。

“科学社会主义”倾向首先站在现代主义的立场上，划清了和后现代主义的界限。“新无政府主义”倾向信奉后现代主义，宣扬阶级意识幻灭，对此，佩珀指出：马克思主义是现代主义的，宣扬阶级意识的幻灭只不过是后现代主义的呓语。对旧政治的需要并没有消失，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过时，再没有什么比对政治进程本身幻灭更危险的事情了。

“新无政府主义”倾向企图用个人主义代替集体主义，佩珀指出了这种观点对无产阶级革命意识的侵害。佩珀认为，对于无产阶级来说，个人主义是一种虚假的意识，它是资产阶级通过他们掌握的媒体故意强加给工人阶级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工人阶级的斗争。当个人主义广泛蔓延，取代了集体主义，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就取得了胜利，工人的阶级意识和工人阶级的利益就被破坏了。佩珀强调了无产阶级联合的重要性：如果没有工人的联合，仅仅依靠“新社会运动”为主要行

<sup>①</sup> Pepper, David, *Eco-Socialism: From Deep Ecology to Social Justice*, by Routledge, London & NY 1993, p. 135.



动者,在强大的资产阶级面前,他们将不堪一击。

针对“新无政府主义”倾向对无产阶级政党理论的指责,佩珀认为:没有“先锋队”的领导,无产阶级无法获得自己的阶级意识,而且希望越来越渺茫。当代西方社会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他引用英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主张来说明自己的观点:“坚持真正的‘先锋队主义’,并不一定会产生俄国斯大林式的专制主义结果。真正的‘民主集中制’将克服专制主义的产生,它并非是一个自相矛盾的词。”<sup>①</sup>

关于资产阶级,佩珀等人认为:阶级压迫并不是来自一种虚无的权力结构,而是来自资产阶级,“他们是具体的、可以分辨的个人、集团、阶级、利益群体,他们确实掌管着工作,左右着整个社会的技术、经济、政治机器。是他们本人,而不是他们的机器,决定着生与死、战争与和平”。如果说没有什么当权阶级,那么高兹本人还谈论什么推翻资产阶级呢?<sup>②</sup>

在对高兹批判的基础上,佩珀提出,生态社会主义的革命主体仍然是无产阶级。佩珀认为: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仍然存在;而且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无产阶级正扩展到第三世界国家,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政治仍然有效。

佩珀认为,在发达国家,我们仍然生活在一个阶级社会,工人阶级并没有消失。工薪无产阶级和他们的家庭仍然构成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主流。如果把无产阶级看成是没有生产资料的人,那么,自19世纪到20世纪70年代,无产阶级的队伍是增加了。19世纪,美国的自耕农和自主经营的手工业者占了总人口的80%,但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90%的人在为资本服务。<sup>③</sup>而且高兹也低估了他们的阶级意识,高兹之所以要“告别工人阶级”也是出于“阶级”的原因:“生态社会主义者的主要阶级成

---

<sup>①</sup> Pepper, David, *Eco-Socialism: From Deep Ecology to Social Justice*, by Routledge, London & NY 1993, p. 132.

<sup>②</sup> Pepper, David, *Eco-Socialism: From Deep Ecology to Social Justice*, by Routledge, London & NY 1993, p. 139; Frankel, B., *The Post Industrial Utopians*, Polity Press, Cambridge 1987, pp. 293—4.

<sup>③</sup> Pepper, David, *Eco-Socialism: From Deep Ecology to Social Justice*, by Routledge, London & NY 1993, p. 140; Heilbroner, R., *Marxism, For and Against*, Norton, London 1980, pp. 131—2.



分是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他们从政治上鄙视下层阶级,将无产阶级边缘化。但是,这些‘下层阶级’的确存在着……高兹断言,工人们‘进行不妥协的斗争,争取管理整个生产并管理整个社会’的日子不会到来了,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因为高兹低估了无产阶级的技能,没有认识到他们对“自治”而不是“他治”的渴望,以及他们无法获得“自治”时的苦闷。<sup>①</sup>

佩珀分析了“阶级分化国际化”的趋势,更加看重发展中国家的工人阶级的作用。佩珀认为,在第三世界国家,向资本主义制度的迈进带来了破坏性的后果,上千万的人口被抛进城市中的工厂,形成了大量的新无产阶级,他们的生活无论按照任何标准,都是贫困化的。从全球来看,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政治仍然有效。“中心地区”将原始的和“血腥的”积累方式转移到“边缘地区”,西方跨国公司把受到限制的高污染、高能耗的生产部门,或者剥削率很高的非人道的劳动密集型部门转移到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等发展中国家,在这里制造了相当于西方 19 世纪的社会状况,“不久,这些国家的工人阶级将以西方 19 世纪方式进行斗争”<sup>②</sup>。第三世界的无产阶级,将和西方的工人阶级一起,构成实现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的主体。

总的来看,在社会变革主体的问题上,生态社会主义内部存在着“新无政府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两种不同的倾向。“新无政府主义”倾向的社会变革主体是“新社会运动”,“科学社会主义”倾向的社会变革主义仍是无产阶级。而且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科学社会主义”倾向的力量正在日益壮大。

### 三、实现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的道路

在实现理想社会的道路问题上,生态社会主义内部也存在着“新无

<sup>①</sup> Pepper, David, *Eco-Socialism: From Deep Ecology to Social Justice*, by Routledge, London & NY 1993, p. 139.

<sup>②</sup> Pepper, David, *Eco-Socialism: From Deep Ecology to Social Justice*, by Routledge, London & NY 1993, p. 139; Peet, R., “The Social Origins of Environmental Determinism”,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75(3) 1991, p. 157.



政府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两种倾向的争议：“新无政府主义”倾向主张超越“二元对立”，强调人的自治；而“科学社会主义”倾向则坚持“二元对立”，强调阶级斗争。

#### （一）“新无政府主义”主张超越“二元对立”

虽然“新无政府主义”倾向的生态社会主义者认识到：一切生态危机背后的总根源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态问题不能得到最终解决，必须代之以生态社会主义社会。但是，他们变革社会的道路是改良主义的，不是对资本主义政权发起直接挑战，而是绕过和超越它。高兹的政治理论反映了这种“新无政府主义”倾向。

1991年，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生态学》中，高兹就明确地提出：历史发展和技术变迁，即便不是造成无产者的消亡，也造成了无产阶级的消亡，社会主义已经丧失了它的“历史主体”。由于信息技术革命，人类已经进入了后工业社会，原先大规模、高度集中的福特制生产逐渐减少，小规模的分散化生产日益增加，服务业占据主要地位。产业结构的变化带来了阶级结构的变化。传统的“二元对立”的阶级斗争理论已经过时了。

1997年，在《收回工作，超越工资社会》（英文版出版于1999年）中，高兹认为左派需要改变斗争策略。他说：“在西欧和北美，意识形态已经落后于技术、社会、文化的变化。”人们仍然确信，每个社会都被分裂成两大对立的阶级，没有人可以置身事外，这似乎是不证自明的，但是，这种观点应该受到质疑。高兹认为，左和右之间的对立正在失去意义，宣誓效忠于一方或另一方的“二元对立”的权力结构已经不再有效。左和右对立的真正阵线不在于这种“二元对立”的权力结构之内，而是在于两者的边缘和空白之处——在这里，新的社会运动高涨起来，对这种权力结构本身发起挑战。<sup>①</sup>高兹的观点并不新鲜，只不过是沿用了蒲鲁东、巴枯宁等人传统无政府社会主义的观点；只不过结合了一些当代社会变化的新内容，在观点上是“换汤不换药”而已。传统无政府主义

---

<sup>①</sup> André Gorz, *Reclaiming work: beyond the wage-based society*, Polity Press, Cambridge 1999, pp. 15—6.



的变革对象不是具体的阶级,而是产生着等级制和控制(hierarchy and domination)的二元对立的权力结构本身。无政府主义反对任何形式的专政——既反对资产阶级专政,也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他们认为,靠无产阶级取代资产阶级,革命无法取得成功,因为滋生压迫的二元结构仍然存在;只有在个人的自治层面进行观念的变革,替代旧的二元结构,才能绕过并超越旧的权力结构。

在实践上,高兹的社会变革道路是什么样的呢?高兹的答案是“新社会运动”的道路,并且对新社会运动作了这样的解释:“1967—1974年的社会运动绕开了政权和社会制度。这些运动并不是去获得权力,而是去谋求自己‘生活世界’的改变——去改变那些产生和构成压迫的条件。”那么,怎样改变自己的“生活世界”呢?高兹的主张是:跳出生产、抽象劳动和大量消费的逻辑;跳出标准化、资格限定和千篇一律的社会规范;强调主体自身的特别需要。<sup>①</sup>可见,以高兹为代表的“新无政府主义”倾向的主要斗争场所不是现实的世界,而是思想观念。它以个人主义为出发点,强调观念革命,通过观念的革命来瓦解资本主义制度,从而避免与资本主义制度的正面冲突,来超越任何阶级专政。

## (二)“科学社会主义”倾向强调“二元对立”

“科学社会主义”倾向反对改良主义的社会变革道路,强调“二元对立”的阶级斗争。在这方面,进行全面论述的是英国生态社会主义者大卫·佩珀。

1993年,佩珀出版了《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一书。针对高兹等人“绕过”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变革道路,佩珀认为:“实现共产主义的道路可能是各种各样的。但是,它们的共同之处在于必须去反对资本主义,而不是绕过资本主义。”<sup>②</sup>因为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再生产着二元对立,必然引起激进的社会变革和冲突,阶级和阶级之间,中心和边缘之间,人和自然之间,都会爆发冲突。而最主要

<sup>①</sup> André Gorz, *Capitalism, socialism, ecology*, Verso, London and New York 1994, p. 10.

<sup>②</sup> Pepper, David, *Eco-Socialism: From Deep Ecology to Social Justice*, by Routledge, London & NY 1993, p. 234.



的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阶级之间的冲突,它将实现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所以,佩珀强调指出:“那些试图变革社会的人必须面对这样的事实:那些拥有权力而又不想放弃权力的人,和想夺取权力的人,他们之间的冲突是在所难免的。”<sup>①</sup>佩珀在社会变革的道路问题上强调阶级斗争,显然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观点。

针对高兹“无产阶级消亡”的论调,佩珀强调说:“劳工运动是变革社会的主要力量,因此,应该重新发现劳工运动在社会变革中的潜在力量。”<sup>②</sup>在本节论述社会变革的主体的时候,已经介绍过佩珀的这个观点,不再赘述。

针对高兹等人反对任何阶级专政和强调意识形态革命的主张,佩珀强调了无产阶级专政,“要掌握国家政权并把它从资本主义的控制之下解放出来,使它为所有人服务”。并说明了意识形态革命的作用是有限的,“试图通过教育和模范生活方式来实现民众意识形态的革命,并夺取政权,这种方法的作用是有限的”<sup>③</sup>。显然,佩珀并不否定意识形态的作用,但是不能把观念革命当作主要的社会变革形式。为了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佩珀还强调了无产阶级政党的作用。

那么,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是否现在就要通过阶级斗争来实现社会变革?在佩珀看来,还不到时候。佩珀认为:直到大多数人确实希望,并着手创造和拥护它的时候,生态社会主义社会才会到来。很可能,而且令人遗憾的是,实现生态社会主义最大的导火线将是资本主义在如下方面的失败:其一,资本主义甚至未能为少数资产阶级生产出它所许诺的“商品”;其二,资本主义也不能创造出相应的物质条件和非物质条件,来化解大多数人的不满。显然,在佩珀看来,马上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现社会变革,希望还很渺茫。但是,佩珀认为,现在,反对资本主义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和行动的发展壮大,将有助于对资本主义的变革,并且减少将来反对资本主义政权的伤亡。而且,随着第三世界

---

<sup>①</sup> Pepper, David, *Eco-Socialism: From Deep Ecology to Social Justice*, Routledge, London & NY 1993, p. 19.

<sup>②③</sup> Pepper, David, *Eco-Socialism: From Deep Ecology to Social Justice*, Routledge, London & NY 1993, p. 234.



国家工人阶级队伍的壮大和生态帝国主义的扩张,从全球视角来看,潜藏的阶级冲突仍是一种强大的社会变革的潜在力量,而阶级分析也依然重要。

看来,可以把佩珀关于阶级斗争状况的观点总结为两条:其一,在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尽管潜在的冲突和对立仍然存在,但社会变革的道路还很漫长;其二,从全球来看,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张,阶级分化呈现出国际化的趋势,二元对立不但没有消失,而且在加剧。佩珀的观点基本上正确反映了当代世界阶级斗争的状况。

### 第三节 生态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

生态社会主义是西方形形色色社会主义的组成部分。总的来说,生态社会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对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反叛。历史事实也说明了这一点:生态社会主义的创始人巴罗和沙夫,都是从社会主义阵营叛逃到西方的;很多代表人物曾经和共产党有过密切的联系,后来因为历史原因,又相继疏远共产党。所以,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生态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主要不是来自科学社会主义,而是来自“非正统”的欧洲共产党、社会民主党、独立左派和托派。在生态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中,最具影响的是“新无政府社会主义”。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随着大量的共产党和其他左派人士加入生态运动,科学社会主义在生态社会主义指导思想中的地位和影响日益扩大。因此,在生态社会主义中,“新无政府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两个倾向之间的论争日益激烈,分歧也日益明显。

#### 一、“新无政府主义”倾向与“科学社会主义”倾向

##### (一) “新无政府主义”倾向

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在生态社会主义运动中,很多生态社会主义者并不把科学社会主义当作他们的指导思想,他们信奉的是“新无政府



主义”社会主义。所谓“新无政府主义”生态社会主义,就是传统的无政府社会主义(如施蒂纳、蒲鲁东、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等人的无政府社会主义),融合了后现代主义和深生态学的内容。

下面简要介绍传统无政府社会主义、后现代主义和深生态学在理论上的融合过程。

### 1. 传统的无政府社会主义

传统的无政府主义强调人性论,把“人性”作为衡量一切社会是否公平的唯一尺度。

巴枯宁认为,全部历史就是人类由动物性状态向人性状态的演变。所谓人性状态,则只有在个人获得“最充分的自由”,即“不受任何限制”的时候,才能实现。巴枯宁把自由看作是人性的基本条件,认为自由和权力是两个截然对立的观念。巴枯宁的核心思想就是反对一切权力,所以他反对国家,反对一切阶级专政,包括无产阶级专政。克鲁泡特金把互助看作是人类的本能。他认为达尔文关于“生存竞争”、“优胜劣败”的进化论观点是错误的;相反,在生物界,特别是人,除了生存竞争之外,还有互相扶助的一面。生物不是单个的生存的,而是成群的共同生存的,所以不能就单个生物来决定哪个强、哪个弱,只能说了哪一种生物强,哪一种生物弱。克鲁泡特金认为,凡是一种生物,各个生物之间完全实行互助的就强,不完全实行互助的就弱。生物群之间进行生存竞争,结果,生存下来的便是善于互助的生物。所以,至今生存着的生物,互助的本能一定是很强的。当然人类也不例外,人类有很强的互助本能。一切财富都是互助的力量产生出来的。不仅现在活着的人互相享受着共同的劳动成果,就是过去的人的劳动成果,也是大家互助的结果。所以,财富应该归大家所共有,实行共产主义。但是,同时,克鲁泡特金宣称,他所实行的共产主义,是没有政府的共产主义。没有政府的社会才是最好的社会。克鲁泡特金也否认阶级斗争,反对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他把近代的共产主义运动分成两大派:一派是强权的共产主义运动,一派是无政府共产主义运动,这两派犹如水火不能相容。克鲁泡特金迷恋过去,把三四世纪之间的“农村公社”作为共产主义的先例。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传统无政府主义的理论基础是人性论。当代生态社会主义“提倡制度外的斗争,反对传统政治”,其实并没有什么新鲜之处,只不过是传统无政府主义的翻版。

## 2. 无政府社会主义和深生态学的融合

在“人性论”的基础上,“新无政府主义”倾向把传统的无政府主义和“深生态学”结合起来。无政府主义和“深生态学”之间的联系有如下几个方面:

在西方的语言中,“人性”和“自然”是同一的。例如,在英语中,nature 一词既表示“自然”,又表示“人性”;在德语中,natur 一词,也同样有这两个意思。只有在需要把“人性”和“自然”有所区分的时候,才会把“人性”称为“人文自然”(human nature)或者“内在自然”(internal nature),而把客观的自然界称为“外在自然”(external nature)。

经过法兰克福学派、莱易斯等人的阐释,人性和自然在理论上被统一起来。法兰克福学派对生态问题的关注,更多是对人文自然的关注。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在《启蒙的辩证法》和《理性之蚀》等著作中认为,人对人的统治以人对自然的统治为基础,而自然的解放以人的自由解放作为前提条件。生态社会主义者莱易斯在 20 世纪 70 年代详细地论述了两个自然统一的思想,认为对外在自然的统治和对内在自然(人本身)的统治是统一的;自然的解放本身就包含着人性的解放。

20 世纪 70 年代之后,挪威哲学家阿伦·奈斯(Arne Naess)创立了“深生态学”(deep ecology),把人性扩展到自然界。“深生态学”强调:任何生物都有其天然的“内在的价值”(intrinsic value),不应该完全以人类的尺度去衡量其他物种的价值,因此,任何生物都应该受到保护——并不是因为它们对人类有用,而是因为它们的内在于价值。<sup>①</sup>“深生态学”最核心的观点就是,主张跳出“人类中心主义”的窠臼,站在“生态中心主义”的立场上来尊重和保护自然。这实际上是将“人性”赋予自然界,然后又把它看成是自然本身具有的价值。到 20 世纪 80 年代,

<sup>①</sup> Naess, A., “The Shallow and The Deep, Long-Range Ecology Movement: A Summary”, *Inquiry*, 1973, 16: pp. 95—100.



美国地球物理学家詹姆斯·拉夫洛克(James Lovelock)把“深生态学”向前推进了一步,提出了“盖亚理论”(Gaia hypothesis):用古希腊神话中大地女神“盖亚”来代表自然的“内在价值”,这实际上是把自然的“内在价值”人格化了。“盖亚理论”描述了地球表面大气和海洋的物理和化学状况,提出:自生命出现以来,大气和海洋的状况就一直在积极地改变着,从而使整个环境更加适合生命本身,自然似乎具有自己的意志。这个观点和传统观点不同,在这里,“生命本身”是由整个大气圈、水圈、岩石圈、生物圈构成的“超级生命体”(living supper-organism),它具有自我调节功能,像人一样具有自己的意志。所有的生命按照盖亚的意志进化着,人类对自然的干预和破坏将受到盖亚的惩罚。现在,很多生态社会主义者都一定程度地接受盖亚理论,尊重自然的内在价值。

“深生态学”其实是人性论向自然界的扩展。是人把“人性”作为一种“内在的价值”赋予了自然界,并用“盖亚”女神将自然的“内在价值”人格化,在“人性”之上构造了一个更高级别的“盖亚的意志”。于是,人在自然面前就只能恭恭敬敬、垂手而立,彻底丧失了“人类中心主义”的优越感,因此“生态中心主义”就顺理成章了。看来,无政府主义和“深生态学”之间最密切的联系就是人性论,只不过这种人性论发生了一种“中心”地位转换,“中心”从人转到了自然。

“人性论”之所以能和“深生态学”相融合,还有一个原因是,“深生态学”反过来又佐证了“人性论”的无政府主义观点。自然生态系统是“多元的”、“无中心”的,这个特点和无政府主义颇有契合之处。所以,两者一拍即合,深生态学反过来也丰富了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把自然界生态系统“无中心”、“多元化”的特点套用到社会领域,形成了“多元主义”,用“多元主义”代表一种理想的社会状况,并以此来否定马克思主义“二元对立”的阶级理论。

### 3. 无政府社会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融合

再来谈后现代主义和无政府社会主义的融合。这两者之间的融合更为便利,因为后现代主义本身就是一种文化无政府主义。

后现代主义本身就是反对文化专制主义的产物。所谓“文化专



制”，就是工具理性的专制。自文艺复兴以来，“现代性计划”所确立的理性信仰包括两个方面：以科学技术为主要内容的工具理性，和以人的自由解放为核心的人文理性。但是，在现代社会，人文科学在自然科学的全面侵占下，步步退却，形成了“科学的专制”和“理性的放荡”局面，文化危机和信仰危机产生了。反对工具理性的霸权，重建人文理性和工具理性之间的关系，是后现代主义的主题。因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后现代主义常常对科学技术抱着怀疑甚至敌视态度。

为了重建人文理性与工具理性之间的关系，后现代主义采取了一种彻底的文化无政府主义策略，即通过对一切的“解构”来反对工具理性的霸权。“解构”是从语言开始的。对于“结构主义”来说，所有的词都镶嵌在一个无限延伸的概念的“结构”之中。这个概念的结构是以二元对立为基础的，即：当我们需要知道某个词的意义，在概念的结构中，只需要找出它周围词的概念，再找出这个词和它周围概念之间的差异就行了，其中最重要的是这个词的上位概念。比如说，如果想知道什么是“人”，那么，找出人的上位概念“动物”以及人和动物之间的差异就可以了，我们通常下定义的方法就是这样的。“解构主义”认为“结构主义”造成了一种尴尬的局面：我们始终无法知道“人”是什么，也无法知道“动物”是什么，只知道它们之间的差异。也就是说，我们并不知道“二元”（两个不同的概念）是什么，只知道“对立”的存在。而且，在这个概念的结构中，我们始终无法追踪到任何一个词的确定的意义，所有概念的意义都消散在这个无限延伸的概念结构的大网中。法国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利奥塔创造了“分延”（différance）一词来说明这种“意义消散”的状况：“分延”一方面表示两个概念之间的对立和区分；另一方面表示“延搁”、“耽误”意思——在概念的结构中，意义永远被拖延下去了。接着，利奥塔把语言意义的消散推广到一切学科意义的消散，他认为：

科学真理只不过是多种话语中的一种“话语”而已，与人文科学的“话语”一样，只不过是一种约定俗成的符号，是一种人们进行交流的游戏规则，不再是什么“绝对真理”。不是我在说话，而是话在说我——因为“我”必须遵守语言的游戏规则。

如果要把科学重新加以合法化，那就意味着应该尊重各种话语之



间的差异,按照不同的游戏制定出不同的规则。各种话语游戏之间是平等的,无高下之分,也不互相侵吞。后现代主义就是要在承认全部知识的非合法状态后,重新确立各种知识的平等地位。总而言之,后现代的特色不是求同而是求异,所以根本不需要什么共识,后现代主义者把这看成是真正的文化民主。由此可见,把后现代主义称为一种文化无政府主义,真是恰如其分。

既然我们知道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文化无政府主义,那么,我们就很容易理解,后现代主义政治是一种无政府主义政治。后现代政治理论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一种“现代的”、普全主义的理论,因此,它要对马克思主义进行颠覆。后现代主义认为,在现代左翼运动中,那些宣称代表普遍的工人阶级利益的往往是官僚精英,社会话语权被这些精英人物以普遍性的名义所垄断,那些边缘群体的声音则可能因此受到压制。后现代政治的要求就是抗拒这种普全主义的垄断与压制。因此,后现代主义奉行的是“差异政治”,让那些受压抑的“他者”(the other)有发声的机会。后现代主义认为,由于信息技术革命,人类已经进入了后现代社会,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了。现代社会中大规模、高度集中的福特主义,已经让位于小规模、分散化的后福特主义,福特主义所创造的两大阶级对立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已经彻底失去了意义。革命的目的不是为了用一个阶级的专政去代替另一个阶级的专政,而是为了超越和绕过这种产生专政的二元结构。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对生态社会主义的“新无政府主义”倾向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新无政府主义”其实就是传统的无政府社会主义的翻版,只不过是融合了后现代主义和深生态学的内容。

## (二)“科学社会主义”倾向

由于马克思主义具有强大的科学性,所以20世纪90年代以前,尽管“新无政府主义”是生态社会主义指导思想的主流,但是,很多生态社会主义者在分析生态问题的时候,仍然自觉或不自觉地以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导。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共产党员和其他左派人士加入生态运动,科学社会主义在生态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中的地位和影响日益扩大,出现了以英国的佩珀、美国的福斯特、德国的格伦



德曼为代表的“科学社会主义”倾向。他们对“新无政府主义”提出了批判,试图把生态社会主义导向科学社会主义的轨道。他们针对“新无政府主义”倾向的人性论、深生态学和后现代主义展开了批判。

### 1. 对“人性论”的批判

关于“人性”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就曾经对蒲鲁东和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进行过针锋相对的斗争。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科学社会主义”倾向对“新无政府主义”倾向的“人性论”展开了批判。英国的佩珀是“科学社会主义”倾向的代表人物。

1993 年,佩珀在《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中认为,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人性到底是什么样子? 不管我们的答案是什么,都无法得到科学的证实。“我们永远都无法证明‘普遍’的人性是什么;同时,要把人先天的‘天性’和从外部环境中获得的后天‘教化’区分开,也是不可能的。”<sup>①</sup>因此,“人性是什么”是个不可讨论的问题,最明智的办法是对它存而不论。

佩珀认为,人类是历史的产物,人性是可以塑造的,而不是天生注定的。“人性是什么”并不是问题的关键,谈论人性是善还是恶,是竞争还是合作,实际上是不着边际的闲扯,真正重要的是如何去变革造成人性异化的社会物质条件,这才能够实现人性的解放。

佩珀认为,用人性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是没有说服力的。没有什么社会关系是绝对不变的,仅仅因为压迫是不道德的因此要反对压迫这种权力关系,这种观点不符合唯物史观。历史上任何一种压迫现象之所以能够出现,必然与特定的生产关系、阶级关系、上层建筑相联系。按照科学社会主义的观点,没有任何事情本身可以被看作是“不公正”的。“公正”与否要放到产生它的特定的社会生产方式的背景下来衡量:奴隶制相对于资本主义是“不公正”的,但是,相对原始社会则是“公正”的。谴责资本主义本身“不公正”是天真和无益的,因为资本主义在它自己的前提条件下是非常“公正”的。资本主义自己也承认,在“公

<sup>①</sup> Pepper, David, *Eco-Socialism: From Deep Ecology to Social Justice*, Routledge, London & NY 1993, p. 8.



正”的名义下,机会的平等并不导致结果的平等。

佩珀的观点是有道理的。其实,“人性”和“公正”本身就不是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的词汇。尽管可以从早期的马克思的著作中找到人道主义的立场,但是,成熟的马克思主义已经“放弃”(而不是“抛弃”,即存而不论之义)了人道主义的立场,转向了科学的立场,按照阿尔都塞的说法——马克思的思想发生了结构性的“断裂”。

## 2. 对“深生态学”的批判

关于“深生态学”,佩珀也进行了比较充分的论述。

佩珀对“深生态学”反人道主义立场进行了批评,并指出了生态危机的真正根源:“人类不是一种污染物,也不‘犯有’傲慢、贪婪、侵略、过分竞争,或者其他暴行。而且,即便有人犯下这样的暴行,这并不是由于无法改变的先天原因或者堕落的原罪造成的,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则是更主要的原因。”<sup>①</sup>佩珀的观点显然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它反对“生态中心主义”,同时也强调人与自然的互动关系。另外,本书认为,“深生态学”在理论上还存在着两个自相矛盾的地方:其一,人同样是自然的一部分,那么,按照“深生态学”的说法,人所做的一切也同样是自然合理的,人对自然的破坏本身就是“盖亚的意志”了。但是,为什么“深生态学”偏偏对人类怀着厌恶和偏见呢?从以人或者自然为中心的层面,无法找到生态危机的根源和出路,答案只有从人类的生产方式中找。其二,人只能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即使人嘴里说着“生态中心主义”,他仍然是站在人的立场上在说话。既然生态问题是人造成的,那么,人就应该承担责任,放弃“人类中心主义”岂不是放弃了人类本应承担的责任?

“深生态学”反对人类控制自然,相反,佩珀认为人应该控制自然,但是,这种“控制”和资本主义对自然的掠夺和破坏不同。在社会主义社会,人类对自然的“控制”应该像一位技艺高超的演奏家弹奏他的乐器。如何实现这种技艺高超的“控制”?那就要实现生产资料共同所有

---

<sup>①</sup> Pepper, David, *Eco-Socialism: From Deep Ecology to Social Justice*, Routledge, London & NY 1993, pp. 232—3.



制,因为人类通过劳动来调节和控制人与自然的互动关系。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将使人类摆脱利润最大化的束缚,从而能够理性地控制和调节人与自然的互动关系。

至于“深生态学”和无政府主义的“人性论”的结合,佩珀认为,无论是把“人性”扩大到自然界,创立“深生态学”,还是把“无中心”、“多元化”的生态原则套用到对社会问题的分析,都是没有说服力的。佩珀倒是另一个问题更感兴趣: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相信“人的天性”?佩珀的答案很有见地:因为“人的天性”有助于维护阶级统治。统治阶级常常利用“自然”作为强大的立法者为其统治辩护。当等级制度被认为是天然的,而且不可避免的,等级制度本身就变得可以接受了。资产阶级也经常利用“自然”立法者的权威来“证明”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例如,达尔文的进化论就常常被用来说明资本主义制度是多么“自然”: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带来了生物的进化和物种的繁荣;人类社会也同样要遵守物竞天择的原则,因此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则应该被视为是天然合理的,所以,不要去干涉“自由市场”的竞争。但是,佩珀认为,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在进行着循环论证:达尔文关于生物进化的“规律”首先来源于马尔萨斯和斯宾赛对人类社会的观察,用达尔文去证明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实际上等于是用斯宾赛主义的观点来说明斯宾赛主义。<sup>①</sup>因此,无论是用社会规律套用自然规律,还是用自然规律套用社会规律,都缺乏足够的依据。当“人性”被悬搁起来,那么,自然的“内在价值”就也被悬搁起来了。

### 3. 对后现代主义的批判

再来说后现代主义,佩珀对后现代主义持批评态度。

佩珀认为:“后现代主义只是把世界当作一种表象的东西相处,人只不过是在经历着世间越来越多的声色现象,而形形色色的消费品的使用价值只是在对个人和群体创造和宣扬着这种现象。所以,后现代主义颂扬的是表面性、样式、生命的昙花一现和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

<sup>①</sup> Pepper, David, *Eco-Socialism: From Deep Ecology to Social Justice*, Routledge, London & NY 1993, pp. 8—9.



跟反对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相比,它与晚期资本主义有着更多的共鸣。后现代主义的世界是破碎的、表面化的,缺乏秩序和方向。它的非理性消解了理性和进步——它认为根本不存在可以从中读出意义、文化和政治的深层结构。”<sup>①</sup>在批判后现代主义的基础上,佩珀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现代主义的,在当代世界,对现代政治的需要仍没有消失,马克思主义仍然有效。

佩珀对后现代主义的评价是准确的。后现代主义具有明显的反对科学、颠覆一切的特征。反对科学使它失去了发展的动力,颠覆一切使它也颠覆了自身,这是后现代主义的悖论。后现代主义在20世纪30年代孕育于现代主义的母体中,正式出现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其声势夺人并震慑思想界是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到20世纪90年代,后现代主义开始表现出狂躁以后的疲惫,声势大减。从后现代主义的发展阶段,可以看出它的发展趋势:最初,后现代主义以颠覆工具理性的暴怒为特征;进而,转变为狂躁之后的疲惫;最终,将谋求工具理性与人文理性的联合。后现代主义将在新的基础上回归现代主义。

在上述对无政府主义“人性论”、“深生态学”和后现代主义进行批判的基础上,佩珀说明了在生态运动中存在着两种不同倾向:“如果说生态运动中的红绿派致力于推动生态思想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那么,绿绿派则经常顽固地坚持无政府主义的原则。”<sup>②</sup>佩珀所说的“绿绿派”是指那些信奉“深生态学”和“生态中心主义”的生态运动人士。佩珀还说明了“新无政府主义”倾向的构成要素:在生态社会主义运动中,占主流地位的是“绿绿派”,他们的指导思想是“深生态学”、“无政府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混合体。佩珀还说:“生态主义被强烈地注

<sup>①</sup> Pepper, David, *Eco-Socialism: From Deep Ecology to Social Justice*, Routledge, London & NY 1993, p. 57; Scott, A., *Ideology and the New Social Movements*, Unwin Hyman, London 1990, p. 103.

<sup>②</sup> Pepper, David, *Eco-Socialism: From Deep Ecology to Social Justice*, Routledge, London & NY 1993, p. 152.



入了无政府主义的因素,尽管无政府主义是一种旧政治,但是它在很多方面和后现代主义是一致的。”<sup>①</sup>本书之所以提出“新无政府主义”倾向这个概念,也是根据佩珀的这些说法。

佩珀说明了他介入红绿之间论争的目的:为了捍卫科学社会主义,用科学社会主义来改造绿色运动,消除“红绿联盟”之间的分歧。他说:“对生态主义进行红色批判的目的在于把它推向一个更加现代主义的视角,包括:(1)坚持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2)对生态危机的根源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的和结构主义的)分析,(3)坚持冲突和集体主义的社会变革道路,(4)对未来生态社会进行社会主义的描述和构想。”<sup>②</sup>这表明,本书把佩珀作为“科学社会主义”倾向的代表人物是恰当的。

“科学社会主义”倾向在生态社会主义内部的崛起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它是生态社会主义的新变化,它有助于消除生态社会主义内部各种非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把生态运动引向健康的轨道。

本书重点介绍了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的 4 位生态社会主义者:英国的佩珀、美国的福斯特、法国的高兹和德国的萨卡尔。其中,佩珀和福斯特代表着生态社会主义中“科学社会主义”的倾向。萨卡尔和高兹则代表着生态社会主义中“新无政府主义”的倾向。当然高兹和萨卡尔两个人还有差别:萨卡尔更偏重于“深生态学”,坚持“生态中心主义”。而高兹,作为当代著名的存在主义哲学家,则更偏重于无政府主义的“人性论”;而且,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高兹还明显带有“后现代主义”思想——他批判科学技术,宣扬“告别工人阶级”和阶级意识的幻灭,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高兹从后现代主义转向现代主义,提出“捍卫现代性”的言论,而且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生态运动的解毒剂,说明他向“现代主义”有所接近。从整体上来看,在当代生态社会主义中,科学社会主义的影响在日益扩大。

<sup>①②</sup> Pepper, David, *Eco-Socialism: From Deep Ecology to Social Justice*, Routledge, London & NY 1993, p. 58.



## 二、马克思与生态学

上文说明了,在生态社会主义中,存在着“新无政府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两种倾向。而“科学社会主义”倾向的力量在日益增长,而且要运用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来改造生态社会主义,把它导向健康发展的轨道。这就提出了一个基本的理论问题:马克思到底有没有“生态原罪”(the original ecological sin)?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关系颇为重大。因为,如果像一些生态社会主义者说的那样,马克思犯有“生态原罪”,那就需要用生态思想来改造马克思主义,而不是用马克思主义来改造生态运动了。

弄清马克思到底有没有“生态原罪”对我国当前的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2007年,“生态文明”首次被写入党的十七大报告,为理论工作者提出了一个理论问题:如果像西方一些学者说的那样,马克思具有生态原罪,那么,当前的生态文明建设要不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或者说,马克思主义还能不能指导当前的生态文明建设?弄清马克思的生态思想,有助于使“生态文明”更好地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生态文明建设实践。

20世纪90年代以后,以美国生态社会主义者波凯特(Paul Burkett)和福斯特为代表的“科学社会主义”倾向,与认为马克思具有“生态原罪”的观点展开了论争,阐明了生态思想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重要地位。

### (一) 所谓马克思的“生态原罪”

在国外,很多生态主义者,甚至一些生态社会主义者,认为马克思具有“生态原罪”。他们的理由是:

马克思是一位“生产力主义者”。他把生产力高度发展,物质极大丰富作为实现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物质基础,忽视了自然对人类发展的限制;资本主义的生产是反生态的,而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设计只不过是更加扩张资本主义的生产力,从而完成人对自然的控制,这样,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都不可避免地造成人与



自然的对立。

认为马克思具有“生态原罪”的观点在国外颇为流行,而且由来已久,甚至一些生态社会主义者也一定程度上接受了这种观点。

1974 年,加拿大生态社会主义者本·阿格尔就认为马克思对生态危机没有什么认识,所以马克思主义已经失去了时效。他说:“我们的中心论点是,历史的变化已使原本马克思主义关于只属于工业资本主义生产领域的经济危机理论失去效用。今天,危机的趋势已转移到消费领域,即生态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sup>①</sup>

1999 年,德国生态社会主义者撒鲁尔·萨卡尔也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增长的极限还没有认识。”因此,“马克思主义不再是一个令人满意的范式。我认为,一个新的范式已经展现出来。我们应该承认这种新的范式并且认真研究它。新的、正在形成的范式,建立在增长极限的基础上,所以我把它叫做增长极限范式”<sup>②</sup>。萨卡尔提出,要用“增长极限”的范式来代替马克思主义的范式。

1997 年,美国生态社会主义者詹姆斯·奥康纳出版了《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一书,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存在着所谓的“理论空场”。“丰富的生态感受性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缺失,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阐述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sup>③</sup>因此,奥康纳要重构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奥康纳是《资本主义,自然,社会主义》杂志的创立者和主编,该杂志在世界生态社会主义圈子里非常有影响。2001 年,该杂志专门讨论了生态学和马克思的关系。参与讨论的一些学者认为,马克思生活在 19 世纪,后来生态学的发展和他扯不上关系。在马克思的时代,氟利昂还没有被发明出来,DDT 也不存在,马克思也从未在他的著作中使用过“生态”一词。一切用生态观点谈论马克思著作

<sup>①</sup> 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慎之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486 页。

<sup>②</sup> Saral Sarkar, *Eco-Socialism or Eco-Socialism?*, Zed Books, London and New York 1999, p. 18.

<sup>③</sup> [美]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唐正东、臧佩洪译,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6 页。



的做法,都是把马克思死后100多年的生态思想生搬硬套在马克思身上。因此,马克思与当代生态学的发展没有关联。尽管可以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找到关于环境问题的论述,但是,这些认识只是处于边缘的地位。<sup>①</sup>

笔者坚决反对认为马克思具有“生态原罪”的观点。不能说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就必然带来人与自然的对立。生态危机的总根源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要解决生态危机,最终要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消灭资本主义、实现共产主义的问题上,生态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是一致的。自然的限制当然是存在的,但是人在自然的限制面前并不是无所作为的。要保护生态环境,关键不是去限制生产力的发展,实行“稳态经济”;也不是放弃人对自然的控制,皈依“生态中心主义”;而是要实现社会主义制度,跳出资本主义利润最大化的束缚,理性地控制和调节人与自然的互动关系。在人与自然良性互动的前提下,人类可以实现生产力的可持续发展,实现物质极大丰富。所以,不能把共产主义和自然的限制对立起来。随着对马克思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生态社会主义者对认为马克思具有“生态原罪”的观点提出了批判。

1993年,英国生态社会主义者大卫·佩珀认为,自然的限制是和人类的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对某一种生产方式的自然限制,并不是普遍地存在着,也不具有普遍的形式,不是对所有生产方式都起作用。改造生产方式意味着改变需求,因而对资源供应的需求也随之改变,那么一系列的生态难题也会相应地变化”<sup>②</sup>。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将改变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最大化和消费最大化的状况,从而为生态危机的根本解决开辟了道路。

1999年,美国生态社会主义者保罗·波凯特在他的著作《马克思和自然》(*Marx and Nature*)中明确指出:本书的写作目的就是为了反

<sup>①</sup> M de Kadt and S Engel-Di Mauro, “Failed Promise”, *Capitalism, Nature, Socialism*, vol 12, no 2 (June 2001), pp. 52—5.

<sup>②</sup> Pepper, David, *Eco-Socialism: From Deep Ecology to Social Justice*, Routledge, London & NY 1993, p. 223.



驳马克思的“生态原罪”说，“我认为，马克思的方法具有一种内在的逻辑性、一致性和强大的分析力量，即使一些生态马克思主义者也没有认识到这一点”<sup>①</sup>。

在伦敦举行的马克思主义 2002 年大会上，针对 2001 年《资本主义，自然，社会主义》杂志的一些说法，美国生态社会主义者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做了长篇发言，驳斥了认为马克思具有“生态原罪”的观点。福斯特认为，不能说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我们就比马克思在生态问题上的认识高明得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有其他早期社会主义思想家生活的时代，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正在进行或者仍令他们记忆犹新，“所以，他们提出的关于资本主义，以及社会与自然的问题，比今天的人们，包括左派在内，更接近问题的本质”。尽管技术的变迁给生物圈带来的巨大威胁超出了他们的想象，但是，和通常的看法相反，福斯特认为，19 世纪和 20 世纪早期的社会主义者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在某些方面比今天大多数的绿色思想家们更加清晰。因为：技术并非环境问题的关键所在，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自然的矛盾才是问题的关键。<sup>②</sup>认为现在的人对生态问题的认识肯定比马克思他们高明，是没有道理的。

## （二）生态思想在《资本论》中的重要地位

马克思具有生态思想，这一点是肯定的。即使认为马克思有“生态原罪”的人也不得不承认，马克思的著作大量地涉及森林退化、荒漠化、气候变化、物种消失、动物贩卖、污染、工业垃圾、有毒物质扩散、再循环、煤田枯竭、传染病、人口过剩和物种进化等生态问题。现在要讨论的问题是：生态思想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是重要地位，还是次要地位？

2000 年，美国生态社会主义者福斯特出版了《马克思的生态学》（*Marx's Ecology*）一书，论述了生态思想在马克思的整个理论体系中

<sup>①</sup> Burkett, P., *Marx and Nature, A Green and Red Perspective*, Machmillan Press Ltd. 1999, preface vii.

<sup>②</sup> Foster, J. B., “Marx's Ecolog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在伦敦马克思主义 2002 年大会上的发言, <http://pubs.socialistreviewindex.org.uk/isj96/foster.htm>.



处于重要地位。福斯特主要考察了《资本论》中的生态思想。福斯特的思路是这样认为的:《资本论》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当然处于重要地位,是马克思“整个一生科学研究的成果”<sup>①</sup>;如果《资本论》中也贯串了生态思想,那么,就可以说,生态思想在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处于重要地位。本文把福特的论述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 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的过程中,深受生态思想的影响

2002年,福斯特在他的著作《马克思的生态学》里说:“19世纪60年代早期,当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的时候,他深深地受到了李比希的影响。”<sup>②</sup>2002年,福斯特在伦敦马克思主义大会上又说:“我对马克思极为精深的生态认识的了解最初来自对李比希和马克思关系的研究。”<sup>③</sup>

尤斯图斯·冯·李比希(Justus Von Liebig)是19世纪德国著名的农业化学家。1840年,他发表了他开创性的著作《化学在农业和生理学中的应用》,此书不断被再版,1862年,该书已经被再版了7次。在第七版的序言中,李比希说:英国的农业是一个“掠夺系统”,“它像一个吸血鬼挂在欧洲、乃至世界的乳房上”。当时,英国的资本主义农业采取工业化的耕作方法,不断地把营养物质从土地中拿走,结果,地越种越薄;另一方面,土地的营养物质在城市表现为污染。这反映了资本主义条件下,乡村和城市的对立。根据这些现象,李比希提出了理性农业的重要原则——“归还的规律”:从土地里拿走的矿物质还得归还给土地;农民“从他的田地里拿走多少,最终还得归还多少”。<sup>④</sup>其实,李比希所说的“理性农业”和“归还的规律”和我们现在提倡的“生态农业”和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411页。

② Foster, J. B., *Marx's Ecology: Materialism and Nature*, Monthly Review Press, New York 2000, p. 155.

③ Foster, J. B., “Marx's Ecolog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在伦敦马克思主义2002年大会上的发言, <http://pubs.socialistreviewindex.org.uk/isj96/foster.htm>。

④ Foster, J. B., “Marx's Ecolog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在伦敦马克思主义2002年大会上的发言, <http://pubs.socialistreviewindex.org.uk/isj96/foster.htm>; Erland Marold, “Everything Circulates: Agricultural Chemistry and Recycling Theories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Environment and History* [J] 8 (2002), 74.



“循环经济”是一致的。

19 世纪最严重的生态问题就是土壤退化,这也引起了马克思的关注。1866 年 2 月 13 日,马克思正在潜心写作《资本论》。这本“可诅咒的”书使马克思身心皆疲,“又躺倒了”。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写信给恩格斯,说明了《资本论》的进展情况,并且说:“德国的新农业化学,特别是李比希和申拜因,对这件事情比所有经济学家加起来还更重要”<sup>①</sup>。可以看出,在写作《资本论》的过程中,马克思对李比希极为关注。李比希所说的“归还的规律”构成了我们理解《资本论》中生态思想的重要背景。

## 2. 语言的障碍掩盖了马克思的生态思想

福斯特从《资本论》中“物质变换”一词的含义入手,来研究生态思想在《资本论》中的地位。

福斯特首先说明,在《资本论》中,“物质变换”有两重含义。“物质变换”的德语是 stoffweschel,在德语字典里,它只有一个意思,就是“新陈代谢”,像汉语一样,专门指一种自然生态现象:生物摄取食物,把它变成身体的一部分,同时把体内的废物排出体外,生物死后回归自然,新旧不断更替。它必须符合一个最基本的规律,就是李比希所说的“归还的规律”。这是 stoffweschel 的第一个意思。

stoffweschel 的第二个意思是马克思的发明。stoffweschel 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它由两个词构成,stoff 表示“物质”,wechsel 的意思是“变化”、“交换”,这样,合起来就是“物质变换”。但是,“物质变换”这个意思只是隐含在 stoffweschel 的构词法中,在马克思之前,从来没有人使用过这个意思,是马克思“第一次”用它来表示商品的交换过程,赋予了 stoffweschel 一个社会经济含义。福斯特说明,马克思自己也说过,他是在两种含义上使用 stoffweschel 这个词,而且这种想法贯串了整个马克思成熟时期的著作。从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时候算起,十几年后,1880 年,在马克思的最后一部经济学著作《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马克思说:“在说明生产的‘自然’过程时我也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1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181 页。



使用了这个名称,指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这是它的自然含义;马克思又说:“那里在分析 G—W—G[商品—货币—商品]时,第一次出现了物质变换,而以后形式变换的中断,也是作为物质变换的中断来说明的。”也就是说,用“物质变换”来表示商品的交换过程,这是马克思的发明,马克思也把它看成是自己的“专利”,所以,马克思批评瓦格纳说:瓦格纳所使用的“财物变换”这一概念,“是从我这里抄袭去的”。<sup>①</sup>

这样,在德语中,stoffweschel 一个词表示了两个意思,即:“新陈代谢”和“物质变换”。“新陈代谢”表示 stoffweschel 的自然生态含义;“物质变换”表示 stoffweschel 的社会经济含义。这两个概念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区别,在是否符合“归还的规律”的问题上,“新陈代谢”和“物质变换”是对立的。“新陈代谢”符合“归还的规律”,而商品的“物质变换”违背了归还的规律,是一种虚假的新陈代谢,因为资本家不断地把剩余价值从工人那里拿走。

但是,要把 stoffweschel 翻译成其他语言,就产生了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无论怎样也无法找到一个词表示两个含义,不同的语言中有些东西是无法翻译的。福斯特的说法是正确的。因为,我国在马恩著作翻译中,也遇到了这样的困难,只好把所有的 stoffweschel 都译成“物质变换”。本文认为,这样翻译的原因是由于“物质变换”的外延更大,可以盖住“新陈代谢”;但是,从内涵上来说,一部分生态内涵丢失了。在其他语言中的翻译情况也是如此。

语言的障碍造成了一些人对马克思的误解,美国著名的生态社会主义者奥康纳就认为:马克思不关心自然,在马克思主义中,存在着一个关于自然的“理论空场”。

### 3. 马克思奠定了当代生态社会主义的核心理论

福斯特认为,在 stoffweschel 两种含义的基础上,形成了两个循环圈。在自然生态含义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个生态循环圈;在社会经济含

<sup>①</sup> Foster, J. B., *Marx's Ecology: Materialism and Nature*, Monthly Review Press, New York 2000, pp. 157—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22页。



义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个商品循环圈。马克思通过精细的分析,把这两个圈套起来,自然生态之流和社会经济之流融为一体。马克思把这两个圈套起来的目的是想说明:生态循环圈出现了危机,原因应该从商品循环圈上找。商品循环圈哪里出了问题?因为它违反了归还的规律,因为剩余价值的存在。所以,要解决生态危机,必须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实行社会主义制度。这样,马克思就把解决生态问题的出路和社会主义的前途联系起来。这构成了当代生态社会主义的核心理论和开端。

福斯特还详细说明了,在《资本论》里,马克思怎样把生态问题和社会主义的前途联系起来。总结福斯特的观点,并参考马克思的著作,本书将马克思的论证概括为如下几条。需要说明的是,福斯特对马克思的引文都是源于英文版,来源也比较复杂,本文将福斯特对马克思的引文出处全部转换成中文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对于中国读者来说会比较方便。

(1) 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新陈代谢)永远是人类生存的必要自然条件。也就是说,它是不能出问题的,如果出现了问题,必须对它进行修复。

(2) 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过程中制造了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在乡村,人们不断地把产出物从土地上拿走,“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sup>①</sup>。在城市,土壤营养物质的消耗在城市表现为环境污染。“在利用这种排泄物方面,资本主义经济浪费很大;例如,在伦敦,450 万人的粪便,就没有什么好的处理方法”,<sup>②</sup>只好污染泰晤士河。这一切也反映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城市和乡村的对立。

(3)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大规模的工业机械化和日益扩大的远程贸易,与农业互相配合,只能加剧和扩大这种“无法弥补的裂缝”。“资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551—552 页。

<sup>②</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5 卷,人民出版社 1974 年版,第 117 页。



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在一定时期内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破坏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进步。”<sup>①</sup>

(4) 既然生态循环圈出现了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那么,它的根源在哪里呢?马克思认为,根源应该在“劳动”上找。因为“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sup>②</sup>。

(5) “劳动”的什么地方出了问题?马克思认为,问题出在“劳动循环”上,也就是“价值循环”或者“商品循环”上。资本主义的商品循环违背了“归还的规律”,资本家不断地将剩余价值从工人那里拿走。

(6) 要解决环境危机,应该怎么办呢?马克思认为,应该从生产关系入手,消灭产生剩余价值的根源。因此,马克思说:“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sup>③</sup>。这样,马克思就把解决生态问题的出路和社会主义的前途联系起来。马克思的理论构成了当代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础和开端。

#### 4. 马克思本人具有深刻的生态思想渊源

福斯特强调了古希腊自然哲学家伊壁鸠鲁对马克思的影响。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就是关于伊壁鸠鲁的,马克思曾盛赞伊壁鸠鲁是希腊启蒙思想家中最伟大的代表人物。根据今天的研究,生态系统遵循4个原则,其中有2个原则来自伊壁鸠鲁:(1)任何事物都来自其他事物(nothing comes from nothing);(2)任何被破坏的东西都不会消失(nothing being destroyed is reduced to nothing)。所以,福斯特认为:“对伊壁鸠鲁的研究,影响了马克思理解自然界的科学方法,甚至影响了马克思的整个思想。”<sup>④</sup>福斯特的说法是有道理的,以前,我们在研究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52—55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1—20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926—927页。

④ Foster, J. B., *Marx's Ecology: Materialism and Nature*, Monthly Review Press, New York 2000, pp. 49—51.



马克思的思想渊源的时候,谈得最多的是黑格尔、费尔巴哈、斯密、李嘉图,对伊壁鸠鲁显然没有予以足够重视。

5. 由于历史原因,马克思的生态思想被掩盖了。福斯特认为,后来,马克思生态思想的传统在很大程度上衰亡了。20 世纪 30 年代,在马克思主义的信奉者内部,生态学经历了双重的死亡:一是思想的死亡,二是肉体的死亡。斯大林主义完全清洗掉了苏维埃领导层和科学界的生态学倾向。斯大林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反对“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力量总是来自具有生态倾向的圈子。大多数有生态思想的社会主义者遭到了迫害。例如,布哈林被枪毙,生态学者瓦维洛夫 1943 年由于营养不良死在狱中。西方国家情形也是这样,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辩证法不适用于自然界,自然界成了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卢卡奇、葛兰西、科尔施的观点标志着 20 世纪 20 年代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反叛,自然在他们那里显然消失了。他们日益把马克思主义局限于人类历史,而且基本上是人类破坏自然的历史。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虽然重提自然,但他们所关注的“自然”主要是人文自然(human nature),而不是“外在的自然”(external nature)。语言的障碍与历史的尘埃一层层堆积起来,马克思生态思想的光辉被掩盖了。今天,在很多生态社会主义者眼中,马克思竟然成了一位“反生态思想家”。

对马克思生态思想的研究引起了福斯特一连串的思考:“是否在马克思的唯物论里也可以发现马克思生态学的奥秘?是否应该是这样:单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无法充分理解马克思的唯物论,而是要从自然史(natural history),或者历史和自然的辩证关系中,才能充分理解唯物论?换一种说法,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恩格斯所说的‘唯物自然观’是密不可分的?”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最终形成了 2000 年福斯特的著作《马克思的生态学》。<sup>①</sup>该书的核心思想就是论证:在马克思的整个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中,都贯串着生态思想。

<sup>①</sup> Foster, J. B., “Marx’s Ecolog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在 2002 年伦敦马克思主义大会上的发言, <http://pubs.socialistreviewindex.org.uk/isj96/foster.htm>。



另外,笔者推测,该书的出版还有一个目的——福斯特是在有意地驳斥奥康纳的观点,因为1997年,奥康纳在《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一书中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中存在着关于自然的“理论空场”;而且,福斯特曾经和奥康纳主编的《资本主义,自然,社会主义》杂志进行过论战。

综上所述,可以肯定地说,生态思想在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通过对马克思生态思想的理解,有助于发现资本主义各种主要矛盾之间的内在联系。资本主义违反了“归还的规律”,在人与自然的“新陈代谢”中,在社会经济的“物质变换”中,制造了“无法弥补的裂缝”,它把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联系在一起:两大阶级的对立、各大部类之间比例关系的失衡、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城市和乡村的对立、宗主国与殖民地的对立;人与自然的对立。

另一方面,还应该看到,即便是生态社会主义中的“科学社会主义”倾向,也存在着一些理论问题。总的来看,生态社会主义存在着这样一种传统,它的整个理论体系都是以生态问题为出发点构建起来的。生态社会主义从分析生态危机的根源开始,勾画了未来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的蓝图,考察了实现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的动力、主体、道路、指导思想等问题,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体系。但是,生态问题固然重要,它只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一个方面的表现,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不能单纯建立在生态问题基础上,生态问题只能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方面,而不是全部。因此,“生态社会主义”这个名称也不够恰当。不能以“生态”问题为立足点去构想整个“社会主义”蓝图,而应该倒过来,依据“社会主义”理论构建社会主义的生态学理论。

## 本章小结

本章介绍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生态社会主义在三个方面的新变化:生态危机的根源与解决生态危机的前途,实现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的



动力、主体与道路,生态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生态社会主义曾就这三个方面进行过比较深入的探索,但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生态社会主义发生了重大的理论转折,在理论上更加接近科学社会主义。

生态危机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20 世纪 90 年代之前,生态社会主义者已经对此形成了“定论”。但是,随着苏东剧变,关于生态危机根源的“老话题”又成为一个“新话题”。生态社会主义者与各种“非资本主义”的归因论进行了激烈的交锋,从而使生态社会主义关于生态危机根源的理论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获得了新的发展。解决生态危机的出路是社会主义,生态社会主义者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但是,应该站在什么立场上对未来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进行构想?在这个问题上,生态社会主义者之间矛盾纷呈,最主要的是“生态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之间的争论。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在实现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的动力、主体、道路、指导思想等一系列问题上,生态社会主义内部存在着“新无政府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两种倾向的论争。“新无政府主义”倾向对科学技术持批判态度,把道德看作是实现理想社会的动力;把“新社会运动”当作社会变革主体;他们在社会变革的道路问题上反对“二元对立”的阶级斗争,希望绕过和超越资本主义制度;他们的指导思想是传统的无政府社会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深生态学的混合物,他们对马克思主义持批判和怀疑态度。

“科学社会主义”倾向则把科学技术当作一种解放的力量,是实现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的动力;他们强调无产阶级在社会变革中的主体地位,同时对第三世界国家工人阶级的力量更加重视;在社会变革的道路问题上,他们坚持“二元对立”的阶级斗争,认为阶级冲突不可避免;在指导思想上,他们坚决捍卫马克思主义,强调生态思想在马克思整个理论体系中的重要作用。



# 生态社会主义的实践和启示

## 第一节 生态社会主义的实践

狭义的“生态社会主义”是绿党的一个流派，绿党本身的组织就十分松散，生态社会主义流派和绿党的其他流派之间当然也没有明确的组织界限。由于实践主体不明确，所以，谈论狭义的生态社会主义的实践是很困难的。本书在研究生态社会主义实践的时候，以广义的生态社会主义为主要对象，也就是绿党和其他左翼政党形成的“红绿联盟”。

### 一、欧洲的“红绿联盟”政府

早期的生态运动主张进行“制度外斗争”，即通过游行、示威、侵占、游说来实现他们的政治诉求。20世纪七八十年代，绿党成立后，许多欧洲国家的绿党陆续进入地方性政府，开始了“穿越制度的长征”。到20世纪90年代，欧洲已经有5个国家的绿党成为全国性执政党。绿党是一个非主流的小政党，它成为执政党的唯一选择就是与主流政党联合执政。从绿党的政治实践来看，他们大多是与左派的社会民主党、人民党或者社会党组成“红绿联盟”。同时，苏东剧变之后，西方政治风向右转，原先的左翼政党势力大减，为了赢得选举，对绿党“频送秋波”。由于“红”“绿”双方面的原因，20世纪90年代以后，“红绿联盟”取得了



较大进展。

最先进入全国性政府的是芬兰的“彩虹联盟”。1995 年,芬兰绿党与其他两个大党(社会民主党和全国联盟党)和两个小党(前共产党和人民党)组成了“彩虹联盟”(rainbow coalition),实际上也是一个“红绿联盟”,在这个联盟中,左派占据着主流。

1996 年,意大利绿党和人民党建立了一个“红绿联盟”。联盟采用了“橄榄树”(Ulivo)的名称,赢得了 1996 年的选举。

1997 年,法国绿党与社会党建立了“左翼执政联盟”,也成功地进入了全国政府。在这之前,法国绿党曾宣称永远不会追随左翼或者右翼,不与任何政党建立联盟。尽管法国绿党在其最辉煌的时候曾总计获得过 15% 的选票,但是,由于法国存在着两支绿党,他们互相竞争,内耗严重,所以,法国绿党虽然获得了民众有力的支持,但是却没有进入全国政府。1997 年,法国绿党终于改变了不结盟的初衷,与社会党建立了联盟,从而进入了全国政府。这实际上还是一个“红绿联盟”。

1998 年,德国绿党与社会民主党建立了“红绿联盟”,也进入了联邦政府。至此,欧洲大陆上 3 个大国(法、德、意)的“红绿联盟”都进入了全国政府。

1999 年,比利时绿党与自由党和社会党组成了“紫绿联盟”,也进入了全国政府。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红绿联盟”的建立和执政,当然和绿党内部生态社会主义流派的影响是分不开的;也反映了解决环境的出路和社会主义前途的内在联系。

但是,这些“红绿联盟”的执政时间都不长,主要是因为绿党相继退出了政府。到 2002 年,意大利和法国绿党失去了内阁中的部长职位;到 2004 年,芬兰和比利时绿党也退出了政府;2005 年,德国提前举行大选,德国绿党和社会民主党联合执政的“红绿联盟”政府被新的大联合政府所代替,绿党宣布:由于根本目标的差异,绿党将不再加入大联合政府。至此,硕果仅存的德国绿党也退出了政府。

这是否意味着“红绿联盟”的执政只不过是昙花一现,从此,绿党将不再是一支值得重视的政治力量?而“红绿联盟”的生态社会主义运动



将再也无从谈起？

本书认为，绿党相继失去执政地位的首要原因是绿党的盟友社会民主党等左派政党在 21 世纪初相继下台。绿党作为一个小党，需要和主流政党联合执政，而绿党和左派政党存在着天然的内在联系，所以通常与左派政党组成“红绿联盟”政府。随着社会民主党等左派政党的下台，绿党随之离开了全国性政府。

其次，绿党对执政本身并不十分热衷。当然，赢得选举和参与政府是评价一个政党成功与否的重要方面，但是，这个标准对于绿党来说似乎不太适用。很多绿色人士认为，全国政府并不能为他们实现绿色理想起到什么作用，相反，他们始终认为，在解决最为紧迫的环境污染、世界和平、社会公正等问题上，传统的议会和政府常常是无能的，而且，议会和政府是“旧政治”的工具，它所服务的仅仅是“旧政治”的目标：维持经济增长、加强军备、剥削第三世界，这些只能加剧环境危机。既然如此，那为什么绿党还要进入政府呢？在绿党看来，议会和政府可以为绿色观念的传播提供一个最为理想的论坛，参与议会和政府也可以为实现绿色事业提供微小的促进作用。所以，在参与议会和政府的问题上，绿党并不像传统政党那样积极。20 世纪 70 年代，西欧绿党代表首次被选入全国议会，但是过了大约 20 年之后，才有一些绿党达到了权力的顶峰，进入了全国政府。与传统政党相比，这一过程显得太过漫长。这也说明了绿党对于政府权力并不像传统政党那样热衷，他们甚至怀疑：绿党在“穿越制度的长征”、“掌握权力”之后，还能剩下些什么？执政的绿党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改变全国的政治进程，而参与政府又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绿党？

在多党制体制下，执政与否不是衡量一个政党成功的绝对标准。如果政治格局不利，或者政治大气候不利的话，一个选举成功的政党也可能被排斥在政府之外。所以，如果要对一个政党做出总体的评估，就需要对整个政党格局和格局演变的政治背景进行全面考察。德国的罗密尔(Ferdinand Müller-Rommel)教授和英国的波古特克(Thomas Poguntke)教授通过分析得出结论：“这些结果清楚地表明，当前并不存在一种绿党整体衰弱的迹象，尽管显而易见的是，绿党不能再期待



20 世纪 80 年代那样的增长率。”随着经济困难的增加、新社会运动的衰落、和“9·11”事件之后公众对反恐问题的关注,绿党所面临的政治气候已经不像 20 世纪 80 年代那样有利,但总的来说,西欧各国的绿党都维持了在全国政党体制中的地位和他们的执政潜力。<sup>①</sup>

通过执政,绿党在很多方面都发生了变化。很多西欧绿党已经蜕去了原来激进的生态原教旨主义,转向了温和的现实主义,融入了现代政治制度。在不久的将来,一旦政治格局和政治大气候发生改变,绿党也许还会回到政府中去,新的“红绿联盟”政府再次出现也不是什么令人惊奇的事。

## 二、德国的“红绿联盟”政府

一直以来,德国被看成使世界绿色运动的“大本营”,德国绿党和社会民主党的“红绿联盟”总是备受重视。

20 世纪 70 年代,德国“红”与“绿”之间的关系并不融洽。德国社会民主党对于生态运动所标榜的新政治的态度是抵制多于接受,这造成了“红”“绿”之间的对立。绿党成立后拉走了社民党的大批选票,还造成社民党内部的分歧。1983 年,社民党政府终于垮台。

在被逐出政府并经历了连续的挫败之后,1984 年,社民党决定修改它的党纲,融入生态保护的内容。同时,绿党这头“绿色公牛”也日益收敛了它的“野性”,开始融入现存的政治体制。自 1985 年以来,“红”“绿”之间逐渐消除了隔阂,开始在地方政府中联合执政。1998 年 9 月,在德国大选中,社民党和绿党组成“红绿联盟”,赢得了选举。社民党在 16 年之后重新夺回政权;而绿党也首次进入了全国政府。2002 年,社民党和绿党再度联手获得胜利。

2005 年 9 月,德国提前举行了大选。大选虽然选掉了以施罗德为总理的“红绿联盟”政府,但是对手——联盟党(包括基督教民主联盟和

---

<sup>①</sup> [德]斐迪南·穆勒—罗密尔、[英]托马斯·波古特克主编:《欧洲执政绿党》,郇庆治译,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中译本前言第 2 页。



基督教社会联盟两个姊妹党)也没有足够的力量组织政府。最后,德国政坛上的两个主要政党——联盟党和社会民主党经过谈判,组成联合政府。绿党领袖表示,绿党将不再参加联合政府,因为绿党进入政府夹在两大党之间也不会有什么作为。

总的来说,“红绿联盟”通过7年的执政实践对提高德国经济质量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红绿联盟”执政期间,推行了一系列的环境政策,使环境保护的措施不但落实到产品设计、生产、运输、包装、回收等各个环节,而且还深入到政治和文化层面。而且,德国社民党和绿党根据各自党纲的理念确立了德国社会全面发展的战略:维护社会福利和公正,充分发挥德国高技术和人才优势,走质量型的发展道路。为此,“红绿联盟”进行了双重国籍的改革,有利于合法移民融入德国,广泛吸引高科技人才;德国的产品也以其高质量和环保赢得了国际竞争力,2003—2005年德国连续保持着世界头号出口大国的地位;德国还推行了生态税,这对于优化能源结构,发展可再生能源起了重要作用;德国还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主动承诺放弃使用核能的国家。

#### (一)“红绿联盟”选举失利的表层原因

“红绿联盟”在执政过程中也存在着下面几个问题,构成了“红绿联盟”政府垮台的表层原因:

第一,最明显的是经济原因。经济不景气被看作是“红绿联盟”政府最大的问题:自“红绿联盟”执政以来,从1999年到2004年,德国经济年均增长率只有1.2%,仅达到1990—1998年“红绿联盟”执政前的半数。根据德国联邦统计局的初步统计,德国2005年的GDP扣除价格因素后比上年增长了0.9%<sup>①</sup>,在欧盟当中仍是最低的。与低经济增长率相伴随的是高失业率,德国失业率在2005年2月攀升至二战以来的新高,达到12.6%。

第二,经济问题又引起了政策问题。“红绿联盟”政府认为,过于强调社会福利和环境保护阻碍了经济发展,对政策进行了调整。2002年,“红绿联盟”再度执政后,面对经济增长缓慢、失业剧增、社会保障体

<sup>①</sup> <http://frankfurt.mofcom.gov.cn/column/print.shtm>.



制难以为继的局面,开始了一系列的改革。2003年6月,社民党正式提出了改革方案《2010议程》,其核心思想是:削减社会福利,调整社会公正和经济效益的关系,采取增加企业利润、鼓励企业投资的政策。但是,政策调整难以收到立竿见影的成效,而且,他们的政策调整不但没有将本属于反对党的选民争取过来,反而往往失掉了原来支持它的基本选民。

第三,政策调整又引发了社民党内部的组织问题。早在《2010议程》的酝酿阶段,社民党内部就发生了激烈分歧。一些比较倾向于工会组织的社民党成员坚决反对削减社会福利的方案,许多市民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原社民党主席奥斯卡·拉封丹则离开了社民党,2005年5月,他和前共产党人携起手来,成立了左翼—民主社会主义党。拉封丹在大选中对社民党反戈一击,断言社民党已经落入了“新自由主义”的陷阱,德国人民珍视的福利制度已经死于施罗德之手。拉封丹的出走大大削弱了社民党的力量,他对社民党的攻击显然也切中要害,拉走了社民党的大批选民。这是“红绿联盟”政府垮台的最直接的原因。

上述三个原因,由经济问题引发,一环套一环,一层层地向前发展,终于导致了“红绿联盟”政府的垮台。

## (二)“红绿联盟”大选失利的深层原因

本书认为,上述三个原因都是表层的,“红绿联盟”政治身份(political identity)的丧失才是更深层次的、更有全局性的原因。这样说的理由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红色”已经不再鲜艳,这导致了社民党的分裂。社民党所坚持的“社会主义”早已不是马克思所说的科学社会主义。在1959年之前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德国社民党曾经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科学社会主义在社民党中保持着强大的影响力。但是,1959年,社民党在哥德斯堡大会上通过了一个新纲领,实现了“非意识形态化”,切断了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渊源关系,使社民党从一个工人阶级的政党变成了一个“人民党”。其理论基础和经济政策都与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相去甚远。通过《哥德斯堡纲领》,社民党日益失去了它的政治身份。在这种情况下,福利国家政策成了社民党保持其政治身份的重要标志,而



《2010 议程》连这个标志也丢掉了。这超越了起码的政治底线,所以,以原德国社民党领袖拉封丹为首的一部分社民党人因此退出了社民党,与前共产党人联手成立了左翼—民主社会主义党。

第二,淡化“红色”的路线侵害了大多数下层人民群众的利益,导致了大选的失败。社民党的主要成分仍是中下层社会成员。根据下表可以看出,在社民党成员的职业构成中,职员、工人、公务员、家庭主妇、领取养老金者始终占较高的比例,构成了社民党的绝大多数,社会福利和他们的利益休戚相关。

社民党成员职业结构的发展 1952—1996(%)<sup>①</sup>

	1952	1966	1973	1991	1996
职员	17	19	21.9	26.6	28
手工工人	45	32	26.4	25.5	22.8
公务员	5	8	9	10.6	10.9
士兵	—	—	0.8	0.6	0.6
家庭主妇	7	16	9.9	11.8	11.2
农民	2	—	0.4	0.2	0.1
领取养老金者	12	18	13.4	9	10.9
大学生	—	1	5.7	6.6	6.8
学徒	—	—	1.2	1.8	1.7
失业者	—	—	—	1.5	1.8

所以当施罗德抛出《2010 议程》,要对福利国家政策下手的时候,首先遭到了社民党内外工会势力的激烈反对,他们坚决地捍卫上个世纪工人们通过阶级斗争获得的全部社会权利。北威州是德国工业和城市最密集、人口最多的一个州,著名的工业区鲁尔区就在那里,因此,数十年来,这里一直是社民党最稳固的政治地盘。但是,由于失去了工人的支持,2005年5月,在北威州选举中,社民党连这最后一块政治地盘也丢掉了,从而动摇了“红绿联盟”联邦政府的政治基础。

第三,“红绿联盟”实际上已经“红”已非红,“绿”已非绿,选民已经

<sup>①</sup> Robert Ladrech and Philippe Marlière, *Social Democratic Parties in the European Union*, Palgrave Macmillan Press Ltd., New York 1999, p. 86.



厌倦了政客们争权夺利的灰色政治舞蹈,这是选举失败的直接原因。“红色”已经不再鲜艳,前文已经说过了。同时,绿党之“绿”也已黯淡。在 7 年的执政过程中,绿党学会了妥协,也失去了它的政治身份。在科索沃问题上,绿党支持德国参加北约的军事行动,严重背离了它的竞选诺言;在向土耳其出售武器问题上,绿党被迫接受了社民党的主张,无可奈何地背离了它维护世界和平的宗旨;在分阶段消除核能问题上,绿党已经不再是反核运动的先锋;在实行生态税问题上,绿党只能在施罗德总理规定的框架内小打小闹。很明显,绿党已经失去了它往日的“野性”,没有了当年的“时代精神”,所以,大量的年轻投票者离开了绿党。也许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绿党在取得最大的政治成功的时候,也就是它历史上政治危机最为深重的时候。自执政以来,绿党反思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它的政治身份,这已经是一个很老的话题了:在“穿越制度的长征”之后,绿党还能剩下些什么?

第四,经济问题是绿党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这只是从量上来说的;从质的方面讲,德国经济完全可以被评为“优”。自 1998 年“红绿联盟”执政以来,“量”的增长太小了,这的确是“红绿联盟”执政的失误。但是,也不能完全以 GDP 来衡量一个国家的经济成败。从“质”上讲,德国经济的成就是很明显的。德国产品在国际上享有非常高的信誉,从 2003 年开始,德国连续 3 年保持着世界头号出口大国的地位;而且,据预测,德国的出口增长势头仍很旺盛。德国推行了一系列的环境政策,使环境保护的措施落实到生产的各个环节,而且带动了整个欧盟绿色产品的质量。按照生态保护的要求,德国经济恰恰是走上了一条有机增长之路:避免细胞分裂式的无差异的量的增长,坚持质的提高。

对德国经济在“量”上增长缓慢也应该具体分析。前面介绍了生态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环境危机根源是资本主义利润最大化的追求,利润最大化要求生产最大化和消费最大化,这样必然导致污染最大化。德国毕竟是资本主义国家,因此,在采取一系列的环保措施之后,与利润最大化相适应的原有的一部分生产能力会受到限制。所以,“红绿联盟”执政之后,德国经济增长变缓。早在 1991 年,法国生态社会主义者高兹在研究了德国社民党的新纲领之后,提出了“生态重建”的主张,就



曾经预言：“生态重建”会造成与利润最大化相适应的一部分经济的收缩。“红绿联盟”在 2005 年的大选中仍获得了将近 43% 的选票，也说明了德国人民对“红绿联盟”在经济问题上的成败得失保持着清醒的认识，没有一概否定。对此持一概否定态度的主要是那些大财团和他们的经济学家。

本书并不是把经济增长和生态保护对立起来，而是认为，在对资本主义经济进行改造、使之与生态保护相适应的过程中会出现经济收缩；但是，在对资本主义经济全面改造完成之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当人类摆脱了利润最大化的束缚，才有可能对人与自然的互动关系进行理性的调节，从而保持经济的适度增长。

第五，在解决失业的问题上，“红绿联盟”丧失了应有的起码的政治身份。经济收缩必然给社会带来损失，其中的一项损失就是失业问题。如何解决失业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公平——使整个社会公平地享受生态保护带来的好处，公平地承担经济收缩带来的损失，那就要更好地完善社会福利。“红绿联盟”的做法恰恰相反，在经济收缩的情况下，他着手削减社会福利，让下层民众独自承担生态保护的代价，这显然是不公平的。

综上所述，政治身份的丧失才是“红绿联盟”在 2005 年大选中失败的主要原因。无论是生态保护还是社会公平都是和社会主义的前途相联系的，在资本主义框架内，这两个问题都无法得到解决，这是生态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尽管可以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把“红绿联盟”看作是广义上的生态社会主义，但是，它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所以，它既不能真正实现生态保护，也不能真正实现社会公平。当然，如何实现经济发展、生态保护和社会公平的综合平衡，这是全世界政党正在探索的共同课题，德国“红绿联盟”的执政实践也为中国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经验和教训。中国共产党当然应该从本国实际出发，有选择地借鉴其他国家政党的经验教训，这也是本书在下一节中将要讨论的问题。



## 第二节 生态社会主义对中国的启示

中国的国情决定了中国必须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生态社会主义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友邻”流派，对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 一、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是我国的唯一选择

我国的资源环境状况存在着两个特点：一是资源短缺，二是环境承载能力有限。这构成了我国社会发展的自然基础，这决定了中国必须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 （一）资源短缺

人口众多，资源匮乏，这是我国的基本国情。资源短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人均资源少。我国某些资源的总量并不小，例如煤炭、稀土，但是由于人口众多，人均量就非常有限。很多资源储量原本就不高，特别是几种重要的资源，我国是比较缺乏的。我国人均耕地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  $1/2$ ，淡水、森林资源人均占有量分别是世界平均水平的  $1/4$  和  $1/6$ ，石油资源仅占世界人均量的  $1/10$ ，化石能源（包括煤炭、石油、天然气）也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  $1/2$ 。我国矿产储量不算小，但 95% 以上是难以利用的贫矿，所以开采冶炼成本要比其他国家高得多。

第二，单位产品资源消耗量大。由于传统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尚未完全转变，我国单位产值的资源消耗量大大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 GDP 增长 10 多倍，矿产资源消耗量增长了 40 多倍；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我国每度火电要多耗煤 22.5%，每吨钢多耗能 21%，每吨水泥多耗能 45%；机动车每百公里比欧洲多耗油 25%，比日本多 20%；单位面积采暖的能耗是气候条件相近国家的 2—3 倍。中国资源利用率低，不但浪费了资源，还污染了环境。



第三,资源需求缺口大。未来十几年,我国人口将以每年净增一千万左右的速度增加。到2010年,我国的人均水资源、耕地资源和森林面积分别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21%、25%和18%。要实现2020年人均GDP翻两番的经济发展目标,如果按照现有的资源利用水平,2020年的资源消耗量将是目前的4—5倍。我国后备资源储量的增长速度远远低于消耗速度,目前,已经可以感受到资源问题已经开始阻碍我国的经济增长,将来的缺口将会更大。尤其是能源,我国的石油、天然气资源严重不足,从1993年开始,我国的石油已连续多年进口,2005年,我国的石油进口量达到1亿吨,到2020年,我国将有一半的石油依靠进口。

## (二) 环境承载能力有限

我国的环境承载能力十分有限,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水体污染严重。2003年,我国废水排放总量达460.0亿吨,超过环境承载能力的60%;在我国七大水系的407个监测断面中,仅有38.1%的断面符合三类以上水质标准,劣五类水质占29.7%,属于严重污染。

第二,大气状况形势严峻。2003年全国二氧化硫排放量为2158.7万吨。北美、欧洲和我国是世界三大酸雨区,但是,北美和欧洲的酸雨污染已基本得到控制,而我国的酸雨污染仍然相当严重。随着机动车的快速发展,机动车污染明显上升。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机动车排放的污染物以经成为空气污染的第一大污染源。

第三,固体污染不容忽视。城市垃圾日益成为一个突出的环境问题。2003年,我国城市垃圾清运量为1.48亿吨。垃圾处理率为50.28%。在抽检的329个生活垃圾处理场中,达到无害化处理要求的仅为15.26%,垃圾填埋场二次污染问题突出。乡镇、农村垃圾基本上是露天堆放。危险废物污染令人担忧。2003年,全国工业危险废物生产量为1170万吨。这些危险废物产生的废气、渗滤液、淋溶水污染地下水,成为重要的污染源。医疗废物的安全处置水平也很低,很多医院用锅炉简单地焚烧医疗废物,成为传播传染病的一个主要途径。

第四,电子污染日益突出。我国电子垃圾产生的高峰期已经来临,



每年报废的电冰箱约为 400 万台、电视机 500 万台,电脑、手机等更新更快。电子垃圾含有大量的有毒有害物质,由于我国技术处理方式落后,电子垃圾污染严重。国外电子垃圾向我国境内转移的问题应该引起高度关注。发达国家越境转移的电子垃圾有 90% 进入亚洲,其中的 90% 又进入了我国。

第五,核污染令人担忧。我国已经有 11 个核电机组投入商业运行或正在建设过程中。我国核设施多国引进、多种堆形、多类标准,风险管理难度大。许多早期建设的反应堆设备陈旧,环境风险在不断增大。相当数量的带放射性的废液和固体废物存放于大江大河附近,一旦发生事故,后果将十分严重。大量放射性废物的贮存缺乏严密的保管措施。据 2002 年的初步统计,国内现有各种放射源以每年约 15% 的速度增长。由于维修和运行经费匮乏,安全管理问题日益突出。

### (三) 可持续发展道路是唯一的选择

资源环境状况决定了我国必须走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根据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多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走了这样一条道路:当一个国家的人均 GDP 达到 1 000 美元,环境问题开始日益严重,随着经济发展,环境负荷也迅速上升;当人均 GDP 达到 7 000 美元左右,环境负荷达到了顶点,开始下降,根据曲线的走势,环境负荷将不断下降,降到很低的水平,但是,这只是一种远景预测,尚未完全实现。目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正处在环境负荷开始下降的阶段。这样,以人均 GDP 为横坐标,以环境负荷为纵坐标,就形成一个倒 U 型的曲线,这就是环境学上所说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可以把这个曲线比喻成一座“环境高山”,经济发展就好比是一次翻山活动,在翻越山顶之前的那个阶段,发达国家都曾经历了一个环境问题十分严重的阶段,付出过沉重的代价。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起步较晚,至今仍处在“爬坡”阶段。这些国家应该以发达国家的历史为鉴,吸取他们的教训,不要再去走从山顶上翻过“环境高山”的老路,而要从半山腰开辟一条隧道穿过去,变“翻山”为“穿山”。毫无疑问,这是发展中国家的最佳选择。

穿过“环境高山”的思想,对我国尤其重要。我国的资源环境状况



决定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可以走老路我们走不得。现在,我国经济每增长一个百分点,环境污染就增长大约 1.1 个百分点,如果按照目前的这种状况发展下去,到 2020 年,环境污染将是 2000 年的 4 到 5 倍,资源消耗量也将翻两番还多,某些地区的生态系统就有可能崩溃、主要的资源就有可能枯竭。而发达国家在翻越“环境高山”之前所面临的资源环境状况比我国要优越得多,而且还有广大的殖民地作为他们的资源供应地和他们输出污染的场所。

所以,中国没有别的选择,必须下定决心在“环境高山”的半山腰穿过去,走出一条新型工业化道路,这条道路就是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 (四) 从联合国环境大会到“生态文明”建设

生态社会主义在 20 世纪 70 年代兴起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但是,中国的环境保护事业并非和这件事情毫不相关。

1971 年 11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扑面而来的是世界生态运动的浪潮。联合国于 1972 年 6 月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第一届环境大会,中国正处于“十年动乱”之中,整个国家几乎都处于无政府状态。在这种状况下,周恩来总理派出了一个大型代表团去参加世界首次人类环境会议。

曾参加这次环境会议的曲格平<sup>①</sup>回忆说:“实事求是的讲,我们是在对环境问题这一命题的内涵和外延都很不清楚的情况下与人家展开辩论的。”在会议上,我们都把环境问题当作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认为和中国的关系不大;中国代表更多关注的是和美国的政治斗争,对国际社会面临的诸多环境问题却了解不多。但是,短短 10 天的会议给中国带回了一个崭新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思想:环境保护。在对环境问题严重程度的认识上,斯德哥尔摩大会让中国人出了一身冷汗。回国后,与会代表们把大会列举的环境问题与中国的现实一对照,忽然发

---

<sup>①</sup> 曲格平:1972 年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出席了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1976 年后历任中国常驻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首席代表、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环境保护局局长,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国家环境保护局局长。1993 年至 2003 年两次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并出任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主任委员。



现,在很多方面,中国环境问题的广度和深度原来并不亚于资本主义国家。<sup>①</sup>

1973 年 8 月 5 日,在周恩来总理的支持下,中国以国务院名义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曲格平回忆说,在会前拟定的主题文件中,对那次大会定下了这样的调子:环境保护是关系到能否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关系到巩固工农联盟、关系到保护人民健康的大事,应该引起各级领导部门的充分重视。国务院第一次环境保护大会实际上是在联合国人类环境大会的直接推动下召开的,它的功绩在于使我们认识到环境问题的重要性。“仅 1972 年到 1974 年的两年间,周恩来关于这方面的讲话就达 32 次之多。”根据总理指示,在第一次环保会议期间,还在人民大会堂召开过一个关于环境保护的万人大会,各部门的负责人都会到会听取有关专家的介绍。如此高规格的会议在新中国的历史上都是不多见的。<sup>②</sup>从此,环境保护在中国被正式列入议事日程,中国的环保事业终于蹒跚起步了。

1983 年,全国第二次环境保护工作会议召开。在这次大会上,“环境保护”被正式列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这距联合国第一次环境大会只有 10 年多一点的时间。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走有中国特色的环保之路”的思想以会议文件的形式确定下来。同时,会议还总结了 10 年来的经验,制定了经济、社会与环境协调发展的指导方针,明确提出了“预防为主、防治结合;谁污染、谁治理及强化环境管理”等三大政策体系,使“有中国特色的环保之路”这一精辟的思想有了具体的行动指南。如果说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工作会议解决了对环保工作的认识问题,那么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工作会议则是解决了“做什么”的问题,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

20 世纪 90 年代初,中共中央制定了快速、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方针,特别是制定并开始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开始注意经济发展与资

<sup>①</sup> 2005 年 3 月 18 日曲格平与联合国副秘书长在北大进行了题为“东西方环境对话”的讲座,引自笔者对曲格平发言的记录。

<sup>②</sup> 引自笔者对 2005 年 3 月 18 日“东西方环境对话”中曲格平发言的记录。



源、环境和人口的协调问题,开始注意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2002年,党的十六大把生态环境与政治、经济、文化列在一起,作为小康社会的四个目标之一,并且把社会更加和谐作为我们党要为之奋斗的一个重要目标明确提出来。

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科学发展观,强调要按照“五个统筹”的要求,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这是新一届党中央对发展内涵、发展要义、发展本质的进一步深化和创新,同时也坚持了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是从我国新世纪新阶段的实际出发,为破解发展难题提出来的。

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四中全会一直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党的重大任务。胡锦涛总书记明确指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把切实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和治理工作作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和谐,往往会影响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目前,我国的生态环境形势相当严峻,随着人口增多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还会更加突出。如果不能有效保护生态环境,不仅无法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由此还会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的要求和改善措施。<sup>①</sup>

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顺应世界发展的大势,明确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的要求,丰富了文明和发展的内涵。中国共产党的这一系列方针政策的确立,为实现我国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指明了方向。

## 二、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

在反对资本主义的问题上,在谋求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发展的问题上,生态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有着共同的立场,所以,生态社会主义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启示。中国共产党当然可以从我国

---

<sup>①</sup> 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5年6月27日。



实际出发,有选择地借鉴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具体地说,生态社会主义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政治上,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生态危机的总根源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要解决生态危机,必须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是生态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在解决生态危机的问题上,社会主义制度具有优越性。所以,中国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中国共产党要坚持鲜“红”的政治立场。2005 年,德国“红绿联盟”遭到挫败从反面提供了教训:表面上看,“红绿联盟”的挫败是经济、政策、组织原因,但更深层的原因是“红绿联盟”失去了自己的政治身份,出现了“红”不红“绿”不绿的现象。

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本身就包含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内容。中国共产党明确地把生态文明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之一。要解决生态问题,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保护生态环境,实现社会全面发展,提供了最根本的保证。

第二,在经济上,依靠科技进步促进经济与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

早期的生态社会主义者对科学技术持批判态度,但是,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大多数生态社会主义者的态度发生了转变,认为科学技术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并不是科学技术本身造成的,而是由于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从而把科学技术作为解决生态危机、实现生态社会主义理想社会的动力。生态社会主义者提出了采用环境友好型技术的主张,高兹还提出了对科学技术进行生态重建的设想。这些都为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在我国,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科学技术日益摆脱了剩余价值最大化的束缚,科学技术日益成为一种解放的力量。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要求提高资源利用率、降低环境污染,加快推进清洁生产,大力发展循环经济,而这一切必须依靠自主创新能力提高和科技进步来实现。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运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淘汰高耗能、重污染的落后工艺、技术



和设备。要发挥科学技术作用,集中力量研究开发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的关键技术和共性技术。

第三,在思想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大力宣传生态文明观念。

20世纪90年代以前,多数生态社会主义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了,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已经取代了经济危机,甚至认为马克思具有“生态原罪”,是一位反生态思想家。

当前,党的十七大报告在提出“生态文明”的同时明确指出“要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这也向理论工作者提出了要求:马克思到底有没有生态思想?马克思的生态思想在他的整个理论体系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在我国建设“生态文明”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还能不能作为指导思想?

20世纪90年代以后,多数生态社会主义者在思想上向科学社会主义靠近,从而重新确立了生态思想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重要地位。马克思的生态思想博大精深,完全可以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指导思想。和现实的需要相比,应该承认,我国在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研究方面还是非常薄弱的,因此,有必要借鉴国外生态社会主义的研究成果,使马克思主义更好地和我国生态保护的 actual 相结合。

第四,在外交上,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反对生态帝国主义。

20世纪90年代,生态社会主义者提出了生态帝国主义理论,揭露了当代生态帝国主义掠夺资源、输出污染、发动生态战争的恶行,积极主张打破世界政治经济旧秩序,建立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

对外交往是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方面,生态帝国主义理论为我国的对外交往提供了重要启示。我国作为第三世界国家,不合理的世界政治经济旧秩序也制约着我国的发展,反对世界政治经济旧秩序,建立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是我国外交政策的一贯主张。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发动的生态战争,是我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重要内容。面对生态帝国主义的污染输出,我国在引进外资的过程中,要注重对项目本身的环境评价,反对引进高污染和高



危险性的项目；在垃圾管理上，要加大环保和市政部门的监管力度，坚决杜绝“洋垃圾”输入我国。面对生态帝国主义的资源掠夺，我国在对外贸易中，应该坚持平等互利的原则，反对发达国家对我国珍贵生态资源的掠夺。

生态社会主义不是科学社会主义，它也包含着很多非科学社会主义的东西，所以，在借鉴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的时候，应该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进行批判的吸收。

## 本章小结

本章讨论了生态社会主义的实践和生态社会主义对中国的启示。

生态社会主义实践的主要形式是“红绿联盟”，即绿党和一些左派政党的联盟。20 世纪七八十年代，欧洲一些国家的绿党开始进入地方性议会和政府。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已经有芬兰、意大利、法国、德国、比利时 5 个国家的绿党和左派政党组成“红绿联盟”进入了全国性政府。但是，所有“红绿联盟”执政的时间都不长，随着 2005 年德国大选尘埃落定，硕果仅存的德国绿党也退出了政府。其原因主要是整个国际大气候的变化，当前并不存在一种绿党整体衰弱的迹象，实际上西欧各国的绿党仍保持着相当的政治影响力。

本章对德国的“红绿联盟”做了比较详细的介绍。德国“红绿联盟”由绿党和社会民主党组成，它的实践可以分成三个阶段：“绿”对“红”的挑战、“红绿联盟”的建立和“红绿联盟”的执政。本章认为，“红绿联盟”在 2005 年大选中失利的原因主要是政治身份的丧失。“红绿联盟”是生态社会主义的实践形式，但生态社会主义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尽管它在执政过程中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在资本主义框架内，它既不能真正实现生态保护，也不能真正实现社会公平。

生态社会主义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友邻”流派，对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启示。资源短缺、环境承载能力有限，构成了我国社会发展的自然基础，这决定了中国必须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 结 语

中国的环境保护事业和世界环境运动颇有渊源。广义的生态社会主义是生态运动和其他左派组织互相影响所形成的“红绿联盟”。那么,是否也可以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环境保护事业也看成是广义的生态社会主义呢?

本书认为:不能。这涉及生态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实际上也是对生态社会主义的评价问题。本书站在科学社会主义的立场上来界定生态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关系,对生态社会主义进行评价。这是本书的立足点。

对生态社会主义的评价可以最简要地概括为一句话:生态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友邻流派。对“友邻”二字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

一方面,生态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有许多接近的地方。在实践上,在形形色色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生态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盟友;在理论上,在由各种“社会主义”构成的社会主义理论群落中,生态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邻居。两者在反对资本主义,谋求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发展的问题上,有共同的目标。具体地说,生态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接近的地方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生态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并形成了一整套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变革的理论体系。这一直是全世界科学社会主义者共同求索的课题。生态社会主义对这个课题的探索,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借鉴。

第二,生态社会主义总结了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失败的历史教训。这也是当代科学社会主义的重大课题之一。

第三,生态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当作自己的指导思想。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生态社会主义者重新确立了生态思想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从而有助于消除生态社会主义内部各种



非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把生态运动引向健康发展的轨道。

第四,生态社会主义反对世界政治经济旧秩序,提出了生态帝国主义理论。这也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的理论。

第五,生态社会主义积极参加生态运动,与左派政党结成“红绿联盟”,为实现环境保护、社会公平进行了尝试,为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社会全面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

第六,生态社会主义运动构成了西方左翼运动的组成部分。特别是苏东剧变后,生态社会主义运动成为许多共产党人和左派分子继续同资本主义进行斗争的阵地。

另一方面,“友邻”二字也说明生态社会主义毕竟不是科学社会主义,它和科学社会主义存在着差异,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出发点不同。总的来说,生态社会主义的整个理论体系都是以生态问题为出发点构建起来的。但是,生态问题固然重要,它只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一个方面的表现,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不能单纯建立在生态问题基础上,生态问题只能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方面,而不是全部。对于科学社会主义来说,“生态社会主义”这个名称也不够恰当,不能以“生态”问题为立足点去构想整个“社会主义”蓝图,而应该倒过来,依据“社会主义”来构建社会主义的生态学理论。

第二,阶级基础不同。科学社会主义认为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和新社会的创造者。生态社会主义的主体是“新社会运动”,“新社会运动”的阶级基础是中产阶级,而不是无产阶级,“新社会运动”的兴起是和工人运动的衰落相联系的。而且生态社会主义认为,当代工人阶级已经丧失了自身的革命性,再也无法承担起自己的历史使命。尽管20世纪90年代以后,生态社会主义者对工人阶级的作用更加重视,但是,即使像佩珀那样的“科学社会主义”倾向的生态社会主义者也认为,在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依靠工人阶级进行社会变革希望十分渺茫,而更多地把希望寄托在发展中国家的工人阶级身上。

第三,社会变革道路不同。科学社会主义强调,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动力,从而指明了实现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生态社会主义虽然主张变革资本主义制度,但是,生态社会主义的社会变革道路是绕



过现政权,而不是直接对它发起挑战,生态社会主义信奉非暴力斗争,否定暴力革命。20世纪90年代以后,尽管“科学社会主义”倾向在社会变革问题上强调对立和冲突,但是仍然没有找到一条切实可行的社会变革道路。

第四,思想来源不同。生态社会主义的思想来源比较复杂,不仅来自共产党,更主要地来自社会民主党、独立左派和托派等,它的指导思想中夹杂着很多非科学社会主义的成分,因此,生态社会主义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社会主义。从“红绿联盟”的执政实践来看,受国际大气候的影响,这些左派政党的“红”色日益黯淡。

鉴于生态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这种区别和联系的关系,要划清科学社会主义和生态社会主义的界限,在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立场的基础上,对生态社会主义进行有选择的吸收和借鉴,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实践中,应该注意的是明确界定以下两对关系:

第一,明确界定“生态”和“社会主义”的关系。

生态社会主义具有“生态中心主义”的传统,它的整个理论体系都是以生态问题为出发点构建起来的。从“生态”到“社会主义”的推导过程本身是正确的,但是,不能因此站在“生态中心主义”的立场上,以是否合乎“生态”要求来衡量现存的社会制度是否是真正的“社会主义”。

科学社会主义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但这种“人类中心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不同,它要求站在集体利益的立场上理性地控制和调节人与自然的互动关系。“社会主义”的内容要比“生态”丰富得多。当前,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涵绝不是仅限于人与自然一个方面,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所说:“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sup>①</sup>

第二,明确界定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关系。

早期的生态社会主义者从“生态中心主义”的立场出发,主张实行

<sup>①</sup> 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5年6月27日。



“稳态经济”。20世纪90年代以后,这种观点发生了变化,但是,仍有一些生态社会主义者强调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对立。

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问题上,中国共产党的观点十分明确,发展是首要的任务,但这种发展不是盲目的,而是可持续的。2005年12月3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国家环保部部长周生贤在解读该《决定》时指出:学习贯彻《决定》,最需要把握的关系就是正确处理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关系,“发展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解决中国所有的问题必须依靠发展。只有经济发展了,才能增强环境保护的物质基础。让经济发展停下来,搞环境保护是行不通的。但发展必须是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绝不能以浪费资源、破坏环境为代价盲目发展,否则,资源将难以为继,环境将不堪重负,人与自然的严重失调必将危及社会稳定和谐,甚至影响文明的进程”<sup>①</sup>。显然,在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问题上,生态社会主义把两者对立起来;而中国共产党则要实现两者的良性循环的统一关系。

<sup>①</sup> 周生贤:《指导环境保护事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中国环保产业》2006年第2期。



## 参 考 文 献

### 中文书目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9、23、25、31 卷,人民出版社 1963、1972、1974、1972 年版。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4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3.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
4. 陈学明:《生态社会主义》,台湾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3 年版。
5. 李青宜:《当代法国“新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7 年版。
6. 李青宜:《“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资本主义理论》,重庆出版社 1990 年版。
7. 陈振明、陈炳辉、骆沙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
8. 徐崇温:《“西方马克思主义”》,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9. [加]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慎之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版。
10. 陈林、侯玉兰等:《激进,温和,还是僭越? 当代欧洲左翼现象审视》,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 年版。
11. 舒炜光:《当代西方科学哲学述评》,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
12. 奚广庆、王谨主编:《西方新生活运动初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
13. 刘东国:《绿党政治》,上海社科院出版社 2002 年版。
14. 郇庆治:《欧洲绿党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
15. [德]斐迪南·穆勒-罗密尔,[英]托马斯·波古特克主编:《欧洲执政绿党》,郇庆治译,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16. 解保军:《马克思自然观的生态哲学意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2



- 年版。
17. 肖显静:《生态政治——面对环境问题的国家抉择》,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3 年版。
  18. 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唐正东、臧佩洪译,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19. 国家环境保护局自然保护司:《中国生态问题报告》,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20. 张坤等:《欠发达地区环境经济协调发展机制研究》,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21. 雷毅:《深生态学思想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22. 曲格平:《关注中国生态安全》,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23. [美]大卫·雷·格里芬编:《后现代精神》,王成兵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 年版。
  24. 夏光:《后结构主义思潮与后现代社会理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年版。
  25. 王岳川:《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
  26. 胡庆云:《中国无政府主义思想史》,国防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
  27. 周穗明等:《现代化:历史、理论与反思——兼论西方左翼的现代化批判》,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2 年版。
  28. 周穗明:《文明的振荡——当代西方“后 30 年现象”》,海天出版社 1998 年版。
  29. [美]希拉里-弗伦奇:《消失的边界》,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2 年版。
  30. [美]丹尼斯-米都斯等:《增长的极限》,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
  31. [美]梅萨罗维奇、[德]佩斯特尔等:《人类处于转折点》,梅艳译,三联书店 1987 年版。
  32. [美]蕾切尔·卡逊:《寂静的春天》,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
  33. [美]芭芭拉-沃德等:《只有一个地球》,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

#### 研究生论文

34. 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汤传信:《生态社会主义研究》,2001 年。



35. 北京大学硕士生罗永剑:《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评析——兼论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思想》,2002年。
36. 武汉大学硕士生柳红霞:《绿色政治:生态社会主义》,2003年。
37. 北京大学硕士生骆光宗:《生态社会主义述评》,2004年。
38. 中国人民大学硕士生孙绍燕:《论生态社会主义思潮及其现代启示》,2004年。

#### 文章

39. 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5年6月27日。
40. 李青宜:《“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危机论”述评》,《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7年5月。
41. 宋晓芹:《当代西方生态社会主义思潮评析》,《山东社会科学》2000年第2期。
42. 余红胜:《当代西方生态社会主义思潮论析》,《福建学刊》1997年第3期。
43. 曹淑芹:《生态社会主义的出路——评阿格尔的资本主义社会变革战略》,《内蒙古社会科学》1999年第4期。
44. 李红卫:《科学社会主义与生态社会主义之比较研究》,《社会主义研究》2000年第2期。
45. 金高品、陶甚健:《全球化与生态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研究》2000年第8期。
46. 周穗明:《九十年代西方生态社会主义的最新发展》,《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7年2月。
47. 周穗明:《生态社会主义述评》,《国外社会科学》1997年第4期。
48. 周穗明:《西方生态运动的政治分野与生态社会主义的当代发展》,《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1997年第1期。
49. 周穗明:《“红绿联盟”:生态社会主义的最新进展》,《当代世界》1998年第12期。
50. 黄新华:《论生态社会主义的“绿色政治学说”》,《社会主义研究》



- 1999年第12期。
51. 熊家学:《论生态社会主义产生的社会背景》,《社会主义研究》1994年第7期。
  52. 文衡:《英国生态社会主义者怀尔德论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和生态社会主义》,《国外理论动态》1998年第1期。
  53. 鱼小辉:《论德国绿党的生态社会主义》,《人文杂志》1992年第5期。
  54. 王丽萍:《生态社会主义的发展及对我国的启示》,《社会主义研究》2000年第12期。
  55. 季正矩:《生态社会主义评析》,《社会主义研究》1997年第5期。
  56. 孟利生:《对生态社会主义的几点评价》,《社会主义研究》1996年第11期。
  57. 曹淑芹:《生态社会主义的出路》,《社会主义研究》1999年第10期。
  58. 刘艳:《90年代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的新发展》,《社会主义研究》2000年第3期。
  59. 刘辉:《生态社会主义思潮研究综述》,《社会主义研究》1997年第7期。
  60. 周群英:《生态社会主义浅析》,《广西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61. 汤传信:《生态社会主义析评》,《江淮论坛》2002年第4期。
  62. 郇庆治:《生态社会主义述评》,《马克思主义研究》2000年第4期。
  63. 任皓:《“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辨义》,《马克思主义研究》2000年第4期。

## 外文书目

安德烈·高兹 André Gorz

64. *Reclaiming Work: Beyond the Wage-based Society*, translated by Chris Turner, Polity Press, Cambridge 1999.
65. *Capitalism, Socialism, Ecology*, translated by Chris Turner, Verso, London and New York 1994.
66. *Critique of Economic Reason*, translated by Gillian Handyside and Chris Turner, Verso, London and New York 1989. 法文原著出版时间为1988年。



67. *Paths to Paradise: On the Liberation from Work*, Pluto Press, London 1985.
  68. *Farewell to the Working Class: An Essay on Post-Industrial Socialism*, Pluto Press, London 1982. 法文版出版时间为 1980 年。
  69. *Ecology as Politics*, translated by Patsy Vigderman and Jonathan Cloud, Pluto Press Ltd. London 1980. 法文版出版时间为 1975 年。
  70. *The Division of Labour: The Labour Process and Class-Struggle in Modern Capitalism*, Harvester Press, Hassocks 1978.
  71. *Socialism and Revolution*, Allen Lane, London 1975.
  72. *A Strategy for Labour, a Radical Proposal*, Beacon Press, Boston 1967.
  73. *The Traitor*: Simon and Schuster, New York 1959.
- 本·阿格尔 Ben Agger
74. *The Virtual Self: A Contemporary Sociology*, Blackwell, Boston 2004.
  75. *Speeding up Fast Capitalism: Cultures, Jobs, Families, Schools, Bodies*, Paradigm Publishers, Boulder 2004.
  76. *The Discourse of Domination: From the Frankfurt School to Postmodernism*,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Evanston Illinois 1992.
  77. *A Critical Theory of Public Life: Knowledge, Discourse, and Politics in an Age of Decline*, The Falmer Press, London. New York. Philadelphia 1991.
  78. *Fast Capitalism: A Critical Theory of Significanc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Champaign 1989.
  79. *Western Marxism: An Introduction: Classical and Contemporary Sources*, Santa Monica, California: Goodyear 1979.
- 大卫·佩珀 David Pepper
80. *Environmentalism: Critical Concepts*, Volume I—V, (ed) Frank Webster, Routledge, London & New York 2003.



81. *Understanding Contemporary Society*, (ed) Gary Browning, Abigail Halcli and Frank Webster, SAGE Publications 2000, David Pepper, chapter 31 “Environmentalism”.
82. *Modern Environmentalism: An Introduction*, Routledge, New York 1996.
83. *Eco-socialism: From Deep Ecology to Social Justice*, Routledge, London and New York 1993.
84. *Nuclear Power in Crisis: Politics and Planning for the Nuclear State*, Nichols Publishing Company, New York, 1987.
-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 John Bellamy Foster
85. “Ecology, Capitalism, and the Socialization of Nature”, in *Monthly Review*, November 2004.
86. “Marx’s Ecolog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在伦敦马克思主义 2002 年大会上的发言, <http://pubs.socialistreviewindex.org.uk/isj96/foster.htm>.
87. *Ecology Against Capitalism*, Monthly Review Press, New York, 2002.
88. *Marx’s Ecology: Materialism and Nature*, Monthly Review Press, New York 2000.
89. *The Vulnerable Planet, A Short Economic History of Environment*, Monthly Review Press, New York, 1994.
90. *The Theory of Monopoly Capitalism*, Monthly Review Press, New York, 1986.
91. *The Faltering Economy: The Problem of Accumulation Under Monopoly*, Monthly Review Press, New York 1984.
92. *Capitalism*: (edited with Herryk Szlajfer), Monthly Review Press, New York, 1984.
- 撒鲁尔·萨卡尔 Saral Sarkar
93. *Eco-Socialism or Eco-Capitalism A Critic Analysis of Humanity’s Fundamental Choice*, London and New York, Zed Books 1999.



94. *Green-Alternative Politics in West Germany (Vol 1)—The New Social Movements*, Tokyo & New Dali 1993.
  95. *Green-Alternative Politics in West Germany (Vol 2)—The Greens*, Tokyo & New Dali 1994.
  96. “Accommodating Industrialism—A Third World View of the West German Ecological Movement”, in *The Ecologist*, July/August, 1990.
  97. “Polemics is Useless—A Proposal for an Eco-Socialist Synthesis in the Overpopulation Dispute”, in *Frontier* (Calcutta), 20 February and 13 March 1990.
  98. “Marxism and Productive Forces—a Critique”, in *Alternative*, March 1983.
- 威廉·莱易斯 William Leiss
99. *In the Chamber of Risks: Understanding Risk Controversies*,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Montreal 2001.
  100. *The Consumer Society*, Island Press, Washington, D. C. 1997.
  101. *Risk and Responsibility*,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Montreal 1994.
  102. *Prospects and Problems in Risk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Waterloo Press, Waterloo 1989.
  103. *Under Technology’s Thumb*,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Montreal 1990.
  104. *Dilemmas of Liberalism and Socialism* (with C. B. Macpherson), New World Perspectives, Montréal 1988.
  105. *Degeneration: The Dark Side of Progres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85.
  106. *The Limits to Satisfaction, An Essay on the Problem of Needs and Commodities*,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Toronto; Buffalo 1976.
  107. *The Domination of the Nature*, Beacon Press, Boston 1974.



其他作者

108. Bob Jessop with Russell Wheatley (ed), *Karl Marx's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Volume VIII, Routledge, New York 1999.
109. Frederic L. Bender (ed.), *Karl Marx the Essential Writings*, Westview Press, Boulder and London 1986.
110. Paul Burkett, *Marx and Nature: A red and Green Perspective*, Macmillan, London 1999.
111. Margit Mayer and John Ely(ed), *The German Greens: Paradox between Movement and Party*,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Philadelphia 1998.
112. John Rees, *The Algebra of Revolution: The Dialectic and the Classical Marxist Tradition*, Routledge, New York 1998.
113. Joel Kovel, *History and Spirit: An Inquiry into Philosophy of Liberation*, Beacon Press, Boston 1991.
114. Donald Sassoon(ed), *Looking Left—Socialism in Europe after the Cold War*, The New Press, New York 1997.
115. Barry Commoner, *The Closing Circle: Nature, Man and Technology*, Alfred A. Knopf, New York 1972.
116. William E. Coleman, Jr., and William E. Coleman, Sr., *A Rhetoric of the People: The German Green and the New Politics*, Praeger, London 1993.
117. Michael Redclift, Graham Woodgate, *The Sociology of the Environment* (Volume I—III),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td, UK & US 1995.



## 后 记

本书和我的学科背景有关。我的本科专业是英语，英语基础还算比较扎实。我的导师李青宜先生希望我能发挥外语的优势，去把握关于生态社会主义的最新变化，题目前边的时间定语——“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正是李先生加上去的。但这样，可参考的中文资料就比较少，需要阅读大量的外文原著。起初，我深恐有负李先生的期望，曾提出把这个时间定语去掉，后又觉得不妥。现在，全书总算写出来了，如果没有李先生的鞭策，全书会比现在逊色。

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对于该书的写作十分重要。因为生态社会主义不是真正的科学社会主义，它和科学社会主义是两套不同的理论体系。通过这两套体系的对比参照，才能对生态社会主义作出评价。但是，我的本科专业是英语，硕士专业是中共党史，所以，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功底比较粗浅。幸好，在北大读博士期间，我有机会参加梁柱教授、沙健孙教授、仝华教授、智效和教授、陈占安教授等开设的课程，弥补了我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方面之不足，使我在全书写作中有了一个立足点。

写作生态社会主义，生态环境知识是不可少的。所以，我旁听了北大环境系开设的“环境科学”和“环境伦理学”课程；选修了北大环境系和国家环保总局联合开设的“环境技术市场化政策研究”课程；还参观了北京周边的环境设施，访问了经营环保产品的公司，拜访了清华大学和中科院的有关专家，参加了《中国青年报》社举办的“环境沙龙”，出席了“世界跨越式发展环境大会”。这些活动使我结识了诸多老师和朋友，大大开阔了我的视野。

李青宜先生花费了大量的时间，从本书的题目到框架结构，甚至用语都做了详细的修改。最重要的是，生态社会主义也有自身的逻辑自洽性，曾让我陷入其中，通过李先生的指导，使我尽早从生态社会主义中跳了出来。对于任何一项学术研究，这种“陷入”和“跳出”也许是不



## 后 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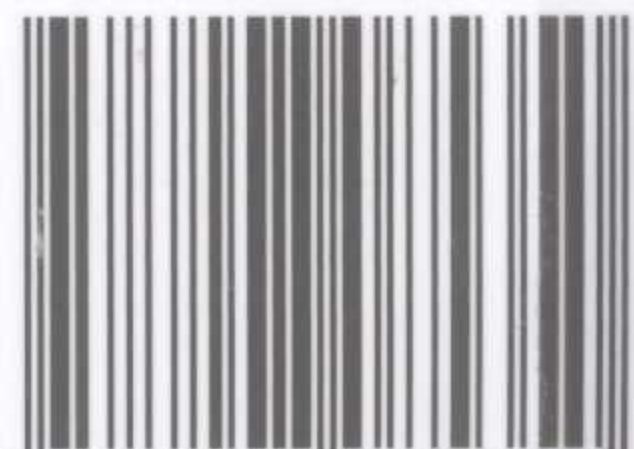
可避免的过程,但没有李先生的指导,我可能会走更多的弯路。本书中某些重要的观点也是李先生提出来的。北京大学的梁柱教授、沙健孙教授、仝华教授、智效和教授、康沛竹副教授、林娅教授也对本书提出了宝贵的意见,谨对各位老师深表谢意。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周穗明教授是研究生态社会主义的专家,向本书提供了宝贵的修改意见,兹向周教授表示感谢。





上架建议：政治理论

ISBN 978-7-208-08535-0



9 787208 085350 >

定价：24.00元

易文网：www.ewen.cc